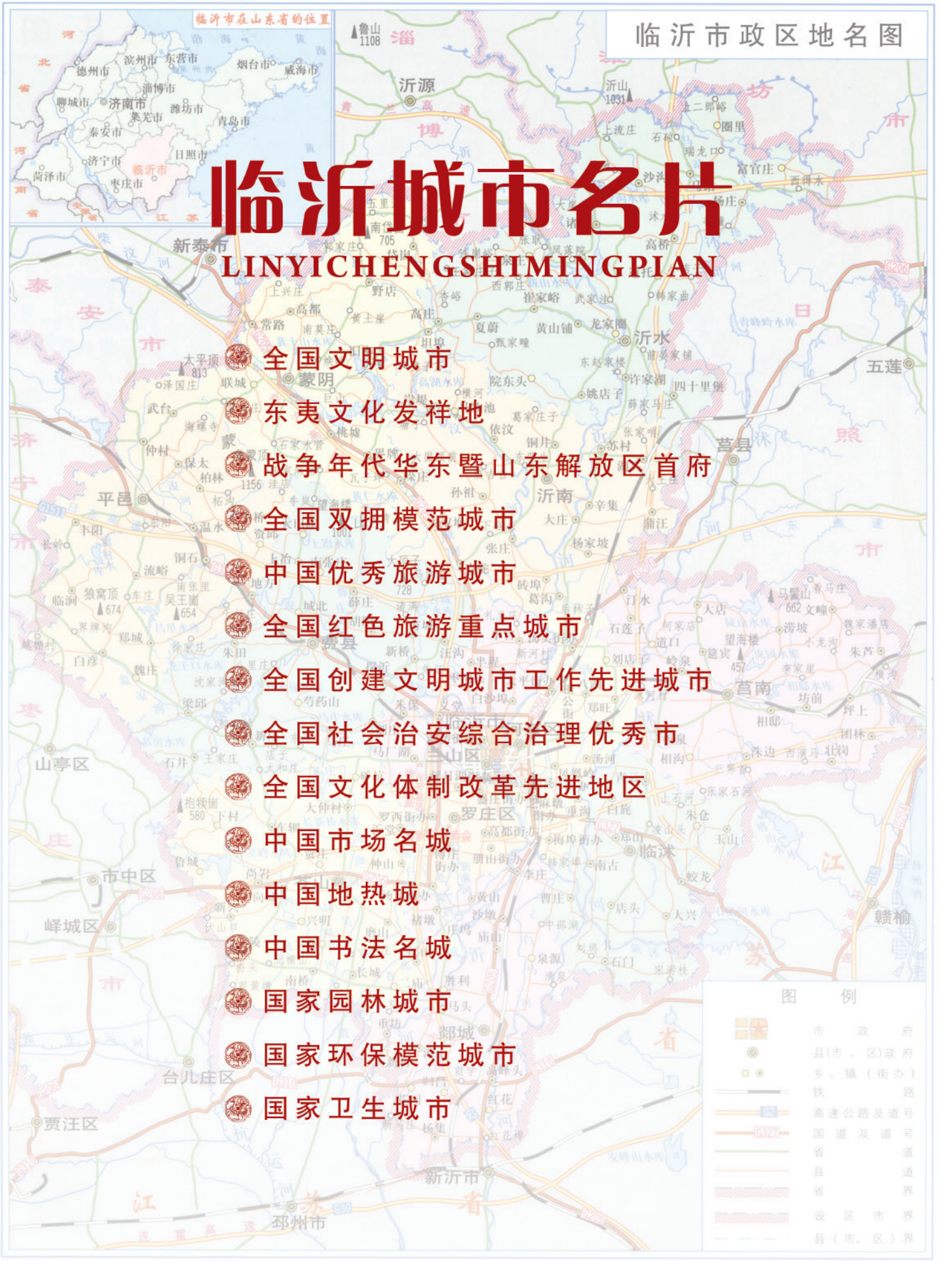


鲁SN(2010)016号
山东省地图出版社编制 2010年3月

沂蒙史志 SHIZHI YIMENG
2013 · 05 · 3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李克彬　秦鸿伟
　　何相军　赵建民　王长利
　　赵宗远　王培栋　刘兆东
　　李凤军　王泽远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钱　进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王瑞柱　伊永航
　　于　芹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刘兆东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贾　梦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陈光在沂蒙　辛鸿义　04
【峥嵘岁月】
朱克靖的传奇一生　朱　华　07
王建安与常山　陈洪涛　14
深切怀念父亲朱蓂阶　朱炳　等　17
【名人素描】
我所知道的沈鸿烈　李继曾　21
封面人物——刘洪　唐士文　25
【文化掇英】
梁武帝萧衍传旨和尚从此不准吃肉食　吴正翔　27
【古城旧事】
老城夜话（连载）　刘家骥　29
【蒙山沂水】
蒙阴古八景遗址巡访题咏　党宝修　35
溯史读志话羽山　时　麟　40
【探索发现】
子路之死析　刘宴斌　44
诸葛亮离开阳都及依刘表时间辩正　唐士文　46
《诗经》中“龟蒙”一词专指蒙山　李　莹　50

【影像沂蒙】

抗战时期沂蒙略影——
驱逐倭寇　踊跃参军　本　编　52

【诗画赏析】

沂河千里碧　灵韵诗情长
——《沂蒙诗话》之八续一　李兴河　54

【百家渊流】

姓氏百家漫谈——杨姓（中）　赵丹峰　60

【史料辑存】

亲历者忆临沂之战（下）　大荒堂主　67

【沂蒙名医】

一片赤心五十春
——感悟欧致新　刘凤才　71

【沂蒙乡亲】

大器晚成丁勇岱　高雪萍　77

【史志动态】　80

封面：临沂人民广场雕塑·文韬武略之刘洪

封底：书法/胡石

地　址：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0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博　客：yimengshizhi.blog.163.com
blog.sina.com.cn/u/1914056311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陈光在沂蒙

辛鸿义

陈光到山东之前，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代理师长兼三四三旅旅长，与师政委罗荣桓率部在晋西一带进行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9月，在汾（阳）离（石）公路两侧对敌作战三战三捷。年底，奉命与罗荣桓率师部与六八六团自灵石出发，穿越同蒲、平汉铁路，以东进支队的名义，挺进山东敌后。3月1日夜到达山东郓城张楼。经与中共郓城中心县委联系后，于3月3日，派六八六团冒雨攻克伪郓城保安团守卫的樊坝，打开鲁西地区的局面。樊坝之战后，陈光和罗荣桓将六八六团第三营与教导队合编，改称东进支队第一团，由杨勇等率领留在运（河）西地区，另以张仁初、刘西元分别担任六八六团的团长和政委，继续随师部东进。3月15日，与中共泰西地委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在东平县的常庄会合。

此后，陈光指挥一一五师与山纵第六支队配合，扫除了汶河沿岸的全部日伪据点，歼灭日、伪军4000余人。这引起敌人的重视。5月上旬，侵华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尾高龟藏纠集8000敌兵，配有汽车、坦克百余辆，各种炮百余门，对泰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5月11日，日军分九路，将一一五师师部、六八六团、津浦支队以及鲁西区党委包围于肥城东南的陆房一带。此时罗荣桓已去泰西的东汶宁支队视察，指挥突围的重担全落到陈光身上。面对严峻形势，他急令六八六团抢占陆房西南的肥柱山、牙山，津浦支队和师特务营扼守陆房东面和东北面的凤凰山，指战员们用步枪和手榴弹英勇抗击疯狂进攻的敌人，有时进行白刃格斗。陈光也往来于前线阵地实地指挥。八路军指战员浴血奋战，一天内打退敌人九次进攻。入夜，趁敌人炮火平静下来，陈光乃指挥部队顺山间小路安全突围。陆房之战，敌人自称伤

亡1200人，其中包括一名大佐在内的军官50人。而八路军突围部队和地方干部，总共牺牲360人。八路军健儿英勇战斗的大无畏精神，振奋了全国，向来对八路军战功视而不见、吝于表彰的蒋介石，竟也致电朱德、彭德怀，表示“殊堪嘉慰”。

陆房突围不久，8月1日至2日，陈光又与罗荣桓在鲁西地区指挥了梁山战斗。这次战斗，八路军一一五师以6个连的兵力，全歼日军第三十二师团所属的一个大队共300余人，缴获两门意大利大炮和其他武器，击毙日军长田敏江少佐。梁山战斗是在平原地区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伏击战。胜利的取得，大大提高了广大指战员坚持平原游击战的信心。战后，中央军委发电致贺，称此战为“歼灭战的典范”。日军有关部门专门编写《陈光部作战研究》小册子，下发部队，供作战时研究使用。

同月，山东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朱瑞为书记，陈光为委员之一。

1940年初，陈光与罗荣桓研究制订八路军一一五师行动方案，其要点之一是创建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并首先攻取白彦，经营天宝山，打开与沂蒙山区联系的通道。白彦是处于抱犊崮和天宝山区之间的交通枢纽，由大地主孙鹤龄和他的儿子、伪乡长孙益庚盘据。他们父子勾结日伪军，强迫周围几十个村庄成立反动民团，成为八路军向天宝山发展以及与沂蒙山区联系的很大障碍。为了拔掉这颗钉子，陈光指挥一一五师六八六团等几支部队，于2月14日向白彦发起进攻。经两昼夜激战，摧毁了白彦及其周围据点，消灭孙部1000多人。接着发动群众，成立白彦区抗日民主政府，组织起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其后，又三次打败了敌军对白彦的进犯，毙伤日伪军800人，缴获长短枪350余支。

三打白彦之后，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即进入费西的天宝山区，对当地的地方武装首领廉德三进行争取教育，将其所属民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天保山游击大队，廉德三

抗战周年纪念——罗荣桓、符竹庭、陈光、陈士榘（左起）等人合影

任大队长，唐健如任政委。开辟了天宝山根据地。随后，师部北移天宝山的桃峪，缩短了与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机关的距离。8月8日，廉德三部叛变，杀害八路军代表和地方工作人员，裹胁2000群众上山，并要求日军一个小队助威。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陈光指挥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和特务营，于8月1日和2日，对廉部盘据的偏头崮发起强攻，消灭叛军300人，余众投降。廉德三受伤逃往日军地方据点，公开当了汉奸。白彦和天宝山的战斗，消灭了当地土顽和叛匪，使鲁中和鲁南连成一片。

1940年11月，为便于山东根据地在军事上的统一指挥，罗荣桓与陈光率一一五师指挥机关转移到沂蒙山区青驼寺以西的聂家庄。其时，正值“百团大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一面加紧对蒋介石诱降。蒋介石则积极策动第二次反共高潮。10月19日，他限令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随后于1941年1月初，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山东的顽固派，加紧进行反共活动。日军、国民党军、八路军的三角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在这种严峻的情势下，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的指挥机关聚合在一起，目标太大，且供应问题也不好解决。因此，山东分局与一一五师师部于1941年转移到滨海区。

1941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以陈光、罗荣桓、萧华、陈士渠、梁必业组成一一五师军政委员会。

为了扩大和巩固滨海区抗日根据地，陈光于3月19日起，指挥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和山东纵队二旅发起青口战役。经过六天激战，连克海头、兴庄、大沟等多处日、伪据点，并一度攻入青口和下口，解放了柘汪与下口之间的海岸线和大片地区，扩大了滨海地区从海上与华中及胶东等地的联系，改善了山东八路军的物资供应条件。从此，中共山东领导机关一直活动于这一地区，坚持领导抗战，直到1945年9月。

1941年8月，为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军委决定：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组成，朱瑞为书记。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原山纵及一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为书记，陈光为委员之一。

1942年12月16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研究决定，对盘踞在甲子山以南的石场、祉坊、刘家东山一带的顽军孙焕彩部进行讨伐，参加讨伐的有一一五师教导五旅、教导二旅第六团、山纵二旅第五团和第六团、滨海军分区独立团等单位共1万余人。战役由陈光统一指挥。他在察看了地形并对敌情进行侦察以后，分兵四路向以石场为中心的孙部发起进攻。经14天激战，孙焕彩部溃不成军。残部仓皇逃遁，甲子山被全部收复。

第二年1月19日，陈光在曾国华、符竹庭的配合下，指挥一一五师教导二旅，长途奔袭日军据点郯城，经激烈战斗，于21日胜利收复这座古城。随后，乘胜攻取郯城附近18处日伪据点。这次战役，共毙伤日、伪军400余人，俘获600余人。迫使沭河沿岸之敌全部撤退。

1943年3月，陈光奉命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临行前，他殷切地嘱托身边的人员，要在罗荣桓同志的领导下，“搞好团结，好好工作”，从此离开沂蒙。

上个世纪90年代，陈光的老战友陈沂、苏静、林月琴、王宗槐等曾撰写了对他的纪念文章。文章说：“自1938年至1943年春，在抗日战争的头五年多时间里，陈光同志在党的培养和战争环境的锻炼中，取得了比较全面而丰富的战斗经验，发挥了他杰出的指挥才能，对开辟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朱克靖的传奇一生

朱　华

朱克靖，1895年10月29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北乡株树下村，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冬，朱克靖受中共北方区委的选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7月，被派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6年7月，他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昌起义后，任第九军党代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新四军政治部顾问兼军部战地服务团团长、苏中三分区专员、浙西行政公署主任等职。解放战争初期，任新四军秘书长、山东野战军联络部部长。1947年1月被捕，同年10月在南京郊外英勇就义。

投入大革命的洪流　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伊始，国共合作，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共中央急需军事人才从事军队工作，在苏联学习的朱克靖奉令回国。此时，孙中山已病逝，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紧密合作，继续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积极准备北伐。中国共产党派出周恩来、李富春、廖乾吾、林伯渠等优秀干部，分别到各军担任政治部主任，开展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推动旧军队的改造。1925年7月，朱克靖随苏联顾问团的船只抵达广州后，接受党的命令，于8月间到第三军就职，担任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第三军是由滇军改编的，军长朱培德，参谋长黄实，下辖第七、八、九3个师。这支部队基础复杂，军阀习气浓厚，许多人还使用“双枪”（鸦片烟枪和步枪），战斗力不强。因此，对这支部队的改造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听取了周恩来、陈延年关于第三军情况的详细介绍之后，朱克靖带领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前往赴任。他首先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队伍，改变部队的精神面貌，并按照国共两党的协定，在军、师两级设置政治部，向各团、营派遣了政治指导员。接着，他又倡议开办第三军军官学校，向中、下级军官灌输革命思想。学校由朱培德兼校长，朱克靖兼党代表。朱克靖亲自给官兵上课，教唱《国际歌》，讲

授“国民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等专题，激励部队的爱国热情。经过短期政治教育，逐渐扭转了部队的封建陋习，启迪了民主之风，有效地促进了第三军的改造，增强了部队的纪律性和战斗力。

1925年10月，当国民革命军主力第二次出师东征军阀陈炯明时，第三军负责拱卫广州。此时，盘踞在南路、海南一带的军阀邓本殷部队，依仗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乘虚进犯西江，直扑江门，威胁广州安全。广东国民政府急调第三军及第四军的第十师前往拒敌。由朱培德、朱克靖和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及随军的苏联顾问马嘉利组成南征指挥部。

在出师南征途中，朱克靖一面协助朱培德指挥部队进剿，一面沿途开展政治宣传。军队所到之处，他都要领着政工人员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演说，宣传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号召工农团结起来，同仇敌忾，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由于中国共产党大力发动工农群众支前，第三军士气倍增。10月29日，首战告捷，击败邓本殷北犯军队的主力。随后一路势如破竹，在年底先后收复高州、雷州，把邓本殷赶回了海南老巢。1926年2月，又渡海消灭了海南岛上的残敌。至此，南征胜利结束。其后，第三军移师粤北韶关驻防。

正当革命力量蓬勃发展时，国民党右派兴风作浪，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排挤共产党人。当时，第三军正在粤北的猎德前线与北洋军阀的部队对阵，留守广州的第三军军官学校，在教育长熊式辉的指挥下，助纣为虐，极力配合蒋介石反共。消息传到猎德前线，朱克靖极为愤怒，要求军长朱培德处分熊式辉。朱培德囿于私交，一再为熊式辉开脱，但朱克靖据理力争，毫不妥协，最终迫使朱培德下令撤销熊式辉的教育长职务，并对受迫害打击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慰问，由此制止了蒋介石挑起的反共事端在第三军中的蔓延。

“中山舰事件”暴露了蒋介石的狼子野心，同时也加剧了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摩擦。朱克靖深知朱培德平日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经与周恩来等商量，决定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广泛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使各派系军阀互相遏制。于是，朱克靖说服朱培德出面联合由地方实力派掌握的第二、四、五、六军，向蒋介石的不轨行为提出抗议。蒋介石见众怒难犯，不得不有所收敛，不敢把事态继续扩大。这件事使朱克靖受到了中共两广区委和苏联顾问的肯定。

1927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兵分两路，出师北伐。朱克靖所在的第三军，是东路军的左翼，部队从猎德挥师，沿北江进发，第一仗攻下乐昌，随即翻越南岭，进入湖南境内。当时，西路军已从衡阳、株洲过境，兵临长沙，第三军随后而行，没有多少战事，很顺利地到达醴陵，准备从这里进攻江西。

经过休整，第三军向江西进发，一鼓作气攻下萍乡。9月间，第三军与东路军各支部队会合，对南昌取包围之势。由于蒋介石指挥上的错误，他的嫡系部队第一军第一师被孙传芳部击溃，影响了围攻南昌的战斗，第三军移赣西北驻防待命。10月初，北伐军重新组织攻城，第三军负责夺取南昌郊外的牛行车站，激战三昼夜，伤亡惨重。朱培德在强敌面前，一筹莫展，只得撤回兵力。当时，有些旧军官以为是溃败，竟临阵逃脱，引起了部队极大混乱。朱培德见状不妙，赶紧骑着高头大马前往弹压，也收不住阵脚。危急关头，朱克靖率领一批政工人员赶到了前沿阵地，一面组织后续部队抵挡敌军的反攻，一面整顿撤下来的部队继续投入战斗，终于避免了一场不堪设想的损失。事后，朱培德很感激地夸奖朱克靖及他领导的政工人员说：“别看我手下这些军官都已身经百战了，可是真刀真枪拼起来，倒不如你带领的那班青年学生。”不久，北伐军先后收复了武汉、南昌、上海和南京，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这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把中国问题列为中心议题之一。朱克靖由于正在前线督师，没有与会，但仍被选举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帝国主义者看到北洋军阀失败，便开始寻找新的代理人，扶植蒋介石篡夺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围绕着广东国民政府迁都之争，形成了宁汉对峙的局面。江西处于中间地带，武汉革命政府和蒋介石双方都在竭力争取，而驻守江西的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则举棋不定。在此情况下，朱克靖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朱培德与武汉革命政府的合作。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指使爪牙暗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10天后，又派兵解散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和江西省学联，封闭了国民党左派的《贯彻日报》；紧接着捣毁了九江市党部和市总工会。为了把蒋介石的势力从江西驱逐出去，制止时局逆转，3月29日，朱克靖从武汉邀来国民革命军代理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到江西争取朱培德反蒋。经朱克靖、郭沫若的说服，朱培德明确表示倾向武汉革命政府，从而制止了蒋介石向西发展的野心。武汉革命政府的力量，随即从两湖发展到江西。接着，武汉革命政府于4月4日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克靖为省政府秘书长。朱克靖代表省政府出席朱德任南昌市公安局长的就职仪式。

不久，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革命，并调兵遣将，准备进攻江西，进而夺取武汉。蒋介石为拉拢朱培德，对其许以高官厚禄。朱培德见利忘义，在蒋介石软硬兼施的诱迫下，公开倒向南京政府。6月5日，朱培德撕下了假左派的面具，玩弄起“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的鬼把戏，把第三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赶出江西。朱克靖也受到排挤。一天，朱培德特意邀朱克靖聊天，酒过三巡，便以“私交”劝朱克靖“脱离武汉政府”，“投靠蒋总司令”。朱克靖勃然站起，正色说道：“我不投降，你反水要考虑后果！”朱培德只得无奈地双手拱了一拱，半天才说出了一句“后会有期”的话来。

许多共产党员在撤离江西时，遭到亲蒋分子的杀害，朱克靖知道朱培德心怀叵测，为防万一，他派人将妻子肖仲之经九江送往武汉，然后自己化装成一个货郎，绕道湖南去武汉，向党中央汇报江西的情况。后来，他对人忆及这段经历时说：“我离开江西，经铜鼓进入湖南。路上，我买了一担皮箩，装成做生意的，回到醴陵东乡温泉的姐姐家。然后，又化装成炭客子，从东乡乘炭船到武汉。”经长沙时，已是“马日事变”之后，湘江两岸有许多荷枪实弹的军警。朱克靖乘坐的船没敢停靠，鼓起风帆，顺流而下，闯过了检查关。

7月15日，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也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与蒋介石合流，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为力挽狂澜，中共中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且秘密派熟知情况的朱克靖回南昌，策动第三军旧部参加起义。朱克靖到南昌后先找到了朱德，在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和南昌市公安局内部埋下了革命的火种。

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的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二十军所部3万余人，举行了震撼全国的“南昌起义”。起义胜利后，部队编为3个军。朱克靖被任命为第九军党代表。不久，起义部队撤离南昌，沿闽赣边南下。10月，在广东潮汕地区被国民党重兵包围，损失惨重。朱克靖突出重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孑身一人，开始了10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十年艰难奔波　终于回到革命队伍

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后，朱克靖只身潜入广州，希望找到党组织。然而，此时广州往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气象已荡然无存，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由于朱克靖曾在这里进行过革命活动，认识的人较多，不能久留，他便混在人群中买了一张火车票，沿粤汉线北上，赶到武昌。当时武汉三镇同样笼罩着恐怖气氛，反动派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朱克靖

朱克靖（左六）与新四军军部领导在一起

找到妻子肖仲之后，马上匆匆忙忙地携带家眷去了北平，暂在岳母家避居。为躲避反动派的迫害，朱克靖隐名埋姓，租种了海淀区中关村附近的一个葡萄园，靠栽蔬菜、养兔子为生。他一面自食其力，一面努力寻访党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转入秘密活动，一时难以联络上，朱克靖焦急万分。由于生活所迫，他只得改行，经人介绍，化名李有才，在北平附近的遵化县任教。1932年，他遇上幼年时的同学罗征书（此时正在广西师专做庶务），邀他到桂林教课。就这样，朱克靖举家迁到桂林，以李竹怡的化名，出现在广西师专的讲台上。

1934年间，白崇禧游玩桂林时，有人悄悄地把朱克靖的情况告诉了白崇禧。白崇禧听说朱克靖已脱离了共产党，便做出一付礼贤下士的样子，吩咐准备宴席，并派吉普车去接，想劝说朱克靖归顺自己。朱克靖知道来者不善，托辞推脱，后在同乡好友程星龄的帮助下，全家逃离桂林，几经辗转，流落到长沙。此时，他已身无分文，迫于生活，只得忍痛将三子秀麟送与长沙火车站职员杨世铭为嗣，然后，取道江西去投奔妻舅文群。

文群任过江西省财政厅长，此时兼办豫鄂赣闽四省的农村合作事业。他平素极器重朱克靖，便请他来帮办农村信贷事宜。朱克靖觉得这也能为农民办些实事、解决些困难，便答应了下来。于是，他化名朱笃一，前往河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南阳办事处任特派员。当时河南农业凋敝，农民生活贫困，朱克靖带领几个办事员奔波于南阳行署所辖的13个县，扶助农民购买耕牛、添置农具，开渠凿井、兴办水利设施。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国共两党共同公布“重新合作，一致抗日”的协定，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新四军。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市高升巷公开挂出了牌子。朱克靖经过10年的艰难奔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他极为振奋，对家里的人说：“我要重归战场，请缨杀敌。”他把妻子肖仲之和儿女送回醴陵家乡安置，并委托友人说：“如有机会，请把我的家属转移到延安去。”安排好这一切，他便急切地奔往南昌，投身抗战行列。

“仲连智免蹈东海　武穆冤成走传书”

朱克靖赶到南昌，就像久离娘亲的游子，终于回到了母亲——党的怀抱。当时，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闻知朱克靖要去新四军工作，便以“叙旧”为幌子，把他请到自己家里，提出要聘请他担任江西省政府秘书长的职务。面对高官厚禄，朱克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愿在新四军与抗日将士们一起吃苦”，便起身告辞了。而在党组织征求他安排职务的意见时，朱克靖却说：“无论分配我做什么工作都行，只要对抗战有益。”

叶挺对朱克靖十分尊重，提议要留他在军部工作。1938年1月6日，新四军正式在南昌编成，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43岁的朱克靖任军政治部顾问兼直属战地服务团团长。

战地服务团直属政治部领导，专门负责宣传、民运工作，其成员大多数是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来的爱国青年，有新闻工作者，也有作家，但比重最大的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分成戏剧、绘画、歌咏、通讯、民运等几个大组，其中，民运组人数最多。朱克靖对服务团的创建和发展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开始时，服务团的男青年大都西装革履，女青年则烫发旗袍，比较自由散漫，因此也受到一些批评。但是，朱克靖看到了他们的血气方刚，觉得他们离开大城市投奔新四军，有很高的抗日热情，而且很多人有一技之长，他便加以正确的引导，帮助他们克服“娇”、“骄”二气，与抗日军民生活在一起。战地服务团成立了一个剧社，朱克靖带着这批青年跋山涉水，到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演出，有时还把《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送到前沿阵地。不到一年时间，他们行程2万里，足迹踏遍苏、浙、皖、赣4省，有效地宣传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抗日主张。

1940年6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受蒋介石指使，企图阻挡新四军向江北发展，拉拢泰州地方实力派、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阻击新四军。因为李明扬在北伐时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旧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考虑到朱克靖在大革命时期的地位和影响，委任他担任新四军联络部长，负责统战方面的工作。陈毅为了争取二李，避免内战，特致书朱克靖，邀他从江南赶来，赴泰州谈判。陈毅为朱克靖的泰州之行，曾写下了《送人赴泰州谈判抗日合作》的诗句：

停骖问我意何如？词婉情真再致书。
军令今当斩马谡，歧途何事泣杨朱？
仲连智免蹈东海，武穆冤成走传书。
凭君寄语强梁辈，摩擦自戕慎厥初。

朱克靖轻骑入泰州，对二李晓以民族大义，陈述了“兄弟阋于墙，共御其侮”的道理，并揭露了蒋介石等顽固派借刀杀人，削弱抗日国防力量的阴谋。二李深为所动，不愿与共产党打内战，同意让开一条通道。陈毅率部顺利地通过了他们的防区，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使之成为嵌在敌伪心脏的前沿阵地。

朱克靖在争取开明士绅、社会贤达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当时苏北有名的大文豪韩紫石，就是经朱克靖联系争取过来的。

但是，韩德勤忠实地秉承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充当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急先锋。他把进攻目标首先指向江北新四军，还邀约二李配合，企图攻占黄桥。因此，继续争取二李保持中立，对于改变战场力量对比有重要意义。陈毅派朱克靖继续坐镇泰州，与二李谈判。谈判中，朱克靖发现二李动摇不定的原因，是惧怕韩德勤人多势众，同时又怀疑新四军立足不稳。因此，朱克靖便对二李详细地分析了苏皖地区的各种政治力量，着重指出新四军虽然人少枪少，但努力抗战，众望所归，如此正义之师必操胜券。经促膝交谈，二李继续与新四军保持了统一战线关系，并允许江南新四军通过自己的

防区增援黄桥，抵抗韩德勤部队的进攻。

黄桥之战当夜，朱克靖坐在李明扬办公室里，两人一起守在电话机旁。李的部下不断打来电话报告战况。到了次日午后，朱克靖接到陈毅电话，让他转告李明扬，黄桥之战已经结束，顽军军长李守维落水溺毙，师长孙启人及一批旅、团长成了新四军的俘虏。不久，苏北参政大会在海安召开，朱克靖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当选为副议长，同时兼任苏北三分署主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粟裕率第一师在苏中地区成立苏中军区，下辖4个分区，各分区成立中共地委、行政专员分署和军分区。第三分区由叶飞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朱克靖任第三分区专署专员。他们共事多年，一起领导了泰兴、泰州、如西、靖江4县地方政权建设，开展瓦解敌军，保障部队供给和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为了开拓新的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派粟裕、叶飞于1944年底先后率部南下，同浙东游击队会合，创建了苏浙根据地。朱克靖带领300多名地方干部随军同行，任苏浙行政公署主任，在领导地方政权建设、发展经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身心为党国　一死何足愁”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维护和平局面，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与国民党当局签订《双十协定》，遏制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10月间，长江以南7个新解放区的新四军，按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主动撤到江北，朱克靖亦离开苏浙区随军北上，进入山东。

12月，新四军在山东重新整编，军部与山东军区合署办公，朱克靖任新四军联络部长、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长，对外称新四军秘书长。

为了推迟内战爆发，争取国民党内的反蒋力量，党派朱克靖到郝鹏举部去做统战工作。郝鹏举原是冯玉祥的副官，1924年在苏联学习军事，与朱克靖是同学，此时担任国民党淮海绥靖公署的行政长官。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心存二意，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接受了朱克靖的劝告，于1946年1月6日发表“退出内战，拥护民主”的通电，宣布起义，并将所部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开进山东解放区休整。

朱克靖在完成策动郝鹏举部起义的任务后，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受陈毅的委托，被派往华中民主联军担任政治委员。山东军区还派遣康宁、刘述周等一批共产党员到民主联军担任政治工作。他们在朱克靖的领导下，着手改造这支部队。朱克靖亲自给部队讲课，介绍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组织宣传队教士兵们唱革命歌曲，在官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6年6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郝鹏举见风使舵，暗地里和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联系。11月，国民党军占领了张家口，气焰更加嚣张，又派重兵分两路进攻山东解放区，大有一口吞掉人民解放军之势。郝鹏举开始秘密策划叛变，准备在新年期间行动。这个阴谋被朱克靖及时发觉，并报告了山东军区司令部。于是，陈毅以新年团拜的名义，把郝鹏举请到山东军区所在地临沂，郑重地劝告他：“只有依靠人民才有出路。”郝鹏举闻言，顿觉心惊肉跳，装出一副可怜相，假惺惺地痛哭流涕，并要求率部配合华东野战军发动莱芜战役。为了继续争取郝鹏举，扩大反蒋统一战线，陈毅经请示党中央，还是给了郝鹏举立功悔罪的机会。

1947年1月，朱克靖和郝鹏举一起离开临沂，返回民主联军驻地。临行前，陈毅与朱克靖促膝长谈，他一方面担心朱克靖深入虎穴，凶多吉少；另一方面又希望他对郝鹏举部“能争取一分钟就要争取一分钟”，以便使我军主力部队运动到莱芜集中。朱克靖深知此行肩负责任的重大，坚定地对陈毅表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决心克服任何艰难险阻，完成改造民主联军的任务。

但是，郝鹏举回去后，加快了叛变的步伐。1月22日晚，郝鹏举布下圈套，以研究如何配合莱芜战役问题为由，派人请朱克靖出席“军事会议”。朱克靖虽已预感到有某种异常，但从大局考虑，仍带着几名警卫员毅然赴会。他刚一踏进郝鹏举的院子，就被一群荷枪实弹的匪徒包围，朱克靖及秘书王宜生、总务科长刘永春等人被扣押。

朱克靖被捕后，连夜被郝送往海州（今连云港市），作为他投蒋的见面礼。随后，郝鹏举率部向国民党统治区移动。山东军区广大指战员闻讯，无不义愤填膺，于2月6日发起讨郝战斗，在苏北白塔埠包围了叛军，全歼该部所辖的2个师，并活捉郝鹏举。

朱克靖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徐州、苏州，后被敌人移送到南京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宁海路19号看守所。国民党为了谎报“战绩”，竟在报纸上制造谣言，编造出朱克靖是在战场上被俘的。为了进一步使朱克靖“登报悔悟”，国民党保密局的几个反动军官，以所谓“同学”、“熟人”的关系前来劝降，均被朱克靖严词拒绝，时过半年，敌人仍一无所获。

朱克靖的妻子肖仲之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丈夫被关押南京，心急如焚，领着儿子文泉，千里迢迢从湖南赶去探监。无奈墙高院深，无法见到，只得央求醴陵籍的国民党军界人士帮忙。当时，刘斐、李明灏（分别为原国民党国防部次长、重庆卫戍司令，后来均成为起义将领）正闲居南京，他们劝肖仲之母子说：“你们现在去看，真是太危险了，很有可能把你们也一起押起来，作为劝降的人质。”肖仲之只得忍悲含痛携子回乡。从此，他们再也没能与自己的亲人见面。

朱克靖入狱后，国民党军政要员贺衷寒利用同乡、同学、大革命时期的朋友关系，到监狱看望朱克靖，劝他改弦易辙，为国民党工作。朱克靖不为所动，说：“敌人叫我死，叫我回家种地则可，让我骂共产党，为国民党宣传，是痴心妄想！”他还在狱中写诗填词，抒发革命者的情怀。可惜的是，这些战斗诗篇大多失散了，仅保留下来的一首这样写道：

一颗为民心，万古终不泯。
壮士非无泪，不为断头流。
身心为党国，一死何足愁。

1947年10月，国民党特务感到黔驴技穷，只得使出卑劣的手段，将朱克靖在南京郊外用绳索秘密勒杀，然后毁尸灭证。牺牲时，朱克靖年仅52岁。

王建安与常山

陈洪涛

原山东省委书记高克亭曾说过，抗战时期，山东的中心在沂蒙，沂蒙的中心在沂南，沂南的中心在常山。这里说的常山即1940年创立的沂临边联县——沂南县常山区，范围包括今沂南县马牧池乡全部和依汶镇西部的十几个村庄。常山区这个名称直到1958年才被马牧池乡所取代。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这里被誉为“一枪能打透”的根据地和山东的小延安。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鲁中军区、山东战邮、大众日报社、北海银行等众多领导机关都曾驻扎在这里，是全省抗战的指挥中心。徐向前、罗荣桓等190多名开国将帅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过，留下了光辉的足迹，王建安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位。

王建安，原名王见安，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一师三团排长、连长，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二二四团营长、副团长，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二十八团副团长，三十团政治委员，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被徐向前称赞为“军政双全的优秀指挥员”。

1939年6月，王建安从抗大毕业后，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来到山东，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徐向前来山东后，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王建安任山东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协助徐向前、黎玉等同志，对山东纵队及所属部队进行了五期整军，不仅加强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提高了部队战斗力，而且促进了部队迅速发展。山东纵队由组建时2.4万余人，发展到6万多人。同时还划拨输送给新四军、八路军一一五师4万多人，王建安居功至伟。

1940年8月，进行四期整军时，山纵在鲁中的部队被编为第一旅，王建安兼任这个旅的旅长。1942年8月，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王建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43年3月，新的山东军区成立，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黎玉任副政委，王建安调任鲁中军区司令员。

常山庄东西北三面环山，只有南面向外敞开着，像个簸箕一样，外人进来就很难顺利走出去，在军事上被称为‘绝地’。加上群众基础

好，山东纵队、鲁中军区等众多领导机关都设在了这里。王建安作为山东纵队和鲁中军区的主要领导，自然和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

至今，常山庄的老人们还记得，王建安身材魁梧，浓眉大眼、五官端正，经常骑着一匹红色的高头大马，穿着蓝灰色的八路军服，非常英俊、威武。小时候，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说，在他8岁那年，他和一位小伙伴在田野里割牛草，远远地看见王建安骑着战马过来了，便高兴地迎了上去，王建安从马背上跳下来，将父亲和小伙伴抱上马背，自己牵着马回到村里。当时我们家在村里算是个大户，识字的人多，思想也较为开明，司令部就安在了我们家，因此，王建安也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那时候，人们只知道王建安是个大官，习惯称他为王司令，许多人都说他会腾云驾雾、飞檐走壁，来无影、去无踪。有多少次，鬼子出动大批人马来抓他，但每次都扑了个空。一位日军大佐曾气急败坏地咆哮道，挖地三尺也要挖出王建安，就是死，也要看看王建安长得什么样。但无论敌人多么疯狂，王建安屡屡化险为夷，搅得敌人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

八路军在常山庄的日子里，老百姓腾出最好的房子，宁肯自己饿着，也不让子弟兵吃不饱，还时时为他们站岗放哨。王建安不止一次地说，我没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千里眼、顺风耳，常山的老百姓是我们的保护神，沂蒙山的人民用血肉之躯搭起了铜墙铁壁，处处保护着八路军。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敌人疯狂“扫荡”、“蚕食”，重兵包围封锁，山东抗日根据地形势空前严峻。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一度被压缩在东西不足50里、南北不足30里的地域内，且每天还要面对日军的‘铁壁合围’、‘拉网合围’大‘扫荡’。作为山东纵队、山东军区、鲁中军区的主要军事指挥员，王建安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和山东分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决贯彻积极主动的作战指导思想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沉着、冷静，运筹帷幄，指挥部队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顽强斗争。当敌人合围时，适时地摆脱敌人，保存有生力量；实行内外线斗争紧密配合，积极寻找有利战机打击消耗敌人；利用敌人‘扫荡’空间，恢复、扩大和巩固根据地。从而，粉碎了敌人多种多样的“扫荡”、“围剿”，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遵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罗荣桓带山东军区主力部队3万多人奔赴东北，鲁中军区部队奉命进行了统一整编，王建安兼任第三师师长。鲁中军区部队组成第一路大军，王建安任前线指挥，转入对日伪军的大反攻。然而，就在我军大反攻的时候，国民党军假借“接收”的名义，沿津浦路向我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为防止国民党军进犯，王建安率鲁中军区部队五个团，参加了由来山东不久的陈毅同志指挥的津浦路战役。自此陈毅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中又多了一员骁勇善战的猛将。

可以说，王建安是所有开国将帅中在沂蒙山区工作和战斗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先后徐向前、罗荣桓、陈毅三位元帅共同战斗，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常山庄度过的。在这里，他运筹帷幄，指挥无数次战斗；在这里，他同人民打成一片，与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至今，常山庄还保留着他和夫人牛玉清结婚时的新房。他的第一个儿子王西波就出生在这里，并由该村游击队员苏合平的妻子祖秀英抚养，一直到孟良崮战役结束后王建安夫妇要离开沂蒙时，才将孩子接走。

之后，王建安先后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第七兵团司令员等要职，率领部队攻济南、战淮海、过长江，解放杭州、舟山群岛。叱咤风云，屡立战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抗美援朝，荣获金日成一级国旗勋章。回国后，相继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王建安（右二）在指挥战斗

务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等重要领导职务，1956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无论走到哪里，职务怎样变化，王建安将军对常山庄人的那份深情始终没有改变。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将军去世，将军给常山庄的乡亲们写了30多封信，而且都是亲笔所写。

1966年，时任济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王建安将军，再一次回到他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常山庄。如今40多年过去了，常山庄的乡亲们对将军的这次回乡之行依然记忆犹新。

当时，常山庄还不通公路，将军的汽车停放在南大路上，沿着河边徒步走了6里多的山路，来到常山庄看望乡亲们。

作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将军依然那么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他微笑着同每一位乡亲打招呼。曾在王建安指挥下打过游击的李京贵老人想和将军握手，警卫人员欲上前阻止，但被将军严厉地批评了。将军说：“回到常山庄就是回到自己的家，这里的父老乡亲都是我的兄弟姐妹。”说着，将军主动拉起李京贵的手，肩并肩的向村里走去。他们来到房东苏合平家，带来了许多礼物，还带来了孩子王西波兄弟四人的照片。详细询问家里有没有困难，让苏合平一家激动不已。之后王建安又来到我二爷爷陈桂林家，我二爷爷陈桂林识文解字，算是个文化人，战争年代和王建安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得知我二爷爷身体有病，王建安回到济南后，买了药邮了过来。

那一天，王建安走村串户，问寒问暖，直到日落西山才依依不舍地同乡亲们告别，他深情地说，“要不是时间紧，我真想在这里住一晚呀。”

王建安对乡亲们的感情，乡亲们对王建安的怀念，将永远地镶嵌蒙山沂水之中。前不久，我回到村里，见到了苏合平的儿子苏志东，询问王建安来过的信件，可惜的是，这些信件和照片由于几次搬家，全部遗失了。苏志东对我说，王建安总共来了20多封信，最后一封是1978年将军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的时候来的。信上说，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再到常山庄看一看。

然而，从那以后，将军就得了病，1980年8月25日在北京逝世。他想再回乡看看的夙愿最终没有实现，成为将军和常山庄人的一大遗憾。

深切怀念父亲朱蓂阶

朱 炳 朱 钧 朱瑞芳

2012年11月8日是我父亲牺牲7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永生难忘的日子里，我们忆起了父亲生前的音容笑貌，以及他对我们的谆谆教诲。父亲在革命战争中的英勇事迹我们都铭记心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缅怀父亲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以倾诉子女对父亲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父亲朱蓂阶，名相尧，中共党员，山东省宁阳县东庄乡东庄村人。1900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自幼聪慧，矢志好学，11岁即离家随兄朱宗辅到离家百余里的宁阳城县立第一小学上学，后考入济南正谊中学。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受五四革命思潮影响，产生“教育救国”的信念。在校期间刻苦攻读，以报效国家。他为人正直，待人谦和，富于正义感，被师生公认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26年父亲北大毕业后，到烟台省立第八中学任教，1930年秋，转任益都（青州）县山东省立第十中学教务主任。他施教

认真，常慷慨解囊资助贫困学生，在教育界颇有声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第十中学学生公开声讨蒋介石卖国求荣的不抵抗主义，对此，朱葆阶毅然站出来大声疾呼“爱国无罪”，坚决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并帮助进步学生创立进步团体“土城社”，购买进步作家鲁迅、张天翼的著作，编演话剧，宣传抗日救亡等，揭露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镇压群众抗日活动的罪行。国民党当局以“操纵学生闹事”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为由，将他逮捕，押至济南国民党监狱，后经校方和亲友多方营救，二个月后，得以取保获释。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父亲旗帜鲜明地支持拥护爱国将领蔡廷锴奋起抗日的正义斗争，他深信，只要发起全国民众坚持抗战，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在给亲友陈友唐的书信中说：“刻下沪事日亟，大战既在目前。生死存亡，胥系于此，惟我只要沉着应战，作持久战，最后胜利尚有望也。”父亲对时局的分析论断，被抗日战争的胜利所证实。同年夏初，父亲邀请途经益都的冯玉祥先生到校发表抗日演讲，抨击蒋介石“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的论调，给师生们以极大的教育，1933年下半年，因支持学生李守本创立的“土城社”开展抗日活动，遭校方反动势力打击排挤，遂于1934年春离职去北平，在《民声报》社做协助工作。1935年春，经友人介绍到山东省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他目睹主管治黄的国民党官员徇私枉法、谎报灾情、借机发财、中饱私囊的种种腐败现象，十分失望，誓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便辞职返乡。回家不久，就被一个开煤矿的资本家表兄徐子昂知道了，他企图利用父亲在社会上的声誉，想以高薪聘请父亲协理煤矿。父亲早知道他剥削残忍，唯利是图，绝不与其朋比为奸，拒绝了他的重金聘请。

正在这时，又遇到有人正在筹措给一个地方绅士立“公德碑”，有人给父亲算了份子，他得知后，马上要那个人给他退出。那个人说名字已刻在墓碑上，不好再退了，父亲决断地说：“不好退也得退，刻在墓碑上也得凿下来，恶风败俗我坚决反对，绝不随波逐流。”最后终于把他的份子退出。这一例拒绝封建恶习的举动，至今在地方上传为佳话。这一期间，父亲从益都到北平，回济南返家乡，辗转数年，对社会黑暗现实有了进一步了解，心怀不满，一腔爱国之志无从施展，心中十分苦闷。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感到只有再转入教育事业，以教育救国，才能尽一个知识分子的报国责任。于是在1935年秋，再次应聘济宁省立第七中学担任英语教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2月27日，日军攻占济南，顺津浦铁路南下，国民党军队纷纷望风而逃，学校被迫停课，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命令学校南迁大后方，他拒绝随校南迁，再次弃教返乡。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当时东庄一带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及上层人士，经常凑到一起，打听时局，商讨救国事宜。经多方酝酿，一致认为要救国，必须组织抗日武装，并公推父亲为首领。父亲感到如果自己拉队伍起来干，势力单薄。1937年秋，泗水县中共党员周兰田等人到东庄一带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号召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父亲更深深地感到抗日救国必须靠共产党的领导，于是下决心拉起队伍投奔共产党。

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徂徕山举行震惊中外的的抗日武装起义，组建抗日队伍。消息传来，父亲立即派武效周、许仁安等四人与泰安中共党员程照轩取得联系，并把自己的家作为秘密集会、策划抗日的活动点和联络站。他卖掉部分土地，购买枪支弹药。经过一番准备，于1月24日晚在北鄙小寨村亲率23人乘黑夜直奔徂徕山起义地点法华寺，被编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二中队。2月初，王一平、朱葆阶受山东省委指派再次回到宁阳东庄一带发展抗日武装。他们在埠南、南北陈村及周围村庄宣传抗日和我党主张，发动群众并逐步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泰安境内的三韩家庄、坡里

及三山阴、南驿等地。2月28日，父亲在北鄙西大寨又集合80余人，枪支70余支。这时王一平代表中共山东省委宣布该武装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七中队，父亲任中队长，王一平任指导员。行军到新泰县山草峪时加入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北上的一大队，参加了第一次攻克莱芜县城等战斗。不久又改建为山东人民抗日独立第一师，父亲任二团一营三连连长，二团参谋。5月，山东省委在泰安县南尚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并决定选派优秀干部到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组织抗日政权。会后，省委书记郭洪涛亲自同父亲谈话，指出：泰宁边区处在津浦铁路东侧的矿区，东连沂蒙山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省委决定派他回宁阳东庄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政权，开展对敌斗争。按照省委指示，父亲针对日军策划华北“自治”和“以华治华”的意图，决定以“自治”为面目，掩护开展工作，初步商定往泰安七区的石崮一带和宁阳东庄九区一带，建立“灰色”面目的“泰宁边区人民自治委员会”。向省委汇报后，山东省委充分肯定了他们的设想，并明确指出“外白内红”这种独创的斗争方式的重要意义。经多方筹备，1938年6月，以父亲为主任委员的“自治会”成立。

自治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父亲利用在当地的声望，团结各界爱国人士，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先后建立了自卫团，村政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泰宁特务队泰宁五中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配合八路军的反扫荡，破袭日伪交通线，同时利用日伪维持会等，掌握敌情。1938年秋，父亲借敌人企图利用胞兄朱宗辅来控制自治会的目的，因势利导，使倾向我党的朱宗辅打入华丰煤矿任维持会长，发展内部关系，搜集敌人情报，购买炸药输送沂蒙山区根据地，护送八路军过铁路。1938年12月31日，父亲巧妙安排突然出击一举铲除伪宁阳县八区区公所，又将八区区公所改造成我方可靠的情报站。1939年3月，父亲命令泰宁五中队利用内线，巧妙地袭击大汶口伪警察局，俘敌30余名，缴枪20支。9月，配合八路军击溃国民党顽军牛希文部300余人，缴获一批军用物资送往山区，不久又解除了华丰煤矿护矿队的全部武装。自治会在党的领导下，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所辖区域由最初的20多个村庄发展到110多个，成为紧紧卡在敌人南北交通线——津浦铁路上的一枚钢钉。他们利用交通线，先后掩护迎送了我党和八路军重要领导人徐向前、罗荣桓、朱瑞、陈光、肖华及数千干部战士穿越铁路，运送了延安与山东省委文件、电报、信件、报告等及大批抗日物资。为此，自治会先后受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鲁南区党委的多次通报表扬。

1939年9月16日，经中共曲泗宁中心县委书记江洪和封振武的介绍，父亲光荣地加

泰泗宁边区地下交通站

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坚定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1940年7月，日伪特务侦知自治会的真实底细，日军立即调兵合围。自治会按中共山东省委指示迅速转移，同时公开宣布建立八路军泰宁办事处，将自卫队、泰宁五中队编为泰宁大队，朱葆阶任办事处主任兼大队长。从此，在泰宁边区和敌人开展了公开的武装斗争。日伪攻占自治会驻地后，大肆搜捕、屠杀当地干部、群众，并四处搜捕我们一家，父亲考虑到当时没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我们年龄小（那时我11岁），全家随军行动，会给部队增添很多困难。为此，父亲把女儿朱瑞芳送婆家去，长子朱炳送到大汶口镇一家亲戚的商店里学生意当店员，次子朱钧送到姑姑家去，妻子刘敬如和幼子朱铮转移到抗日根据地去，全家四处逃散，直到日军投降才返回故里。

父亲是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模范。1941年1月，国民党第五十一军所部3000余人，由安徽埠阳到蒙阳归建，途经泰宁边区尧山区，突遭日军合围陷于绝境。恰值父亲视察该区，见此情景，他立即指挥泰宁大队及部分民兵、自卫队利用熟悉地形，果断抢占制高点，吸引阻击敌人并派人引导该部进入山区，救护安置伤员，使其顺利突围归建。临别，友军官兵一再向父亲表示：拥护国共合作，与共产党、八路军共同抗战到底。

1940年10月，在泰宁边区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父亲被选为人民代表，出席了鲁南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鲁南行署秘书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尼山地委统战部长。1942年调山东省战工会教育处工作，9月被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任命为山东公学校长。1942年秋，日军对我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拉网扫荡”，父亲根据山东分局反扫荡动员会议的部署，连夜赶回山东公学驻地，及时研究安排学校反扫荡工作。会后，他率领部分干部和学生向沂南县马牧池山区转移。在路过军区司令部驻地时，在村头遇到陈栋，陈栋看天色已晚，情况又紧急，再三挽留父亲住一夜再走。父亲深感反扫荡任务重大，虽然极想进村与转战南北难以相逢的老战友见见面，但是想到学校几百名教职员工及学生的安危，就立即连夜回校安排干部学生转移，便毅然上路。第二天一早，不幸的事发生了。日军先头部队包围了学校驻地，反扫荡的战斗打响了。父亲临危不惧，指挥干部学员进行艰苦斗争。10月27日，父亲率干部和学员转移至沂南县马牧池以北地区，被日军先头部队突然包围于上岩峪。为掩护干部、学员，他奋不顾身，命令别人先走，自己坚持留在最后，掩护干部学员脱险。但终因弹尽负伤，不幸被捕。当晚日军断定他是共产党重要干部，特别严加看守，连夜刑问，次日经沂水、益都押至济南，关押至日军特务机关“泺源公馆”。面对日军的数次酷刑审问，父亲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1942年11月8日，年仅42岁的朱葆阶壮烈牺牲。

平生胸怀救国志，追求真理轻功名。
倭寇似狼国遭难，愤然投笔又从戎。
亲率健儿奔徂徕，独创“泰宁”建奇功。
“泺源公馆”血染处，英雄气节贯长虹。

这既是泰宁边区人民对父亲的缅怀之情，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于1955年亲笔签署命令，授予朱葆阶“革命烈士”称号。

1978年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他为“著名革命烈士”。中共宁阳县委、县人民政府在父亲牺牲50周年的时候，在家乡为他建立了纪念碑。在纪念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徂徕山起义50周年的时候，徂徕山起义原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赵杰在济南接见烈士子女朱炳时回忆说：“朱葆阶是当时我们徂徕山起义部队的大知识分子，是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的高级参谋，他为扩大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力量作出很大贡献。”同时勉励朱葆阶子女们继承父亲的革命遗志，努力完成前辈未竟之业。

我所知道的沈鸿烈

李继曾

一

沈鸿烈在1938年1月23日就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以后，对山东省政府人事加以调整，原韩复榘的秘书长张绍堂早已逃之夭夭，沈鸿烈想叫原青岛市政府秘书长胡家凤接任。那时胡在武汉，沈就叫原青岛市教育局长雷法章代理。后胡一直没来山东，秘书长就是雷法章了，雷还兼任民政厅长。财政厅长王向荣继任，教育厅长还是何思源的。建设厅长张鸿烈早已辞职，在曹县时建设厅长空悬无人。1939沈鸿烈在沂源东里店时，想从临沂专区或莱燕专区调去一个专员任建设厅长，所遗专员一缺，派他自己的人去担任。这样一换，靠近他的省政府有自己派出的专员，便于他个人指挥。那时他曾召集张里元（临沂）秦启荣（莱芜）去商议，张里元表示不当厅长，秦启荣表示建设厅长他去干，所遗专员一缺，秦又保荐他的部下朱永宝接任。实际上建设厅由他的秘书主任赵公鲁代拆代行。秦启荣带领他的五纵队打击八路军。这是沈鸿烈山东省政府四大厅厅长调整的前后情况。至于省政府下级职员，有韩复榘旧省府一部分，有青岛市政府一部分，还有少数投效的知识分子，及山东大学部分学生。

二

沈鸿烈就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他提出游击抗日，在敌后恢复国民党的政权。于是在曹县稍事整顿，3月间即分批北进，经郓城转东阿。这时，山东省政府一部分在东阿县张秋镇随之设立鲁西行署，行署主任李树椿。另一部分在东阿县西城办公。

1938年5月，《山东公报》在东阿县文庙内出版。沈鸿烈对《山东公报》社长杨沛如说："应当大力宣传国民党的军队英勇抗战。"当时国内形势是："七七"事变激起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老百姓一致要求抗日，国民党如再不抗日，老百姓就不再拥护，因此，他要作抗日的宣传，摆出抗日的姿态，争取民心。

山东省政府在东阿还成立了儿童宣传团。团长吴倩（女）是山东大学学生，传说是共产党员，在"太河"事件发生后，吴脱离了山东省政府。在东阿时，共产党员曹志真也去搞统战工作。我问曹志真沈鸿烈的山东省政府怎样，他说比韩复榘进步，但不是个革命的政府，在哪里都能抗日，何必跟着他瞎跑。

沈鸿烈为了在敌后恢复国民党的政权，在东阿县派出政治视察团，从鲁西至鲁北转鲁南，团长刘道元，团员10人，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有：陈胜孚、宋屏如、刘德轩、盛伟航、彭某（名字想不起来）。它的任务是：视察敌后国民党县政府工作情况，凡逃跑了的县长，他们可以电请沈鸿烈另行选派。如彭某于1938年秋，就接任了国民党的利津县长。

沈鸿烈深知欲在敌后活动，必须掌握足够的武装力量。他除派军事视察团深入敌后整编游杂地方武装外，将吴化文的手枪旅报请国民党中央扩编为新四师；成立教导一、二两个团，一团团长沈尹、二团团长刘冠雄；补充新四师和海军陆战队的兵员；招考一部分军干校的学生，后来会合鲁北、胶东所招考的学生，在鲁南蒙阴鲁村成立干校，共约400多人，一年结业，分发五十一军见习后，派往各县保安团充当下级军官。

1938年6月，沈鸿烈在东阿立足未稳，日军就出兵进攻，《山东公报》一版头条大标题："我军严阵以待，敌如来犯，决难得逞"。正在印刷时，日军攻占了东阿县的东城。拂晓时，沈鸿烈从东阿，率领山东省政府人员至聊城。这时聊城专员范筑先在共产党的协助下，高举抗日旗帜，坚决抗战到底。抗日民族先锋队在那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真是人人拿起刀（大刀）枪（红樱枪），齐奔民族解放的战场。"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收复我们的土地"、"收复我们的家乡"等抗日歌曲，到处都可听到。那时，在聊城这片土地上，看到了国共的合作，看到了枪口的对外。沈鸿烈在范筑先主持的欢迎大会上也大讲"团结抗日"、"共赴国难"。他在聊城约一个多月的时间，于1938年8月间去鲁北惠民。

三

沈鸿烈去惠民前，就派他的《山东公报》社社长杨沛如先到惠民，以代理山东省政府秘书长的身份和刘景良取得联系。刘系鲁东民团总指挥赵明远的副官，常在这个地区抓差办案。由于他在这个地方很熟悉，赵明远逃跑后，自己拉拢一些土匪，打起抗日旗帜，自称抗日游击司令。沈鸿烈到惠民后，即委任刘景良为惠民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刘得专员职务，更愿为沈鸿烈效劳。刘在惠民布置欢迎沈鸿烈的群众大会。沈在大会上讲："我到山东来，既没带来兵，也没带来枪，而带来了抗日的精神。只要大家团结，共同抗日，抗战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沈鸿烈在惠民得到日军出动的情报，即转移至沾化，后移动到利津。他看到刘景良在转移途中对他很忠实，决定在鲁北设行署，何

思源担任行署主任，刘景良的部队担任行署警卫。当时并派杨沛如去胶东，设鲁东行署，委卢斌为鲁东行署主任。沈在鲁北布置完毕，于1938年末向鲁南转移，在通过胶济铁路时，八路军渤海军区杨国夫司令员派所属十团三营营长刘斗臣护送。刘营长在返回途中，与敌遭遇，不幸牺牲。

雷法章在沈鸿烈未到鲁南前，即在蒙阴县的鲁村安下了山东省政府的摊子。沈鸿烈到鲁南后，决定在沂水县东里店建立省政府。东里店背山面水，是一个很幽美的山镇。沈在北山坡上大建省政府各厅处的房子。当时有人攻击沈说：“在战争年代，一切应当从简，竹篱茅舍的民房，一样可借用办公。”沈反驳说：“应当大兴土木，虽然花费了几个钱，而买的政治影响，就无法估计了。要使人人都能知道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仍然在山东。”

1939年春，东里店北山坡房舍大部建成，沈鸿烈的山东省政府各厅处集中在北山坡上办公，还办有电务班，会计班。教育厅恢复了学校教育，除恢复各地小学外，在东里店西南约50里的金星头办省立四联中（后迁安丘），校长李澄之。之后还在安丘县办山东省临时政治学院，院长徐轶千，提出“敌来则停，敌去复开”的口号，应付战变。建设厅就地取材，办有羊毛毯厂，桑皮纸厂。《山东公报》大量刊印发行。外围守卫部队新四师一部，在蒋峪击退了日军的进攻，回到后方的伤兵，受到当地群众的慰问，老百姓都知道东里店有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东里小店”一时成了“山东省会”。这时是沈鸿烈接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鼎盛年代。

四

1939年6月间，日军调集大批日伪军大举“扫荡”鲁南山区，先出动15架轰炸机，在东里店上空轮番轰炸。此时，烟火腾起，砖瓦飞天，房倒屋塌，老百姓争相逃命。这时，日伪军北路从益都向南，西路由博山向东，南路由沂水向北，东路由莒县向西，四面向东里店进攻。省府警卫部队教导一团根本没有战斗力，见敌人来势凶猛，不战而撤。省府各机关工作人员，手无寸铁，更无力抵抗。沈鸿烈下令疏散后，众人东奔西逃，分散潜伏。离家近的如日照、莒县、沂水、新泰、蒙阴、莱芜、临朐、淄博等县，都从敌人空隙里逃回原籍，有的就近在东里店南王庄德国天主教堂内避难；还有的远逃至临沂、费县投奔亲友。在逃难期间，天下大雨，山洪陡发，沂水河突涨，行至河中的山东省政府工作人员，溺死不少。

沈鸿烈在敌人扫荡东里店期间，和护卫他的部队多次被敌冲散。后来仅剩几个随从跟在身边。在最危险时，他怕被敌俘虏，拨出手枪准备自杀，被其亲近随从夏副官夺去，他们在一个小山坳小石屋内隐蔽下来。财政厅长王向荣、教育厅秘书主任刘道元逃至费县诸满镇，一个多月才返回。吴化文的新四师及海军陆战队避战转移，而日军侵入八路军防地时，却是遭到迎头痛击，老百姓说：“八路打，新四师转，省府人员被水淹”。日军侵占了东里店，就安下据点，长期盘踞下来，附近老百姓大遭其殃。

沈鸿烈不能再回东里店，就住在临朐县八区的东藜子村。召集收容失散的山东省政府工作人员，还派出人员四处寻找。后来人员聚集多了，东藜子容纳不下，于1939年11月，迁往蒙阴八区唐家沙沟办公。这时省政府的护卫部队是吴化文部，海军陆战队在敌人“扫荡”后，驻安丘泥沟一带，保护从胶东到省府的一条交通线。经过这次敌人“扫荡”后，返回到山东省政府的工作人员大都牢骚满腹，怨言百出，情绪低落，工作消极。沈鸿烈为了稳定其部下的情绪，于1939年11月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书记长李文斋及省党部常委等多人商议，在山东大量发展国民党员。凡山东省政府工作人员过去不是国民党员的，现在一律吸收入党，发“鲁临字”的党证。从此国民党的军事干部和政府

工作人员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员。另一方面，宣称李仙洲部奉命入鲁，开辟鲁南山区的局面。

五

1941年1月在遭受日军扫荡后，沈鸿烈转移到吕匣店子，经费仍需到安徽阜阳领运。由于交通不便及拨发不及时，经费很困难，有时无法维持。沈即电请国民党中央准予印“山东省民生银行”角券。批准后，从1941年初在山东省政府辖区内流通使用。这一辖区东到临朐寺头，西至蒙阴鲁村，东西百余里，受到民生券的影响，物价上涨。这时新四师的经费，公务人员的薪金，以及各旅团的补助费也都发给民生券。但民生券在外地不流通，影响外地粮食的购运，公务人员吃粮产生了困难。过去公务人员拿现金买粮食，这时改由粮站购粮食。沈鸿烈的省政府辖区一天天缩小，吃用粮食的人多，1941年闹起来粮荒。这时沈鸿烈困难重重，首先感到个人没有可靠的精锐部队保卫。海军陆战队虽是自己培植的人马，但为数甚少，力量单薄，负担不了护卫工作。过去依靠的吴化文，因沈鸿烈没答应保他当军长，现在和沈离心离德。再加上和于学忠、牟中珩的关系日益恶化，李仙洲入鲁只是有消息，而看不到部队。这样下去，身困沦陷区，既谈不上工作的开展，也难保住个人的生命。沈鸿烈反复考虑，决定赴渝述职。

1941年9月，沈鸿烈由吕匣店子动身去安徽阜阳，再转重庆。沈走前曾和吴化文商量，请吴化文派一个团护送过铁路，吴只派一个营。沈只有带着教导团，作为护卫的部队。行军途中，被日军发觉，尾随追击，教导团拼命抵抗，掩护沈鸿烈脱险。这次教导团伤亡很大，警卫队长赵学让、电务室主任沈仕祥阵亡。沈鸿烈走后，山东省政府主席职务由秘书长雷法章代拆代行，保安司令部由参谋处长宁春霖代理。

作者时任国民党《山东公报》印刷主任，后任总务主任、总经理

刘洪

唐士文

刘洪（约130—196年），字元卓，东汉泰山郡蒙阴县（治于今山东蒙阴县西南部联城乡城子村）人。杰出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据《后汉书》卷十二《律历》中梁剞令刘昭注引《袁山松书》称，刘洪系东汉鲁王刘兴的后裔。刘兴系光武帝刘秀兄刘縯次子。他“每有异政”。其子刘睦，“少好学，博通书传”、“能属文”、“又善史书”。刘睦子刘毅“并有才学”。刘洪生活在博通书传的家族中，自然会受到影响与熏陶，这种家族渊源是他成才的重要原因。

他早年好学，博览六艺群书，尤精天文、数学。其计算技巧，被誉为“当世无偶”。

刘洪于汉桓帝延熹年间（158—166年），“以校尉应太史征，拜郎中”。后迁常山国长史。汉灵帝熹平三年（174年），研究创制《七曜术》。古人以日月与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为“七曜”。《七曜术》是研究天文的历算。《晋书·律历志》称“刘洪又为月行迟疾交会及黄道去极度、五星术，理实粹密，信可长行。”这项研创工作，引起太史部的重视。因父去世离职。守丧期满后，他担任了常山国“上计掾”。他之所以充任此职，是因为他有广博的数学知识。这是一项需要庞大数字计算的会计工作。后又被征召入京任郎中。光和元年（178年），议郎蔡邕在续补《汉

记》的《律历志》和《天文志》时，建议朝廷让刘洪与他合作，共同撰成《汉记·律历志》。其中许多资料都被后来的《续汉书·律历志》所采用。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中的《律历志》，就是后人从司马彪的《续汉书》里取出来补进的。就在蔡邕与刘洪合撰《律历志》、《天文志》期间，蔡邕被宦官程璜诬陷流徙朔方，刘洪离开东观，改任谒者，转补城门校尉所属的谷城门侯，掌管洛阳城十二城门之一的谷门守卫。其间两次被召参与天文、历法的评审。后刘洪出任会稽郡东部都尉，又调东莱郡任曲城侯国相。在担任地方官期间，“政教清均，吏民畏爱，为州郡所礼异”。约从光和初年开始，刘洪根据以前研究积累的成果，又经过十多年的观察计算，创制了《乾象律》。《乾象律》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考虑到月球运动不均匀性的历法。

东汉以前，我国的历法都把月球的速度当作不变的常数，以朔、望的周期来计算“朔”，这样算出来的“朔”，后来称为“平朔”。东汉时人们发现了月球运动的不均匀性，就设法对“平朔”加以修正，以求出真正的“朔”，称为“定朔”。刘洪在《乾象历》中，首先提出这方面的修正算法。在推算日食、月食时采用定朔的方法，测得白道和黄道约成6.1分的夹角，近月点的长度为27.55476日，和现在的测值27.55455日，相差其微。

东汉经学家郑玄在建安元年（196年）对刘洪所授《乾象历》进行了注释。三国魏黄初年间（220—226年），魏国准备改历，太史丞韩翊造《黄初历》，魏文帝曹丕恐其不精确，令与《乾象历》互相参校。三国吴孙权称帝之前，早年跟刘洪受业的魏国人徐岳将《乾象历》传授给吴国尚书阚泽。吴国于黄武二年（223年）正月废《四分历》，改用《乾象历》，直到吴亡（280年）。

西汉时的天文、数学家张苍、耿希昌等人，综合前人数学成果加以修订补充，编成《九章算术》一书，到东汉初年正式出版。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说：“郑玄、刘洪、王粲等人都精通《九章算术》。”

珠算，是用算盘进行运算的工具。珠算的发明，使人们的计算能力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珠算”这个名词，最早见于徐岳所著的《数术记遗》一书。徐岳在书中说：“刘会稽，博学多闻，偏于数术……隶首注术（隶首，传说中的黄帝之臣；注术，指有关数学理论的书），仍有多种……其一珠算。”徐岳所说的刘会稽就是刘洪。刘洪晚年任山阳太守，卒于任。

梁武帝萧衍传旨
和尚从此不准吃肉食

吴正翔

梁武帝萧衍

素食之风，古已有之，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十分盛行。古时吃素，倒不是由于当时经济落后，没有肉吃，只能以瓜菜裹腹，而是那时已经出现了“养、助、益、充”的饮食观念，提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这在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就有详细记载。但主要的原因，还是老庄清静无为哲学思想的影响。一大批隐逸的文人，崇尚自然，认为吃肉使人气浊，吃素使人气清。追求清气，极力奉行素食的原则。

吃素本是一件好事。但发展到后来，就走火入魔。可见凡事不宜太过。《汉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个叫周泽的人，餐餐吃素，以致营养不良生病。老婆怪他，讲何苦这样把自己折磨。周泽一听，火冒三丈。马上以“干犯斋禁”的罪名，把老婆送进监狱。“干犯斋禁”，当时可不是小罪，大概和现在的“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差不多。至于“坐斋不谨”，则要杀头。“坐斋不谨”到底是什么罪?不详细考证，绝对猜不出来。其实好笑得很，不过就是吃素的时候，不小心放了屁。放屁而被杀头，恐怕谁也料想不到。

吃素的传统，后来竟被从外国传入的佛教，一把抢过去了。

和尚原来是可以吃肉的。佛经《戒律广本》写得很明白：佛教没有吃素的规定。佛家禁止吃的是“荤”。这个荤，不是我们现在的概念，指鸡鸭鱼肉一类的动物食品。我们现在讲的荤，佛教叫做“腥”，而不叫“荤”。佛经里荤字不读hūn，要读成xūn，熏的意思，指气味熏人的蔬菜，“荤乃蔬菜之臭者”。《梵纲经》讲得更具体：“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

葱、慈葱、兰葱、兴渠是五辛”，荤就是这五种蔬菜。荤字从草头而不从肉旁，说明荤的原始意义，是植物而非动物，至于荤为什么从植物变成了动物，三言两语说不清，不再赘述。佛教认为吃了荤，耗散人气，有损精诚，难以通于神明，所以严加查禁。有两次，我到庙里吃斋，看到菜里有葱有蒜。可见庙里的和尚，佛经还没有读通。那么多的斋，算是白吃了。

和尚可不可以吃肉，需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不搞一概而论。佛教分为大乘与小乘。大乘是一心度人，以自度为度人手段，所以什么肉都不能吃。小乘但求自度不求度人，允许吃三种“净肉”（“三净肉”为“一我眼不见其杀者；二不闻为我杀者；三无为我而杀之疑者”）。对于“比丘患病者”，即生了病的和尚，实行人道主义政策，特殊照顾，什么肉都可以吃。如今，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的和尚，中国蒙、藏、傣等少数民族的和尚，都允许吃肉。

佛教在引进中国的初期，还来不及形成中国特色。所以那时，和尚还可以吃肉。和尚不准吃肉，是在1400多年以前，南朝的梁武帝萧衍首先提出来的。

在中国历史上，萧衍可以算是最可爱的一个皇帝。他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想当和尚，想得几乎发疯。竟然先后四次擅离职守，跑到同泰寺，把身子舍给庙里，去当和尚。一个皇帝，自动放弃一切合法权益，连身体都舍掉，变成了同泰寺的庙产，当然不会再管朝廷的事。可是当时，没有副皇帝，可以在皇帝不能履行职责时，依法代行皇帝的职权。那时又不兴临时任命代理干部，萧衍不驾崩，谁也不能当皇帝。“国不可一日无君”，事情简直麻烦透了。满朝文武，不知开了多少大会小会，进行过多少紧急磋商。讨论来，研究去，惟一的办法，还是只能把皇帝赎回来。于是马上从国库提出现款，找同泰寺洽商有关购买事宜。同泰寺见有利可图，当然进行配合。终于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用等价交换的办法，把萧衍收购回来。立即恢复他的人身主权，让他继续担任领导职务。萧衍坚决舍身，怎奈级别太高，还是身不由己。仅仅有利于同泰寺，一次又一次地创收。假如不是无限忠诚于佛教事业的萧衍，换成别人这样做，那只能认定是为了得回扣。

萧衍手不释卷，一部《大般涅经》，烂熟于心。经书里规定：“戒杀生”。萧衍想，就杀生管杀生，肯定管不彻底，还是要从根本上抓起。活学活用，干脆不准吃肉！肉不能吃，看你杀生还有什么用！一经决定，立即行动。紧急传旨：臣民提倡吃素。和尚一律不准吃肉。天地神明祖宗，享受和尚待遇。何谓和尚待遇?即祭祀天地神明祖宗的供品，不准再用三牲猪头，统统改成面粉做的猪头猪肉。金口一开，一呼百诺。一时，素食者“天下户口，几去其半”。

可见，和尚不准吃肉，完全是萧衍从“不杀生”的观点衍化出来的规定。

老城夜话 （连载）

刘家骥

王府石狮阅春秋　县署彩壁话沧桑

在封建社会，门前安放石狮是有规定的。政府部门最低是县衙门，官员的府第是大夫第（知府级）。平民百姓的门前是不准摆放石狮的。临沂古城的石狮是有数的，最古老者为泾王府门前的石狮。石狮雕刻甚精，为古城石狮中最佳者。其他还有府衙内大门前的一对明代石狮，县衙前清初的一对，道台衙门前明代的一对，另外就是各庙宇门前之物了。孔庙门前、东岳庙和城隍庙山门前之石狮皆为明代所刻。南关关帝庙（山西会馆）门前的石狮为清初之物。另外还有两个不成对的石狮一个在南当铺巷东首，一个在道门者西侧，皆是宋元时代之物。东井神楼门北侧还有一个是汉代的柱凿石狮。官员府第只有一家有石狮，那就是“光禄大夫门第”门前的一对晚清时代的石狮。其他做过将军和知府的公馆其门前只是有一对小石狮。一般进士举人拔贡级的门前只能有一对旗杆台了。这是古城石狮的大体情况。

明泾王府门前的石狮，现在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纪念堂前

雕刻最精细保存到现在的当属明泾王府门前的石狮了。泾王撤藩后王府大殿的建材移至孔庙改建为大成殿，王府门前的石狮便挪到白衣庵山门前。清初在城西北域建协镇署（俗称协太衙内），又将这对石狮移至协镇署门前。这对石狮在古城见证了多少历史事件：明末的高明衡与义军守城抗清，清代的幅军军师刘淑愈在城内被杀害。民国初年协镇署改为驻军司令部，它见证的历史事件就更多了。如首任统领为张培荣、镇守使翟文林、师长方永昌、师长杨虎城、师长展书堂、旅长李占标。最大的历史事件是1938年日寇进攻临沂。日机每日前来轰炸临沂城，最大的目标就是这驻军的司令部，整个建筑被炸成一片火海，只剩下门前的这对石狮。从此这对石狮一直守着这片废墟。直到1945年古城解放，人民政府才将这对石狮移至五贤祠保护。这对石狮还见证了罗炳辉等新四军首长前来五贤祠参观怀古；1947年被见证了蒋军师长周志道、土匪司令王洪九等人在五贤祠的丑恶表演。1949年这对石狮又移至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堂前。1966年“文革”时这对石狮被推倒。文革结束后这对石狮又被扶起，守卫这庄严的革命烈士纪念堂。

影壁是古城居民的大门内对面的墙壁，一般正中有一个福字，而官府和庙宇则是东大门外的对面有一大影壁。孔庙的大门对过原有一大影壁，正中是一石雕的团龙。考院大门对过也是有一大影壁。变化最大的当属原县衙前的那座影壁了。

这座影壁始建于清朝。县衙大门南面正对着今沂州路。这座影壁上面的图案和画像见证了临沂历史上的几个时代。清朝时，上面绘着一个“獬豸”。这是一只独角兽，它是向官员警告执法要公正，否则会受到它的惩罚。辛亥革命后，这个“獬豸”被换上了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星（红黄蓝白黑）。袁世凯当上总统后又换上了袁世凯的画像。袁世凯称帝倒台后又先后改为黎元洪和曹锟的画像。北伐胜利后，又画上了孙中山的画像。城内居民都知道，大影壁上一换了像就是又“换朝了”。日伪统治临沂时，影壁上则是大汉奸汪精卫的画像，两旁还写上“中日亲善”、“王道乐土”。1945年老城解放后，旧县衙成了山东省政府所在地。美术老师韩一卿在大影壁上画了毛泽东主席的画像。1947年国民党军队占领临沂后，83师的一个军官画了蒋介石的画像。1948年临沂再次解放后在上面写上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字。1950年又由师范美术老师田玉峰画了毛主席的画像。1958年为方便交通将大影壁拆除，这座历尽沧桑的大影壁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座影壁还有恐怖的一页，在清代还是犯人站木笼的地方；民国时翟文林还在上面挂过人头。

止春节不得人心　禁鞭炮枉费心机

春节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临沂城的历史上曾被禁止过。事件发生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至临沂城，军阀方永昌逃遁。3月23日北伐军正式入城，实施了国民党的新政，成立了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民团组织。对居民仅是要求男剪辫子女放脚。到了民国十八年（1929年）革命形式则更进了一步。为解决校舍问题，将不少的寺庙改为学校，并将各庙之偶像去掉。这一措举得到了教育界的欢迎，但是寺庙的僧道和迷信的居民则大为反感。接着又宣布废除旧历改为新历，禁过旧历年（春节），阳历年时命令各商户大门均要贴对联以示过年，但均无人响应。

矛盾的突出点还是春节。政府宣布禁止过旧历年，可春节来到，家家户户仍然忙着过年。家家户户照常贴上了对联，家中照常敬天地敬祖先迎灶王贴门神等。住城的国民党党部马上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强行禁止。他们召集各学校教师带领学生到各街巷居民家中去禁止。这一举动惹恼了广大居民，因此对革命和新政产生了不满情绪。人们编出了不满的歌谣：“北阀军进了城，百姓大年过不成。不敬天地忘祖宗，到底革的什么命。”居民还骂学生是“随了洋教的洋学生”，骂老师的就更难听了。临沂城这次禁春节的活动使当时

政府失掉了民心。事后当局总结时承认要废除这数千年的过春节的传统是行不通的，因此第二年春节就不敢再强行禁止了，只是提示了过春节要破除迷信，对卖香纸灶王像的加重税收。第二年的春节比往年更加热闹，鞭炮声彻夜未停，拜年的居民川流不息，民间也没有怨言了。

违背民意的事任何时期都是行不通的。日寇占领临沂后接连发布了不少的禁令：首先是停止了每年一度的庙会。其次怕八路军攻城停止了南关大集，只准在阁子门外有个小集。四城门皆设了岗哨，出入行人皆要出示“良民证”，还要搜身，而且规定居民不准再登城墙和城门楼。正月十五“走百病”的习俗也被禁止了。过了不多久，又通知每晚8点至早晨6点全城戒严，居民不得外出。又有汉奸向鬼子告密说居民办丧事有扎“打路鬼”的，这是有意侮辱“皇军”，因此所有扎纸店皆不能再扎“打路鬼”了。更有甚者不准居民在婚丧嫁娶时点放铁炮。到了春节，又张贴出布告严禁居民放鞭炮。在四关年集上将卖的鞭炮全部没收。这样一来整个春节就再也没有鞭炮声了。广大居民十分不满，编出了歌谣私下传：“日本鬼进中原，禁放鞭炮过哑年，炮仗不响不要紧，八路的真炮一响送你上西天”。原来不让放鞭炮是怕八路军乘机攻城。正像民谣一样，时过不久，城外八路军不断打击日军，拔除日伪据点，缴获了大量武器。城内居民一听到城外的枪炮声，就知道又有鬼子的据点被拔掉，1945年日伪在城外的最后一个据点河东小黄山据点被拔掉，这次没有听到枪声，因为据点内的汉奸一枪未放就投降了。像汤头、白沙埠、李官等处顽抗的日伪军真的像民谣所云：“八路军的真炮一响送您上西天”。1945年临沂城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全城鞭炮彻夜不停，不光是庆贺春节，更是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

名厨云集朝阳寺　鼓乐汇演三皇庙

临沂的厨艺自古有名。当年乾隆皇帝南巡路过沂州，知府李希贤为招待乾隆，特意培训了一批厨师，从此这批厨师的烹调技艺一直被传承下来。

厨师和饭店业也有他们的祖师，但不是什么古人而是“五祀”当中的灶神。据《白虎通》所载：五祀是指门、户、井、灶、中霤。故此厨师皆奉灶神为祖师。而五祀中的灶神又和“灶王爷”不太一样。灶神是庙祀的。古城的东南隅有一座朝阳寺，寺内除佛殿外还有财神殿、灶神殿。这灶神殿正中供的是灶神，两侧是门、户、井、中霤四神。临沂厨师的行会活动也就在这个殿中。每年的正月初一是灶神的生日，全城的饭店业在此集会，敬灶神并交流烹调技术。

锅塌豆腐盒

城关内外大小菜馆饭店皆会集在寺内。厨师行会有会首。现在能记忆到的会首有当年泰盛馆的康云泰、泰丰馆的高钧等人。会首先带领大家祭祀灶神，然后开始交流厨艺。在事先搭起的一个大棚内，几位名厨便开始表演他们的拿手好菜。这其中有泰丰馆的厨师高钧表演锅塌盒的制做艺术，大不同饭庄的张殿佑表演自由饼、水晶包的制做过程，益丰楼李庆裕（李歪嘴）制做拼盘的特技（所谓拼盘就是每盘中有多样小菜，一般是二拼，但他能做到四拼八盘所有小菜皆不重样），义顺面馆刘顺昌制做的韭芽鸡丝和松子虾仁，德和楼吕忠祥制做的香肠和板肚，庆来馆冯文经（冯瞎子）制做的清汆鲤鱼，小乐园宋德成（宋麻子）制做的脱骨扒鸡，顺和居杨饺子制做的活馅饺子，竟新餐社商化南制做的蟹黄包子，庆丰馆李兴玉制做的玉兰鸡片，玉峰饭店刘华铁制做的油闷对虾……。这是几家有名的餐馆和名厨。做好的饭菜一部分由大家品尝，一部分卖给赶会的游客。临沂城的美食人士很早就在此占下席位等候名厨表演后品尝这些美食。

这样的集会持续三天，最后一天还要再祭拜灶神。这灶神只是一个古代老者的塑像并非春节时灶王爷两个老婆的画像。

临沂民间的鼓乐者俗称吹鼓手。旧社会吹鼓手虽然入下九流，但上流的活动确离不开它。不但婚丧嫁娶用鼓乐，就是春秋两季祭孔、祭武，祭天地坛、五贤、先贤、右军祠、左公祠，也皆要用鼓乐，官府县府两级衙门内，每年从腊月初一至春节知县和知府吃饭时也要奏乐，平日宴请长官时也要奏乐。这样几个乐队整日是十分忙碌的。乐队分粗细两种，粗者为喇叭锣鼓，细者为笙笛箫。祭孔时还要加云锣排箫四胡，平时有一班的，也有用两班的。江湖上称他们是“楼上的”。他们也有祖师爷，那就是古舜帝。因古书上说“大舜作乐；百兽率舞”，所以吹鼓手皆供奉舜为祖师。这些乐户有人请时即集合去奏乐。平时还自己各有职业。如打鱼、挑水、搬运等杂活。因此这些人是非常贫苦的。

这些乐队也有集会的日子。每年的正月初十各路乐队皆到南关西园的三皇庙去集合。这庙中既有三清殿也有三皇殿，还有三官殿。这三官乃是天官尧、地官舜、水官禹，乐队的祖师还是舜帝。他们前来是祭拜祖师舜帝的。各地的乐队按次序在三官殿前演奏。这天庙会虽无戏上演但有这乐器会演也足够热闹的了。最热闹的时候还是到下午三点左右，全体乐队近千人排队出发沿途演奏进南门，经沂州路至县衙前向西转，至颜家巷口向北直至衍庆庵。因庵内也有一个三官殿，这是进香的最高潮。在此上香后才散会。这种民间自发的音乐演奏至1938年日寇占领临沂后被禁止了，从此再也没有会演过。

金银店无楼称楼　中药铺有屋即堂

临沂金银器的制做店，虽然没有楼，但皆称银楼，过去沂州路上就有多家。这些银楼既打造金首饰也打造银首饰，但从来不称金店。银楼一般的是前面设门头卖成品，后面是作坊打制各种金银首饰。他们制作的首饰主要有四大项用途：一是婚嫁用。有新娘佩带的各种首饰，头饰如耳环、头花、发钗、发卡等，手饰主要是戒指和手镯。有钱的大家还要打造银壶、银杯、银筷、银匙等餐具。二是生小孩后送礼用。都是给小孩佩带的银饰，如手镯、项圈、银锁、莲蓬印及各种帽饰等。三是用于殉葬的各种银饰件。如银鱼（口含）、银如意（手握）、照路花（颈戴）等各种饰件。四是庆寿用的饰件。如银寿星、大型银如意等。到民国时还增加了各种证章、纪念章、银牌、银盾等物件。

制作首饰的用料来源有两个。一是矿银。多来源于本省招远金矿生产的白银。二是用银元、银元宝和旧银器加工成银饰。他们还能将旧银器变新称“渎皆”。黄金首饰的制做更加精工。原料也是来自招远金矿生产的赤金。其饰件多是金戒指和金耳环。多是婚嫁时男方买了送给女方的。只有有钱的人家才有金手镯。无论金器和银器上面皆要打印上该银楼的字号和“足赤”、“足纹”等金银的含量。

银寿星

古城在抗战前的银楼多是“宝”字号。如李德永（李胖子）的文宝、张义聚的德宝、冯文福的聚宝、杨振起的天宝、刘家成的天宝，其他如王庆昌的益祥、崔延章的惠祥、韩兆鄂的泰东等。解放后实行了合作化，成立了临沂银器加工店，文革时彻底取消了这一行业。工人改行修车、打铁桶等。

临沂的中药店名皆称堂。既有本地人经营的，也有外省人在此经营的。其药材大部分来自河南、四川、云南等省。除了本地销售外，还向七属（沂州府下辖七县）的药店批发。对购进的生药材还要进行加工。有的还要制成丹散膏丸。这些加工师傅多是河北省祁州人。他们的切药配药工艺很高，其技术达到了“乌药不见边，槟榔飞上天”的程度。所用工具亦是祁州所产。他们的工资待遇皆高于本地职工。店中站柜台负责抓药的皆是学徒三年出师后的职工。学徒是不准站柜台抓药的，他们只准干些杂活。站柜台的伙计不但对各种药材十分熟悉，而且对城关各位中医开的处方一眼就能看出是谁的手迹。如遇到处方是剂量过高或有剧毒的药物如藤黄、砒霜等，还要向坐堂的医生请示，以免出问题。

药店聘请的坐堂医生都是药店的台柱子，他们都是城内的名中医。坐堂医生既要给病人看病开处方，又要对取药的所持处方进行验查，对病人要绝对负责。所以坐堂医生的水平直接关系到药店的生意是否兴旺。经常坐堂的中医有：秀才卢其慎、刘宪邦、陈伯熙、沈桐华、姚文灿……外省在此经营药店的有江西姚姓家族的人，他们的堂号是姚德全堂，简称姚德全，兄弟两家经营的药店皆称姚德全，除本城有几家药店外，在北乡俄庄还有分店。河南人在本城经营药店的有苗姓开设的复元恒堂，简称复元恒，店主名苗文彬，经营甚是有方。该店多从安徽亳县和广东、四川购进药材，此店一直经营到解放后公私合营。

本地人经营的药店有：广德堂、义成隆、永春堂、世德堂、人和药栈、同德堂、培生堂、恒济堂、博济堂、源和堂、恒春堂、万和堂、春生堂、德鑫堂、增寿堂等。这些中药店分设在城内南北大街和东西大街及南关大街；北关和东关还各有一家小药店。就是这些药店和中医一直为医治城关的病人服务。另外还有几家膏药店和针灸铺，虽然也称堂，但他们入不上中医的行道。

走百病居民登城　镇五毒画师忙碌

走百病这一习俗由来已久。明代小说《金瓶梅》中就有具体的描写，这说明临沂人在明朝就有此习俗了。抗战前的临沂城每年的正月十五即有一年一度的走百病习俗。据说这

五毒兜肚

天出外行走能走去百病。这也是人们对健康的一种期望。

临沂城走百病是有固定的地点和行程的。地点就是城墙上，行程就是绕城墙一周；走完全过程就算是能够走去百病了。城墙周长九华里，必须全部走完，到每个景点还要停一停。十五的早晨四城门的马道门大开，城楼上的庙宇早已是张灯结彩，楼前的宝鼎内香烟缭绕，楼上钟鼓之声早已响起，似是对人们的召唤。城关居民多在自己附近的马道登城，其方向皆是顺着一个方向如登南门者即再东奔东门，再向北门西门最后回到南门；因城墙的厚度仅有一丈，大家顺着一个方向走可避免人多拥堵。集体者还有秧歌龙灯等为前导，到四门庙宇时还要上香敬神。四城楼因比较宽阔，就有卖小吃和儿童玩具的，实际上就是小型的庙会。

正月十五还有一个习俗那就是到道教的宫观去打“平安醮”，祈求全年的平安。由于这四城楼又皆是道教的庙宇，故又是打醮的好去处。南门城楼上的庙宇由南瓮城三义庙的马道士看管，东城楼庙宇由东关关帝庙刘道士看管，北城楼庙宇由城隍庙周道士看管，西城楼庙宇西关东岳庙由顾道士看管。故此四城楼打醮的道教音乐不绝于耳。走百病还是妇女外出的好时日，有钱的大家妇女皆乘坐二人抬的小轿登城走百病。

夜晚四城楼及魁星阁、平野亭上皆悬挂彩灯，城楼上还燃放焰火，甚是热闹。这时多是男人们欢乐的时刻，妇女就很少有人登城楼了。再说在城东南角的魁星阁上供着魁星，一般人没有来参拜的，只有科举的读书人和民国时想考学的学生前来拜魁星。

经过一天一夜，这走百病的活动就结束了。

端午节在临沂也是非常热闹，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家家门上插艾，人们用雄黄和白矾涂在身上防虫咬，手腕上佩戴五色线，制作香袋佩在身上（称作香荷包）。当然一定要吃粽子，因当时北方无糯米故皆用黍米，俗称黄米，只有少数有钱人家才用糯米。除了自食外还要赠送亲友。在自家节日和宴会上还要喝雄黄酒，这些皆是消毒杀虫的举动。

还有一项带有艺术性的习俗那就是要给小孩佩戴“五毒兜肚”，这件兜肚上要请人给画上五种害虫被一只老虎镇住。老虎要画在正中，四周是五种害虫：蝎子、蜈蚣、壁虎、蛇、蟾蜍。一般要用黄布再用红色画上老虎和五毒。据说小孩佩戴上“五毒兜肚”就能全年避开这五种毒物的伤害。这五种毒物除了蟾蜍以外皆是能伤害人的。但不知何故将蟾蜍也列入了五毒之一。这时会画画的先生都被请去给人家画画，请不着绘画老师的就只好请扎彩铺的扎纸匠来画，所以这又是扎纸匠的一笔好的收入。

蒙阴古八景遗址巡访题咏

党宝修

其一　蒙阴古八景之南山仙洞并序

蒙阴旧志载：“仙人洞，在城南五里蒙阴山上，广容百余人，汉承宫隐此，为本县八景，曰南山仙洞。”此地古时有齐鲁名士隐居，故又称仙人洞。辛卯岁暮，余与赵青昆等游蒙阴山仙人洞，探寻古迹。此洞位于蒙阴城南2.5公里蒙阴山之阳悬崖上，洞口朝南偏西。洞南北长19米，东西宽15米，高4.5米，顶部穹窿，四壁奇丽，宛如一大客厅。在此仰望山顶，松柏点点，俯瞰河流如带，风光秀丽，景色宜人。自古以来，就是齐鲁名人隐居游览读书赋诗的地方。翻检旧志，举凡蒙阴历史知名文士多有此洞题咏。该洞保存基本完好，洞口下一巨石上刻有宋代至和、元佑年间摩崖题刻。两壁上有四幅人物浮雕，三人佩剑，一人吹笛，神态怡然自得。洞内存有石碑两块，一为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十月立，上刻进士、户部郎中李炯然所书《游仙洞诗并记》，内有“隆冬居之则忘其寒，盛夏居之则清气逼人”等字句；另一碑为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蒙阴县知事蒋钺立，上镌八首诗。惜乎今人仿冒舔刻多幅图像，洞外石壁亦有加刻字迹，多设计粗糙，刻工鄙陋，意为保护，实则损毁。

仙人洞窟自春秋，辛卯隆冬踏访游。

姑幕承宫能执苦，任丘杜洽却寻幽。

蒙阴古八景之南山仙洞

岩阶粗放浮雕拙，栈道险危断壁虬。
胜地曾经铭考证，蒙阴山上漾风流。

其二　蒙阴古八景之龙泉漱玉并序

壬辰惊蛰前三日，与赵青昆、刘灵寻访蒙阴古八景之龙泉漱玉遗迹。据记载龙泉位于蒙阴县常路镇龙泉寺前河南，古泉水势汹涌，喷水成柱。上世纪七十年代，该泉被砌成大口井，泉景消失。驱车至龙泉寺，于常路镇龙岗埠村高阜处现一肃整禅院，矮墙新筑，唯一大殿虽为旧存，新葺之处仍灿然在目。勘院内残碑，有御碑衮龙帽一座，乃龙泉院旧址。查《蒙阴县志》（康熙十一年版）有嘉靖六年明南京工部尚书崔文奎撰《重修龙泉院记》载，东蒙望族秦复安、秦纪于嘉靖三年二月始，历时两年零六个月，耗银五百两重修龙泉院。建成山门、佛殿、观音殿、伽蓝殿及塑像，寺院一时宏深壮丽，金碧辉煌。抚今追昔，此泉不再，然依泉成寺，寺以泉名，村前尚有村民寻泉掘出之大坑深井，古龙泉胜景当不谬也。访问当地八旬老人得知，寺前河南泉边原有古碑数幢，记述当年龙泉漱玉之胜景，寺前古泉水虽已消失，但寺前河东上游不远处有一南泉现仍旺盛，当为此泉水脉上移。余等意兴前往，果如其言，见一喷涌泉源，水量巨大，泉边村妇浣衣者众，为周边数村供水水厂之源泉，泉边赫然见“临沂市地震群测骨干观测网蒙阴常路观测站”与“南泉电灌站常路公社战山河民兵营”等字样碑记。另据清康熙二十四年《蒙阴县志》载，龙泉漱玉“在城西四十里汶南村，水势喷薄，淙淙作碎玉声。夏月临之，泠然忘暑。”此泉在新泰市汶南村南与果庄村北处青石山岭东北处，原蒙阴县曹庄煤矿生活区后，现仍奔流不止。由于行政区划变更，今已划归新泰市，此景已不再隶属蒙阴县，俟异日寻访之。有明一代邑人名士公跻奎、公一扬、杜洽、周京等均有此景题咏，今成一首以纪此行不虚也。

龙泉漱玉志乘传，题咏先贤编旧年。
尽管平川生雨雾，曾经丽水起霞烟。
断碑残碣雪泥后，古寺晨钟鸿爪前。
秦氏东蒙流誉地，姬翁踏访泫然牵。

附录：刘灵《访蒙阴古八景之一龙泉漱玉并序》

壬辰二月，天气晴暖，微风。由同窗杨成波引路，与党宝修、赵青昆二兄同赴常路探访蒙阴古八景之一龙泉漱玉。据载“龙泉位于蒙阴县常路镇龙泉寺前河南，古泉水势汹涌，喷水成柱，蔚然成观。”今欣然前往，龙泉漱玉已无存，余龙泉寺一座，彩塑若干。庙后残碑横斜，碑额赫然。归，诗以记之，兼和党兄之韵。

观史徜徉八景间，山阴僻道觅龙泉。
高堂佛影呈浑穆，古院碑身证废迁。
老犬横门惊远客，枯藤垂壁落缁衫。
千年漱玉不知处，怅望烟村问逝川。

其三　蒙阴古八景之堂阜脱囚并序

堂阜，现蒙阴常路西高都庄一带，古邑名，始于西周，为齐国重镇，其名历朝历代沿用不废，清末以河为界，筑南北围子。著名历史掌故管仲脱囚即发生于此。据蒙阴旧志载：“左传庄公九年桓公杀子纠，管仲请囚，鲍叔牙受之，及堂阜而脱之，即此，今为本县八景之一”。“在城西北三十里西高都庄，世传管子脱鲁囚处。旧有夷吾亭，今久废。”据《沂州府志》载：“堂阜，左传庄公九年管仲脱囚于此。杜注：蒙阴西北三十里有夷吾亭，即堂阜也”。关于堂阜脱囚一事，《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

蒙阴古八景之堂阜旧址

鉴》均有记载，后人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在南北围子村中齐鲁界河边刻立齐鲁交界碑，并建夷吾亭。壬辰春分前六日，与赵青昆、王友国等赴西高都庄探访究竟，惜乎碑、亭具无，唯野老口碑与矮墙新绘壁画依稀铭记千古佳话。

高都野老聚街衢，千载夷吾说有无。
管鲍之交垂史册，鲁齐于此分疆图。
难寻遗迹空凭吊，许信流言徒叹吁。
堂阜依稀风物旧，春秋霸业将相扶。

其四　蒙阴古八景之张子书堂并序

壬辰小暑前三日，与李世英、王思敏赴蒙阴县旧寨乡书堂村张子书堂遗址访古。元人张埜中进士第，弃仕从教，创北麓书院，以教读终。清康熙二十四年《蒙阴县志》载："张子书堂在城北三十里，莫庄河之西北，即北麓书院也，久废"。清宣统三年《蒙阴县志》载："以荐举召入太学讲经，授翰林检讨不就。"清道光十年《张子书堂重修碑记》载：原书堂五间，乃元张埜义学。凡入学穷困者免学费。如今旧址辟为农田，了无痕迹，赖村民指示得见断碑残碣参差于沟渠。蒙阴县古八景之一，文人墨客多所题咏凭吊，良有慨也，故继之。

有元张埜节名长，断壁残垣野草香。
旧寨依稀陈俎豆，新村仿佛荐椒浆。
石墙错落砚池淡，山道蒸腾桃李光。
隐学心归辞不就，千年以降犹芬芳。

其五　蒙阴古八景之中山晚照并序

中山地处蒙阴县坦埠镇，居泰山浮来山一线之中点，故名。中山寺始建于隋，兴于唐，复建于宋元丰年间。清康熙二十四年《蒙阴县志》载："在城东北六十里坦埠集之西北，有中山古刹，昔年金碧辉煌，今就倾颓也。"中山寺群山环绕，林木蓊郁，自成一闭锁区域。中山晚照是蒙阴古八景之一，亦列沂州八景之一。白居易苏轼皆有诗句刻石留于

蒙阴古八景之中山寺

寺内。铸于金大定二十八年重达一吨之铁钟犹存，击之清脆嘹亮，声振数里。香火鼎盛时僧闾五百有余。今人于此开凿山洞，设置厂房，开发度假酒店，设景俗套，幽雅不再。十数年来，数度造访，据载寺内原有空透玲珑之响石与宋真宗御制响石碑早已无存，维植于汉宋之古槐柏与银杏树群至今生机盎然，令人感喟。

晨钟暮鼓泛清音，佛寺有灵名古今。
碑石玲珑余矮座，柏槐朴茂落鸣禽。
乐天旧迹已无觅，和仲新辞犹可吟。
西望泰山临化境，浮来坦埠气森森。

其六　蒙阴古八景之蒙山叠翠并序

蒙山海拔1156米，山东省第二高峰，古称东蒙、东山，又有云蒙、中蒙、龟蒙等异称，素称亚岱，为泰沂山脉余脉。清康熙二十四年《蒙阴县志》载：蒙山叠翠“在城南三十里，山绵亘三百余里，历费、蒙、沂诸境。邑居山之阴，远眺岩峦，苍翠欲滴。”古圣先贤多所吟诵赞叹，名胜古迹众多。

白马紫荆烟雨浓，群峦积翠接连峰。
重林悬栈风勾勒，层雾回鸾云锁封。
九女守山擒猛虎，二郎栽树驭蛟龙。
骚人入此多沉醉，漫走霞笺写墨松。

其七　蒙阴古八景之磅峰卓笔并序

磅者古山名，今青云山是也，在新泰市东南郊青龙路东首，面积一平方公里，西北东南走向，海拔495米。该山东南陡峭突兀，西北平缓，裸岩较多，植被稀少，远观近勘，颇具画意。磅山春秋时曾列入鲁国祀典，因避鲁武公名讳而废。北宋宣和二年宋徽宗以祷雨应验，封磅山山神爵号“溥灵侯”，庙额“孚泽”。该山曾隶辖蒙阴，或为泰蒙分界，蒙阴视之，孤立高耸，凌空飞峙，宛如巨笔卓立插入云霄，为蒙阴古八景之磅峰卓笔。清康

熙二十四年《蒙阴县志》载：“在城西北四十里，跨新泰县界，一峰插云，望之如削。”磅山削壁亦列新泰古八景之一，清顺治《新泰县志》载：“山形尾乾而首巽，其势欲走。孤峰嵯峨，悬崖壁立，见于百里之外。昔人曾避兵于上。一方胜概也。”壬辰大暑日，与赵青昆、马均潭、刘灵挥汗同登。山顶有玉皇殿，山上奇石遍布，拟人肖物，转侧异态，绝顶之下，壁削万仞，古洞幽邃。山半三官庙庙貌辉煌，精巧雅致，石刻柱础，多为古构，清碑丛立，源流可考。访住持阚圣吉道士，阅古碑残碣，知清康熙年间即改称现名，山不在高，灵验在兹。

喊山赤足立磅峰，暑色弥天雨意浓。
前望三官寻断碣，远瞻亚岱觅沉钟。
壁间题刻何零落，炉上香烟不回冲。
卓笔慢舒蒙下纸，敛擦涂抹具葱茏。

附录：马均谭《登磅山》

磅山即青云山，在今新泰境内，为蒙阴古八景之一，名“磅山卓笔”。壬辰大暑，与党宝修、赵青昆、刘灵三友午后登，浓云欲雨。返，约各成七律一首，遂赋。

自古磅山美誉中，卓然孤笔插苍穹。
接天阶阼松擎盖，拔地崚嶒风撼峰。
早晚钟声文意远，颉颃燕影诗意浓。
青云滉漾盈池墨，写尽人间不了情。

其八　蒙阴古八景之汶水拖蓝怀古并序

汶水拖蓝为蒙阴古八景之一。自古九州江河均东流入海。然而汶河却独辟蹊径，滔滔西去，这便是清代桐城派古文大家姚鼐《登泰山记》开篇“泰山之阳，汶水西流”所说的黄河支流大汶河。大汶河汇泰山山脉、蒙山支脉诸水，流经新泰、莱芜至泰安大汶口纳柴汶河后称大汶河。而蒙阴汶水属沂河支流，是蒙阴县内第一大河流，它北源发源于蒙阴县常路镇北与新泰市交界处的聚粮山东麓，南源发源于联城乡与平邑县交界处的青山。两源在常路镇龙岗埠附近汇合，蜿蜒曲折东南流向，汇合梓河后于沂南县入沂河，流经江苏奔向大海，属淮河水系，为区别泰山北大汶河，此汶河称东汶河，习称汶河。汶水拖蓝位于蒙阴县桃墟村附近。不少文人墨客到此游览，吟咏赋诗，盛极一时。清宣统《蒙阴县志》载：“在城东三十五里苏家堠之西与桃墟河汇流处，其中独有方广数丈，严冬不冰，其下必泉脉之所出也。”古代汶水水盛，水流湍急，两岸青山绿树，倒映水中，晨暮之时，河面上自然生成一层薄雾笼罩，登高远望，日光映辉下河面犹如蓝色绸带，水拖蓝带缓缓西行，久之不散，谓之“汶水拖蓝”。惜乎1959年岸堤水库修建，此一胜景没于人工湖中，而成碧波万顷之云蒙湖旅游区，唯汶水拖蓝长留卷册，供后人欷歔感慨。所谓拖蓝，多是描述山区河流汛期水流湍急，时有山洪暴发，泥沙俱下，河水清浊不一，乃至泾渭分明之景象。翻检志乘，古八景命名不唯蒙阴汶水拖蓝，尚有琅琊古八景之沂水拖蓝、莒州古八景之沭水拖蓝等，即使汶水拖蓝，也还有新泰古八景之汶水拖蓝。《新泰县志》载，“水波萦回，环拱郭，远望则河水流云处，鹭起平沙，如蓝带然”。不过新泰古八景拖蓝之汶水当指大汶河，非此东汶河矣。

蒙阴碧水起弦歌，汶左风情满一河。
黛色曾无重渲染，清涛也有赞吟哦。
桃墟镇上鱼虫少，圈里湖中虾蟹多。
细数先人眉蹙处，苍茫涛旎具经过。

溯史读志话羽山

时　麟

在古老的东夷故土上，有许多名山秀川；但与人类最早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山却是羽山，它在东夷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堪称东夷第一山。

羽山，位于苏北鲁南接壤处，山的阳坡今属江苏省东海县，距县城牛山镇23公里；山的阴坡属山东省临沭县，距县城临沭镇31公里。山体为东西走向，长约2公里，南北宽1公里多，呈笔架形，主峰海拔269.5米。从以上数字看来，羽山是被两个行政区域分治的交界山，也是一座低矮、面积不大的小山。

笔者祖籍江苏东海县，家乡在羽山之东约15公里处。童年时代，我经常西望羽山。在记忆中，当年望着那蓝天白云下的“青山”、晚霞映照下的“金山”或雨雾中戴着“白帽子’（雾气）的“银山”，我都觉得好看。但可惜它太小，因为从东面望去，它好像一座“大坟子”，太孤单了。

1953年，我从学校毕业后来到羽山之北的临沭县工作，多次近距离地观赏过它的风貌；随着知识的增长，才知道该山虽小名气却很大。最近翻开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看到其中的《夏时期全图》上，在今山东和江苏两省交界处，就标着一个山体符号和羽山的名字。相比之下，被称为“五岳”的中国五座大山，只有西部的泰华山（华山）在图上标出——这张颇有权威性的历史地图，使我进一步了解羽山在中国历史

上的出众地位。

羽山不但在历史上有名，在现代国防战略位置上也很重要。上世纪60年代，国家修筑的连云港至郑州的310国道，从它的南坡之下通过；70年代初，解放军又在山底开挖了防空工事，使千百年来荒僻闭塞的羽山，成为国防前哨要地之一。

浅析羽山的命名

地球上许多名山都有“命名”的历史渊源，那么，羽山以“羽”字命名的缘由是什么呢？

在周、秦时期成书的《尚书·夏书》里，有著名的《禹贡篇》，在《禹贡曾氏注》里提到了羽山名字的起源：“羽山之谷，雉具五色，因以羽名，下有羽渊。”这就告诉人们：当初因为该山上有一种鸟叫雉，它身上长着五色羽毛，非常漂亮。于是人们就以该鸟的羽为该山命名。

《禹贡》保存了我国古代的重要地理资料，很有权威性，但是它没有进一步深解鸟羽的价值。因为鸟的羽毛很轻，即使它的色彩漂亮，也不过是“轻于鸿毛”的东西。既然如此，我们的先祖为何要用没有分量的“鸿毛”去为一座山命名呢？

要探讨这个问题，恐怕就要从当年先祖们对鸟的认识说起。据史料称，我们华夏远祖（氏族时代）各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也就是说，人们把某种动物或植物视为本群体的祖先或与之有血缘关系，将其作为本部落的图腾，对其崇拜、神化。比如伏羲族以龙为图腾，黄帝部落以熊为图腾，炎帝部落以羊为图腾，等等。这里要说的是，当年以黄帝之子少皞（名挚）为首领的东夷部落的图腾正是鸟。原因是挚即位时，恰有凤鸟（凤凰）飞来。于是，凤鸟就成为部落的图腾。不仅如此，该部落的百官职务也以鸟命名：比如，主管历正的官职叫凤鸟（凤凰）氏，掌管春分和秋分的官职叫玄鸟（燕子）氏，掌管夏至和冬至的官职叫伯赵（伯赵鸟）氏，掌管立春和立夏的官职叫青鸟（鸽鸽）氏，掌管立秋和立冬的官职叫丹鸟（雉）氏，等等。

少皞氏以鸟命名本部官职的内情，到了春秋时期，他的后人、郯国国君郯子曾经向鲁昭公作了精辟的阐述。连孔子闻知此事后也佩服郯子的知识渊博，于是后来也就有了“孔子师郯子”的典故。

既然凤鸟在东夷部落有崇高的地位（凤鸟是传说中的吉祥鸟），那么，当初在羽山上发现了长有五色羽毛的鸟之后，先民中的饱学之士是否会引经据典、以其为“天生的吉祥物”而大加渲染呢？这是很有可能的。果如此，用这种鸟的羽毛作为山名，岂不是顺理成章？

另据1994年编纂出版的《东海县志》记载：“羽山为古人类羽民的居住地，羽民在中国大陆东迁南北美洲后，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印第安羽蛇文化。”由此可知：当年羽山一带的人就有“羽民”之称，他们以对鸟为图腾也是可以相信的史实。

在这里，不论是先有羽山之名而后有“羽民”，还是先有“羽民”之称而后有羽山，都说明鸟羽在人们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解读羽山的名气

羽山以美丽的鸟羽命名，但不一定就能因“羽”而出名。以笔者浅薄之见，该山出名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些古代神话助山出名

在羽山周围、即苏北鲁南一带，民间世代流传着“杨二郎担山赶太阳”的神话。笔

者在小时候，就经常听长辈人西指羽山这样讲：当年，天上有九个太阳，夏天它们发威时，经常把庄稼晒死，人也热得受不了。有一天，天上的玉皇大帝发了慈悲，命令天神杨二郎下界赶杀太阳。二郎奉命后，就用扁担挑起大山的土块和石头去追压太阳。当他用土、石压死了八个太阳之后，玉帝又想到需要留一个太阳，给人间照明和生长万物，便派太白金星去告诉杨二郎停止工作。这天，二郎正挑着两筐山石赶路，忽听太白金星呼唤“二郎留步”！他一个愣神，肩上的扁担滑下来，两筐石土便从筐里撒落地上，成了两座小山，南面的叫羽山，北面的叫磨山。当时，这个神话使我知道了“羽山是怎么来的”，也明白它“小”的原因——这只是有关羽山的神话之一，而正是这类神话提高了羽山的知名度。

二、羽山与当年鲧和禹的治水有密切关系

在我国古老的文明史中，尧舜时期鲧和禹父子治水的事可谓家喻户晓，而这件大事正好与羽山有关。羽山地处我国黄河流域下游，居沿海中部地区。当时，它的周围是千里旷野，气候宜人，非常适合于人类生存。先是，原始的氏族羽民在这里生活了几千年。一部分羽民东迁南美洲之后，到了夏、商时期，这里又成了东夷人繁衍生息之邦、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不料，尧、舜时期洪水为患，我国西高东低的地势使羽山周围也成为洪水重灾区。为此，当鲧和禹奉命治水时，“水中孤岛”羽山就很有可能成为他们的落脚之地，因而受人注目。特别是鲧和禹父子俩治水的结果截然不同，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即：鲧失败了，被斩于羽山，成为“千古罪人”；而禹胜利了，成了万世流芳的英雄。

关于鲧和禹治水的功过是非，已载入史册的，以“殛鲧羽山”最著名。《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到：“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而鲧被杀之后，又派生了“鲧化熊入羽潭”（或称羽渊、羽泉）的神话（见《左传》）。而这羽潭怪得很，明《隆庆海州志》依据《左传》的记载，引申说：“羽泉亦谓舜殛鲧处，其水常清，牛羊不饮。”清《嘉庆海州直隶海州志》又加以发挥，载：“鲧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池上多生细柳，野兽不践。”这些史志步步深入，从殛鲧、化熊、入潭，又写到潭水不可“侵犯”（也可能是因鲧化熊后入渊，使水腥臭不能饮），终于完成了这一神话的结局。而正是这一系列神话，给羽山罩上了层层神秘的色彩。为此，在羽山上也就有了殛鲧泉、三缝石（又名试剑石，相传是当年天神斩杀鲧之前试剑砍成）、凤凰石、禹王庙等名胜景点。其中的禹王庙，当然是为纪念大禹而建的圣殿，但不知建于何朝何代，如今只剩下零星的砖石遗迹。正因为这里有正、反两方面治水人物的遗迹，才使羽山出名。

三、羽山附近有个天然温泉

在羽山之南5公里处，有个水量充沛的天然温泉，其水源出自羽山地下深处，千百年来裸露于野外。大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地人把温泉改造成商业浴池。随着营业面积的逐年扩大，温泉也越来越有名气。上世纪70年代末，笔者有一天到温泉洗浴，见那里已经发展成以洗浴、疗养为中心的小集镇（温泉镇）。许多外地人都慕名前来洗浴、疗养，温泉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羽山温泉的水质很好，水的常温高达摄氏七八十度，能治疗多种皮肤病。笔者那次从浴室出来后，看到在温泉浴池的出水口处，有人正用流出来的污水洗烫死猪，边烫边刮毛——其池内的水温也就可想而知了（池内的热水必须随时加入冷水，才能洗浴）。

四、旧中国的“乱世”从负面使羽山“恶”名远扬

查看史书，羽山在中国的任何朝代都远离州县，且交通闭塞，是山高皇帝远、官府统治鞭长莫及的地区，因此治安混乱。特别到了明末清初，这里有“羽山到磨山，蠡贼出万千”之说。到了民国年间，这里的兵灾匪祸尤甚，令人望而生畏。当然，这不能归罪羽山，而是旧社会制度使然。可“乱世”的确是它“出名”的原因之一。

呼唤羽山美好的明天

羽山虽然有名气，也有几处景点，但如果从观赏角度讲，它实在不值一提。然而，与羽山有关的历史事件及其对现实的借鉴意义，却是该山的内涵，即它的灵魂，它的魅力。

“殛鲧”作为历史传说，至少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尧舜时期国家政纪严明，官员如果工作出现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论职位高低，都要受到惩处，直到处以极刑。以鲧为例，既然他能被尧委以治水重任，肯定是尧身边的高官或亲信。然而因为他治水失败，就被断然斩杀，这说明尧和舜都是依法治国，用人赏罚分明，做法值得肯定。二是，鲧治水失败，是因为他没有按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办事——水往低处流，宜疏导而非堵截。可是，面对滔滔洪水，鲧一味地带人用土去拦堵，结果是劳民伤财，费力而无功，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消失的殛鲧泉是对违反客观规律者的警示教材。殛鲧泉又名鸡冠泉（当地人为避讳“殛”字不吉之意，取其谐音之称），原来就在山顶显眼之处。泉口约菜盘大小，里面的水黑黝黝的，长年不干，深不可测。可是，1958年“大跃进”，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有人想叫该泉扩大水量，竟用炸药爆炸泉口，结果炸乱了水系，那泉不但没有扩大、而且永远地消失了。

子路之死析

刘宴斌

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的冬天，年过六旬的子路死于卫国的内乱，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憾事。据史书记载，子路是一个用剑高手，虽然年老，但一般人依旧不是他的对手。那么，子路究竟怎么死的，又是因何而死呢？

话说卫灵公有位宠姬叫作南子，而这位南子却是个生活作风不怎么检点的女人，以至于关于她的花边新闻，在坊间传的是沸沸扬扬。

卫灵公的太子蒉聩，曾经不经意间得罪过她，由于害怕被杀而逃往了国外。等到灵公去世后，想要永享富贵的夫人南子，准备让软弱可欺的公子郢来继承君位。可事情运转到后来竟然有点好笑，思想单纯，一心遵循老礼的公子郢，死活就是不肯接受——为什么？因为，太子虽然逃亡了，但太子的儿子姬辄还在国内啊！

于是，无奈的南子只好在卫国群臣的支持声中，立了姬辄为国君，这就是后来的卫出公。

出公继位十二年后，而他的父亲先太子蒉聩，却依然还流浪在国外。因为一山不容二虎，一旦其父回来，两人的地位如何调理，自己的性命会不会受到威胁。

外话不多说，回到我们的主角子路身上。此时的子路，正担任卫国大夫孔悝封地的负责人。由于蒉聩感到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点薄弱，于是他就把孔悝拉拢了进来。因为这哥们在卫国还是有点实力的，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再说了，就是事情失败了，也多拉几个给自己垫背的。

暗中商量好以后的职位待遇后，孔悝就想办法把蒉聩和他的同党们秘密遣送到自己家中，准备伺机袭击卫出公。

由于卫出公事先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情报，没有做一点准备。以至于不久后，孔悝等人突袭成功。

于是，蒉聩把就自己的儿子卫出公给赶出了国门。自己进宫就位，是为卫庄公。

就当孔悝等人作乱的时候，子路并不在都城。当他听到政变的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回了国都。

说来也巧，它的同门师弟——子羔，正匆忙从都城内逃了出来，二人恰好相遇。子羔奉劝子路不要此时进城，保命要紧。而且这个时候，城门都已经关闭，不要为了一个已经倒闭的政权而自找麻烦。

对子羔的言论，子路很是生气。厉声说道：“既然吃着人家的俸禄，就不能回避人家的灾难（有点‘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味道）！”子羔见子路太过忠实，摆摆手，自己就快速离去了。

这时，正赶上有使者要进城，城门开后，子路就紧跟着挤了进去。很快，他就来到了孔悝的住所，并在此地见到了新君蒉聩。众人都拥立在高台之上。由于跟随孔子多年，子路深受其思想的熏陶，对于“君君臣臣”的礼教已经根深蒂固。于是，他大声质问蒉聩：“你儿子已经登基十二年了，而你作为外逃之人，为什么要策反孔悝？”

对于子路的质问，蒉聩选择了沉默。因为他知道，对于大道理，自己是辩不过子路的。

紧接着，子路又建议让自己来杀掉孔悝，然后再迎接先君回来，但自己保证让蒉聩本人会没事的。显然，子路的这一建议，对蒉聩来说，如同一个笑话，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子路性格按现在来说，是很急很暴的那种。见蒉聩对自己的两个意见一个都不接受，于是就要放火烧台，而且马上就四处寻找家伙，准备立即实施。

众人有点害怕了，因为当时的高台一般都是土木结构。一旦着火，马上就会借助风势迅速燃烧起来。于是蒉聩慌忙让自己的两位贴身侍卫，到台下去攻杀子路，万不可让他得逞，不然大家都得在这儿玩完！

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对付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按理说有点欺负老年人的味道。但子路一点也不示弱，因为自己的作为符合礼教，在道义上占有巨大优势，底气十足；另一方面，自己也精通剑术，不怕他们。

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一不留神，子路的帽带被某一人的利剑斩断了。由于子路深受孔夫子的礼教学说的影响，一言一行必遵其说。看见自己帽子上的缨带被斩断了，也没喊什么暂停，就自言自语地说：“君子可以死，但帽子决不能掉下来。”

于是，就在他弯腰拿起断掉的缨带，快要系好帽子的时候，两把利剑飞刺而来，子路的生命就永远终结在了此刻。

孔子听到卫国发生暴乱的消息，就感到不妙，因为他深知子路的秉性。心想：子路十有八九会有不测！果不其然，不久后就从卫国传来了子路的死讯。

其实，对于内乱一事，子路是有活命机会的，他完全可以选择不参与此事，但老师的“君君臣臣”告诉自己，这件事自己必须要管，更何况造反者还是自己的主子；就是后来在与二人的打斗中，依照他的实力，还是完全有机会逃走的，但后来却为了小小的礼节问题——‘君子可以死，但帽子不能掉下来’，而丧失了最佳防守的机会，最终丧命于利剑之下。

从此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子路不是死于剑术不精，也不是死于年老衰弱，而是死在了封建礼教之下！

诸葛亮离开阳都及依刘表时间辩正

唐士文

改革开放以来，笔者多次出席全国各地举办的诸葛亮学术研讨会。从已出版的论文集中可以看出，诸葛亮研究领域涉及其各个方面。然而对于一些重要问题，却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论。本文所论，即为一例。

诸葛亮塑像

一、诸葛亮何时离阳都

诸葛亮少年时代离开家乡阳都（今属于山东省沂南县）的时间，目前有三种说法。一是13岁，即东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初平四年（193年），袁术署诸葛玄为豫章太守，诸葛玄率其家眷及诸葛亮姐弟四人去豫章赴任。”①二是14岁，即兴平元年（194年）：“兴平元年（194年），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赴为袁术所署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任所。”②电视剧《诸葛亮》、《临沂地名志》、余明侠《诸葛亮评传》均采此说。三是15岁，即兴平二年（195年）：“乙亥兴平二年，侯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将侯及弟均之官。”③由于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赴任而离开家乡，因此，只有搞清楚诸葛玄去豫章任所之时，问题就会水落石出。而诸葛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袁术的活动至关重要。

袁术，字公路，系司空袁逢子。东汉末年，袁术靠镇压黄巾起义起家，后领兵与从兄袁绍一起讨董卓，占据今河南省南阳、豫东一带，为割据的主要群雄之一。东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三月，“袁术杀扬州刺史陈温，据淮南。”④袁术“杀扬州刺史陈温自领之，又兼称徐州伯。”⑤从是年

春据淮南（今属安徽省）直到建安四年（199年）六月病死的六年多时间里，袁术一直占据以淮南为中心的地区。袁术署诸葛玄为豫章太守，乃“据淮南”之后无疑，但他在淮南并非一年，因此将袁术初平四年开始据淮南就作为署诸葛玄的时间，显然是不严谨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玄将诸葛亮及亮弟均之官，适逢汉朝派遣朱皓任豫章太守代替诸葛玄，足见二人任豫章太守前后时间很短，可称为“脚前脚后”。朱皓虽为朝廷任命，但其“代玄”并非一帆风顺——他是在扬州刺史刘繇帮助下，用武力将诸葛玄赶出豫章治所的。由此可见，了解扬州刺史刘繇、豫章太守朱皓的履历，是研究诸葛玄任职时间的重要线索。

袁术杀扬州刺史陈温之后，汉朝任命刘繇为扬州刺史，显然是对袁术“自领”扬州刺史的否定。刘繇何时为扬州刺史，《三国志·刘繇传》记载：刘繇“避乱淮浦，诏书以为扬州刺史。时袁术在淮南，繇畏惮，不敢之州。”这段记载虽无具体年月，但从“时袁术在淮南”可知，时在初平四年三月以后。《资治通鉴》第六十一卷记载了刘繇的有关情况：“侍御史刘繇，岱之弟也，素有盛名，诏书用为扬州刺史。州旧治寿春，术已据之，繇欲南渡江，吴景、孙贲迎置曲阿。”《资治通鉴》的这段记事，系在兴平六年，据此可知刘繇任扬州刺史为公元194年，也就是袁术自领扬州刺史的第二年。

刘繇“不敢之州”而被吴景、孙贲迎接安置于曲阿（今江苏丹阳），便以曲阿为其扬州刺史的治所。等到孙策攻打庐江（今属安徽省）时，刘繇闻之，认为吴景、孙贲本是袁术所安置的人，害怕被袁术、孙策吞并，找借口逼走了吴景、孙贲，派遣将领樊能、于糜屯横江（古渡，在今安徽和县东南横江浦），张英屯兵当利口（在今和县东南的当利浦）以抗拒。此时，袁术不再“自领”扬州刺史，自用故吏琅邪人惠衢为扬州刺史，以吴景为督军中郎将，与孙贲等共同率领军队攻打张英等，结果却是“岁余不克”⑥。在这种形式下，孙策向袁术提出：“我家在江东有旧恩，我愿帮助舅舅吴景征讨横江；横江攻克后，如果向土乡招募士卒，可以得到三万军队，来帮助你平定天下。”袁术答应了孙策，“术表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兵财千余，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比至历阳，众五六千”⑦，进攻横江、当利口，皆拔之，樊能、张英等败走。

继之，孙策渡江进攻刘繇牛渚（在今安徽当涂北）营。《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载：“策渡江攻繇牛渚营，尽得邸阁粮谷、战具，是岁兴平二年也。”这个时间，与上一年袁术部与刘繇部作战“连年不克”很吻合。《资治通鉴》第六十卷亦将此事记在兴平二年：“策攻刘繇牛渚营，尽得邸阁粮谷、战具……又破繇别将于梅陵，转攻湖孰、江乘，皆下之，进击繇于曲阿……繇与策战，兵败，走丹徒。”《后汉书·献帝纪》将“扬州刺史刘繇与袁术将孙策战于曲阿，繇军败绩”记在兴平元年（194年），乃忽略是年刘繇与吴景、孙贲作战“岁余不克”、“连年不克”所致。

刘繇败走丹徒（今属江苏）后，想南去会稽（今浙江绍兴）投奔会稽太熟王朗，许劭劝刘繇去豫章，理由是会稽为孙“策之所贪，且穷在海隅，”不如豫章北连豫州，西接荆州，“足下受王命”，发生战事，曹操、刘表“必相救济”，刘繇采纳了许劭的意见。

当刘繇与孙策战于曲阿或败走丹徒时，袁术正准备自称皇帝。其时，急需使用大量人才为其服务，署诸葛玄为豫章太守应在此时。至同年冬，袁术召集群臣提出称帝之事。《三国志·袁术传》记载：“兴平二年冬，天子败于曹阳。术会群下谓曰：‘今刘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众莫敢对。”

前面说过，袁术署诸葛玄为豫章太守之后，紧接着汉朝任朱皓为豫章太守，朱皓在扬州刺史刘繇帮助下用武力“代玄”。《资治通鉴》第六十一卷记载刘繇帮助朱皓“代玄”发生在刘繇决定奔豫章之后：“刘繇使豫章太守朱皓攻袁术所用太守诸葛玄，玄退保西城。”等到刘繇溯江西上驻扎在彭泽时，又派笮融帮助朱皓攻打诸葛玄。笮融先至，使诡计杀太守朱皓，入居豫章郡中，代领郡事。“繇进讨融，为融所破，更复招合属县，攻破

阳都诸葛亮宗祠

融。融败走入山，为民所杀。繇寻病卒，时年四十二岁。”⑧

刘繇从兴平元年（194年）“诏书以为扬州刺史”，到兴平二年（195年）病卒，一直“受王命”，并未被解除扬州刺史之职。故谢钟英《三国大事表》把刘繇任扬州刺史系于初平四年（193年）三月是不正确的。同样，诸葛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应是袁术杀陈温之后自领扬州刺史，即初平四年三月以后，最晚是下半年。诸葛亮离开故里阳都，系初平四年（193年）事”⑨的说法，难以成立。持诸葛亮14岁随叔父诸葛玄赴豫章之说者，未见考证文章，结论从何而来，不得而知。从上文对刘繇任扬州刺史及其后的一年多战事等辨正，诸葛玄任豫章太守的时间，当在兴平二年（195年）夏。近几年阅读明、清人为诸葛亮撰写的文集和年谱，均记诸葛亮15岁随叔父诸葛玄赴豫章任所离开家乡。诸如：明天一阁刻本《诸葛武侯文集·年谱》、明杨时伟《诸葛忠武侯书·年谱》、清张鹏翮《忠武志·年谱》、清朱璘《诸葛丞相集·年谱》、清王复礼《季汉五志·诸葛忠侯年谱》、清张澍《诸葛忠武侯集·年谱》、清赵承恩《诸葛武侯全书·年谱》、清梁章钜《三国志旁证·诸葛公年谱》、清杨希闵《四朝先贤六家年谱·汉诸葛忠武侯年谱》等。虽然笔者对这些名家具体考证的详情不了解，但可以断言，他们不经过认真研究史料，是不会取得相同结论的。

二、诸葛亮何时依刘表及诸葛玄死年质疑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但对诸葛玄携诸葛亮依刘表的时间，亦有三种不同说法。其一是：“诸葛亮十三岁时，跟叔父诸葛玄避乱荆州，投靠刘表。”⑩其二是：“大约诸葛亮十四岁那年，他叔父诸葛玄丢了豫章太守的职务，只得带着侄儿和侄女前往荆州去投靠荆州牧刘表。”“约在兴平元年夏秋之交，诸葛玄失去太守之位，就带着诸葛亮等投奔荆州牧刘表了。”《隆中志新编》亦采14岁之说。其三是：“兴平二年（195年），诸葛玄因故失官，携诸葛亮、诸葛均往依荆州牧刘表。”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可知，诸葛亮是因叔父诸葛玄被朱皓代替之后到荆州投靠刘表的，那么，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时在兴平二年（195年）夏秋，时诸葛亮15岁。

“玄卒，亮躬耕陇亩”。诸葛玄死于何年呢？《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云：“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诣繇。”这段文字，有多处质疑问。一是诸葛玄在西城（今南昌市西）被杀，就无往依刘表之事，显然与《三国志·诸葛亮传》不符；二是建安二年，乃公元197年，与兴平二年（195年）刘繇助朱皓“代玄”时间不符；三是刘繇已于兴平二年病卒，其死后两年怎能接受诸葛之首。因此，以《献帝春秋》所记“建安二年正月”作为诸葛玄死后的时间也是值得怀疑的。

【注释】

①⑨《山东省志·诸子名家志·诸葛亮》，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

②《隆中志新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5月；

③《诸葛侯文集·年谱》，明代天一阁刻本；

④《后汉书·献帝纪》；

⑤《后汉书·袁术传》；

⑥《资治通鉴》第六十一卷；

⑦《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

⑧《三国志·刘繇传》；

⑩《诸葛亮研究》，巴蜀书社，1985年4月。

荆州古城

《诗经》中“龟蒙”一词专指蒙山

李 莹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奄有龟蒙，遂荒大东”是《诗经·鲁颂·閟宫》中的名句，因为它是研究鲁国疆域的重要史料，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查阅历代名家（包括当代）对《诗经》的传、笺、注疏、正义和《四书五经》、《十三经》中该诗句的各种集注、释文，从古至今所有版本，都毫不例外地重复了一个错误，即将“龟蒙”一词误解为龟、蒙二山。其实，“龟蒙”是蒙山主峰龟蒙顶的简称，这里的“龟蒙”一词应专指蒙山。

蒙山仅次于泰山，是山东第二高山，海拔1156米。蒙山山脉横跨沂蒙山区的蒙阴、平邑、费县、沂南四县，东西长约150华里，南北宽约30华里。蒙山山脉有三处超过千米的主要山峰。西边的是主峰。因最高处酷似龟状，头朝西北尾列东南，被称为“龟蒙顶”，简称“龟蒙”。另外两处山峰，中间称“云蒙”，东称“东蒙”。“龟蒙”、“云蒙”、“东蒙”，都可说是蒙山的别名，单提其中任何一个都可泛指蒙山。《论语·季氏》中有“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之语。唐代大诗人杜甫有“余亦东蒙

龟蒙顶

蒙山小鲁亭

客，怜君如弟兄”；“东蒙归旧隐，尚忆同志乐”的诗句。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也有“不惊渤海桑田变，来看龟蒙漏泽春”；“闻道东蒙有居处，愿供菽水看烧丹”等诗句。以上“东蒙”、“龟蒙”均专指蒙山。

由于蒙山位于鲁国的东边，还有的将蒙山称为东山。《孟子·尽心上》就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语。现蒙山主峰龟蒙顶上有小鲁亭，亭西有“孔子小鲁处”石碑，蒙山龟蒙景区还有与孔子登山有关的景点聚贤亭、圣憩石、回马岭、大通岩等。蒙山脚下平邑县保太镇、柏林镇有相传因孔子登东山时住宿过的子宿村和孔子巧遇老莱子之处的遇圣桥。仲村镇亦至今还有一小鲁庄村。

人们所以将“龟蒙”误释为龟、蒙二山，主要原因是注释者缺乏对蒙山地理历史的认真仔细地考察，另外，可能受《琴操·龟山操》中“吾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之语的影响。《琴操》是解说琴曲标题的著作，为东汉文学家蔡邕所撰。《琴操》中的《龟山操》为琴曲名。相传春秋时鲁季桓子受齐国女乐，致使鲁国国君长时间闭门不听朝。孔子欲谏不得，退而望鲁，鲁有龟山蔽之，乃作此曲。借谕季氏专政，有如龟山林木蔽鲁。东汉蔡邕《琴操》中记有《龟山操》曲牌，说明东汉时此曲尚在流行。后人为注释其“龟山”，就主观地将蒙山山脉西北一段称作龟山，东南一段称为蒙山，并以此来注释《诗经》中的“龟蒙”。按其分法，龟蒙顶在蒙山山脉西北段，应为龟山，蒙山主峰以东的山脉才叫东蒙，但这样一来，《论语》中“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就无法解释。因为颛臾是西周初年分封的小国，附庸于鲁，负责主祭蒙山，颛臾国故城遗址和颛臾王庙（亦称古蒙祠，是当年颛臾国祭祀蒙山神的主祭处)都在蒙山主峰龟蒙顶前麓，龟蒙顶应就是《论语》的“东蒙”无疑。我认为，《琴操》中的“龟山”和《诗经》中的“龟蒙”都是蒙山主峰龟蒙顶的简称，都是指的一个山——蒙山，而不能理解为是龟山和蒙山两座山。

另外，在蒙山主峰龟蒙顶以西的新泰县，确有一小山名叫龟山，古代在鲁国疆域之中。其山北面有沃壤，被称为“龟阴之田”。但此山甚小，正所谓“龟山之气不能云雨，龟山之木不中梁柱”。以蒙山之大，龟山之小，《诗经》的作者不可能将此龟山与蒙山相提并论，而《诗经》和《琴操》中的“龟蒙”只能是专指蒙山。

驱逐倭寇　踊跃参军

本　编

花轿抬着参军模范

披红戴花骑大马，参军卫国保家乡

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山根据地人口约420万人，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他们勇于献身，前赴后继。“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涌现出不少母送子、妻送郎、兄弟并肩上战场的感人场景。

莒南县民兵参军誓师大会

滨海地方武装升级，壮大八路军主力

1945年，莒南县参军盛况

沂河千里碧　灵韵诗情长

——《沂蒙诗话》之八续一

李兴河

三

沂河经沂水城西向南流，至沂南县王家新兴村南有汶水从右岸汇入。汶水，又称东汶河，是沂河的第二大支流，全长132.3公里（从梓河源计）。北支梓河发源于蒙阴岱崮山区的后雪山，南支东汶河发源于蒙阴与平邑交界的青山北麓。二水在沂南岸堤汇流入沂河。汶河流域风光秀丽，多有胜迹。明公鼐在《沂水县志序》中说：“汶水自蒙阴西来入之，历新兴至河阳百里间，两岸皆为上腴，土宜秔麦，传所谓‘琅琊之稻，十专其五’。而林壑芊绵，岩岫深暝，夏无绝炎，午无停日，烟水之胜轶于江南。”

梓河支流野店河东岸有西崖泉，又名顺德泉。泉北有顺德夫人庙，俗称颜奶奶庙。据顾野王《舆地志》称，齐人颜文之妻，侍奉婆母甚为孝谨，除樵柴备炊外，还汲山泉水供婆母饮用，孝感神灵，她的室内忽出涌泉，清泠可爱，人称颜娘泉。后人将她神化，尊称顺德夫人。顺德庙原建筑群规模宏伟，分前中后三个院落，殿宇巍峨，雕梁画栋，流光溢彩。院中苍松古柏，繁荫覆地。泉水喷涌不息，清澈明净，泉底数不清的泉眼向上冒水，泛起斑斑沙堆，水中藻荇摇曳，游

汶河源头

鱼翕忽。泉水温差极小，有冬暖夏凉之说。顺德庙前的东侧崖壁上，有“壁岩洞”，内祀吕洞宾。此处曾为游览胜地。

明，公襄，蒙阴人，庠生，公鼐次子。旧志称其“诗文之名，丕著海内”。有《潜园诗集》。写有《过西崖泉》诗：

偶驱款段入空山，倚杖看云藉草眠。
养熟池鱼听客话，携来村酿煮寒泉。
松多古貌僧多韵，石纪游人诗纪年。
重到遍寻题壁句，洞门依旧锁秋烟。

这首诗通过写游西崖泉的所见所感，表达了作者的高雅情怀。诗的首联，写作者悠然地骑马进入了空静的山中，扶着手杖闲看云气升腾，累了就卧在草地上休息。诗的颔联，写因游客常来，池水中的鱼儿也好象能熟悉游人的说话，游客则尽情地在泉边饮酒品茗。诗的颈联，写古松苍劲，僧人风雅，岩石上镌刻着到此游览的人名，题壁的诗篇还记着游览的时间。诗的尾联，写这次重游四处寻找往日题壁的诗句，洞门依然被秋天弥漫的烟岚所封锁。

清，公谷，蒙阴人，生员，参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版《蒙阴县志》的编纂。有诗《题顺德泉》：

杖策踏山径，寻幽到水原。
穷年散地液，终古泄天根。
突瀑鱼翻逝，经崖洞欲吞。
心空潭影照，此际兴情尊。

诗的首联，写骑马踏着山间曲径，寻幽探奇找到了溪水的源头，此指顺德泉。诗的颔联，写顺德泉水旺盛，一年四季流淌不息，从古至今渲泄不竭。诗的颈联，写泉水向上喷溅，游鱼被冲顶得翻覆转动，泉水流经崖畔，岩洞也好像要张口痛饮。二句极言泉水喷涌势猛，水清澈甘冽，状景形象逼真。诗的尾联，写作者怀着空净之心来到清泉潭边，天光、山色、人影，都映照在水中，和谐地融为一体，这时才真正体味到志趣的高雅，人格的尊贵。此二句的寓意，与唐人常建的诗句“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有相似的情趣。

清，王于（干）襄，蒙阴人，参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版《蒙阴县志》的编校。写有《西崖小饮听泉》：

沿溪洗耳傍云岑，夜半飞湍静处寻。
竹籁时来风虎啸，松涛不碍水龙吟。
人于月里倾玄液，客到泉边识古音。
吾道千秋应有属，高山流水付瑶琴。

这首诗写在西崖月下听泉的感悟。诗的首联，写夜深入静时，在云崖畔沿山溪寻找飞湍的喷泉，细细地品味泉韵。诗的颔联，写风吹竹林，时时传来如虎啸的声音，还伴以松涛声，却都掩盖不住龙吟似的泉水声。以竹籁萧萧、松涛谡谡来映衬，更见泉声之大，泉韵之妙。诗的颈联，写这湍急的飞泉，好像是仙人在月中倾泻下来的玉液琼浆，这奇妙的泉韵，好像是古乐那样高雅。诗的尾联，写由终古不泯的美妙泉韵，联想到儒家之道也会代代延续，就像这高山流水的美妙乐曲，永远有人弹奏，有知音欣赏。

梓河北岸，有中山，山中有寺，名中山寺。寺始建于何时，说法不一。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版《蒙阴县志》称：“中山寺，在县东六十里。宋元丰间建，元皇庆二年修。”该志又称：“唐白居易，字乐天，尝游于中山寺，徘徊不去，栖息数月。吟咏最多”。从明公鼐的诗看，他认为中山寺建于隋唐。

中山寺响石上刻有唐白居易的诗《栖中山寺》：

中山寺

闲泊池舟静掩扉，老身慵出客来稀。
愁因暮雨留教住，春被残莺唤遣归。
揭瓮始尝新熟酒，开箱试着旧生衣。
冬衰夏茂相催促，垂老光阴速似飞。

这首诗写白居易寓居中山寺的一段闲逸淡泊的生活，流露出一种时光飞逝，老之将至的感叹。诗的首联，写小船悠闲地停泊在河边，关上柴门静静地在院中闲坐，自己懒得外出，客人也很少来。诗的颔联，写潇潇暮雨，使心中泛起缕缕愁绪，残莺几声，又唤走了大好春光。愁因暮雨生，春随残莺归，有时不我与之感。诗的颈联，写春去秋来，又揭瓮品尝酿熟的新酒，开箱翻拣试穿过时的旧衣服。诗的尾联，写四季交替，岁月催人，到了老年更觉光阴如飞。诗人的情怀，不是直接说出，而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来表达的。诗中所抒情怀，垂老之人多有同感，故能感动人。

明，公跻奎，蒙阴人。写有《中山古刹》：

古寺几番更世代，石文断烂傍山隈。
晴烟袅树昏将敛，新月随僧明欲来。
风过猿声鸣翠薜，雨余鸟迹印苍苔。
红尘一点飞难到，尽兴登临跨鹤回。

这首诗通过对中山寺圣洁静境和盛衰变化的描写，表达了厌恶世尘，追慕仙家生活的情怀。诗的首联，写中山古寺经历了好几个朝代的更替，刻有文字的石碑断烂散卧于山的弯曲低洼处。极言古寺的残破不堪，自然隐含着对破坏古迹行为的不满。诗的颔联，写烟岚笼罩的树林，渐渐地隐没在暮色中，冉冉升起的月亮，又随着归来的僧人洒下光明。诗的颈联，写清风吹过，猿的啼声响在葱翠的丛林，疏雨过后，鸟的足迹印满斑斑的苍苔。中间两联，言古寺的圣洁幽静，脱俗之情，油然而生。诗的尾联，写人世间的烟尘一点也飞不到这圣洁的境界，仙人们可以乘鹤在这里自由游览。

明，杜洽，号玉峰，举人，直隶任丘（今属河北）人。曾任蒙阴知县，万历十八年（1590年）所撰《蒙阴县地方利弊稿》，条陈兴利除弊之策，颇多真知灼见，有利于民生。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升任莒州知州。写有《咏蒙阴八景》诗，《中山古刹》是其中一首：

九仙山畔白云层，中有招提路可升。
松下偶来今日客，竹房空忆昔时僧。
诗题白傅留残碣，壁帖黄华是大乘。
系马祇园问禅迹，阴崖还见有传灯。

诗的首联，写中山周围白云缭绕，坐落在山中白云深处的寺院，有弯曲的山径可以登攀。诗的颔联，写寺院的苍松古柏下，今日偶然有客前来造访，绿竹掩映的座座房舍，还能使人回想起当年寺院众僧云集的盛况。诗的颈联，写镌刻有白居易题诗的石碑只剩下残破的一段，寺庙的墙壁上还贴着著名书法家黄华妙笔书写的佛教经文。诗的尾联，写拴下马，在中山寺院里寻访禅师的踪迹，还能看到山寺传授佛经点的长明灯光亮闪耀，映照着幽暗的山崖。宗教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诗人造访中山寺，见其残破荒凉，对比今昔，自然会产生一种盛衰变化的感叹，幸见犹有传人在，佛灯未泯，又感到几分慰藉。

明，公鼐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春到中山寺，写有《丁亥至中山寺随三叔徐丈小饮禅房》：

梵宇隋唐上，浮图霄汉间。
吹箫鸣凤下，扶杖卧龙还。
淡淡峰如笑，嘤嘤鸟亦闲。
欲寻白傅迹，疑似对香山。

作者在这首诗后自注：“寺有白乐天题诗，字迹宛然。”诗的首联，写中山寺建于隋唐时代，佛塔高高地耸立碧空。诗的颔联，写寺院的高雅圣洁，仙人吹箫，鸣凤应着悠扬箫声飞下，拄着手杖的隐者也从外面归来。诗的颈联，写寺旁清幽的山林美景，淡然的峰影，悠闲的鸟鸣，更能感到寺院的净雅。春山如笑，形容春天山色明媚可喜。宋画家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称：“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粧，冬山惨淡而如睡。”嘤嘤，鸟鸣声。《诗经·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鸟声悦耳，更显寺院幽静。这种“寂处有音”的艺术手法，也许是得益于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诗的尾联，写对大诗人白居易的敬慕，想着追寻白居易的踪迹过隐居生活，来到中山寺，看到白居易的题诗，就好像面对着白居易的居处香山。白居易曾在河南香山疏沼种树，构建石楼，自号香山居士。诗中流露出作者热爱自然、敬慕乐天、习于娴静的情怀。

明，公一楠，蒙阴人，贡生。曾任南直隶溧阳（今属江苏）主簿。后迁河南县丞，不赴，告归。著有《中山诗集》。家居时游中山寺，作《题中山寺》诗：

行踏千峰鸟道悬，藤萝曲护石斑斑。
山坳暮雨归樵湿，松顶巢云放鹤还。
欲脱尘襟寻静土，谁将灵药驻朱颜。
龙函半偈都无有，寥落残僧补衲闲。

诗的首联，写进山之路险峻，攀缘行走在万山丛中崎岖高悬的小道上，路边藤萝迂回掩护，奇石斑斑齿列。诗的颔联，写傍晚山中所见之景，山坳里暮雨潇潇，回归的砍柴人淋湿了衣服，松林上云霭缭绕，饲放的仙鹤也翩翩飞回了鸟巢。诗的颈联，写在寺中所想，想要摆脱俗尘杂念来这里寻找净土，但是谁又有灵丹妙药能保红颜常驻，永不衰老呢？此联中的“尘襟”，一作“火宅”，即佛家比喻烦恼的俗界。诗的尾联，写在寺中所见，这座久享盛誉的名刹，如今经偈全无，众僧也大都离去，只有几个留下来的僧人在清闲地缝缀僧衣。作者本想超尘脱俗，在这深山古寺中寻找一块净土养生，但所见古寺的凄凉零落景象，又使作者感到净土仙界的虚无。

清，刘德芳，字受公，一字馨公，文安（今属河北）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

由监生任蒙阴知县，主修清康熙二十四年版《蒙阴县志》。写有诗《中山晚照》：

中山山入万山中，返影深林挂碧空。

一幅营丘余沉在，不知烟景更谁同。

中山寺周围，奇峰环列，山间日落前，有时出现奇异的光彩，宛如峨眉山的金顶佛光，称“中山晚照”，为蒙阴旧八景之一。这首诗写的就是中山晚照的美景。诗的首句，写中山处在众山环围之中。诗的次句，写落日挂在碧空，余辉照射在深幽的密林，林表的光照又返射到云崖上，呈现出中山晚照奇观。这一句诗，好像是借鉴了唐王维的诗句“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但所写诗境各异，故无雷同之感。诗的第三句，写落日、余辉、密林、奇峰，构成了一幅奇异和谐的天然画图。诗的第四句说，这样的天然美景又有哪里能比得上呢。

“汶水拖蓝”，旧为蒙阴八景之一。据清康熙二十四年版《蒙阴县志》称：“汶水拖蓝，在城东35里苏家堠之西与桃墟河汇流处，其中独有方广数丈，严冬不结冰，其下必泉脉之所出也。”汶水自西来，清澈的泉水汇入，顺流而下，泉水清蓝如带，拖之较远距离，依然清丽分明，故称“汶水拖蓝”。吟咏这一自然奇观的诗颇多，这里举出三首，予以欣赏。

明，公跻奎写有《汶水拖蓝》：

一曲清流天汉来，山城环抱净尘埃。

蟾宫倒浸冰壶湛，鳌阙高悬宝镜开。

一带拖蓝澄碧汉，半湾凝绿响晴雷。

无情惟有东流水，日夜滔滔去不回。

这首诗通过生动的比喻，着重描写汶水的清澈净洁，并由流水东去，滔滔不回的情景，生发出一种岁月流逝，时不我待的感慨。诗的首联，写汶河清流好像是天上的银河奔腾而来，环绕着古老的山城，荡涤着尘埃，净化着环境。这里的“山城”，指蒙阴县城。诗的颔联，写月亮倒浸水底好像洁白的冰壶那样清晰，又像水下的宫殿高悬着打开的宝镜。这一联，写月下汶水之光洁，比喻新颖，富有美感。诗的颈联，写汶水拖蓝如带，与碧空水天一色，汩汩泉水凝绿，似晴天雷声殷殷。这一联对仗工整，有声有色，宛然如画。诗的尾联，写这无情的东流水，不舍昼夜地滔滔流去，实在挽留不住。好景易逝，怎能不让人生叹。

明，公一扬写有《汶河拖蓝》：

汶河南汇带晴沙，渺渺拖蓝绕岸斜。

万里秋光天似洗，清风轻漾浪中花。

这首诗以轻松的笔调，描写了汶河沙洁水秀，秋光明丽，风清气爽，景色宜人。诗的一、二句，写两水汇流，晴沙泉涌，清流如带，渐行渐远。诗的第三、四句，写秋光万里，碧空如洗，清风吹浪，波光粼粼。诗的格调明快，状景如画，愉悦之情，溢于言表。

清，刘德芳写有《汶水拖蓝》：

东泉涓滴注漕渠，汶水西流百折纡。

万国储糈劳浸灌，可知竭泽已无鱼。

诗的首句，写县城东有涌泉，泉水澄澈，涓涓细流汇入河渠。诗的次句，写汶河之水，自西而来，百折曲行，富有灌溉之利。诗的第三句，写水利关系国计民生，国之粮饷储备，民之衣食所需，都要靠百姓辛勤劳作，及时用水浇灌庄稼，才能获得粮食丰收。诗的第四句，写应当懂得竭泽而鱼，只图眼前小利，不顾长远利益的严重危害。这首诗题为《汶水拖蓝》，但重点不在写景，而在写兴水之利，富民之道，并由此提出治国安民之策莫要竭泽而渔。与其他两首同题诗相比，这首诗在立意上明显高出一筹。由

远望蒙山

此也可以得到启发，一首诗写什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怎样写。

明，公鼐写有《岸堤道中》：

东游多胜迹，行役即登临。
旅食溪堪钓，醉眠风满襟。
夏云随地起，晓气入林深。
湛湛汶川水，南来若有心。

这首诗是作者在旅途中经过汶河畔的岸堤时所写。诗中细腻地描写了汶河的夏日风光，寄情于景，表现了诗人陶醉在山川美景之中的情怀。诗的首联，写东游的途中，有许多名胜古迹，出行时每每就去登临游览。诗的颔联，写旅途休息，就到汶河里钓鱼以佐餐，醉后酣睡，任清风吹满襟怀。诗的颈联，写夏天的巧云好像从地面涌起，早晨的岚气弥漫着茂密的树林。夏日汶河岸边，云起岚漫，林壑幽美，历历如画。诗的尾联，写清澈潺缓的汶河水流，好像对旅客寄予深情。诗人对汶河也有着特殊感情，他曾在《沂水县志序》中说：自“束发知游，悉济悉涉，探奇索幽”。行旅途中，重经故地，留恋之情，归隐之心，便油然而生。这首诗写得冲淡自然，诗中有画。

公鼐，自江南游历归来，渡沂河时触景生情，写有《渡沂河望见蒙山》：

极望尽天末，蒙山露半青。
乡音随处好，鸟语亦堪听。
况渡琅琊水，来从堂阜亭。
近家心转急，驱马候晨星。

这首诗通过对家乡山水、胜迹、乡音、鸟语等富有地方特色的人事景物的描写，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之情。诗的首联，写渡沂河时极目西望天际，看到家乡巍峨的蒙山露出半截青蒙蒙的峰顶。“露半青”，既写极望之远，又写蒙山之高。诗的颔联，写熟悉的乡音随处可闻，婉转的鸟语也十分好听。诗句中透露着远游归来的喜悦心情。诗的颈联，写渡过家乡的河水，又可以游览家乡的名胜古迹了。琅琊水，此处指沂河。堂阜亭，即夷吾亭。堂阜遗址，在蒙阴城西北30里处的西高都庄，世传春秋管仲脱鲁囚处。为蒙阴旧八景之一。明清时期，多有诗家吟咏。清蒙阴知县刘德芳在《堂阜遗址》诗中写道：“此地当年脱槛囚，霸图全赖叔牙谋。从来国士无知己，多少英雄老一丘。”公鼐也曾游堂阜，并有诗作。诗的尾联，写临近家乡，诗人归心似箭，情迫意切，起早备好鞍马，只待天亮，踏上归程。

姓氏百家漫谈——杨姓（中）

赵丹峰

隋朝是杨姓人建立的王朝，国姓是杨。结束自西晋永嘉之乱至南北朝将近300年分裂局面，使中国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伟人是隋王朝的开创者——隋文帝杨坚。杨坚系“弘农杨氏”之裔。其父杨忠屡建战功，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杨坚长女杨丽华系北周宣帝的正皇后，所以杨坚作为功高权重的国丈，“位望益隆”，袭父爵为隋国公。静帝宇文阐即位时年仅8岁，杨坚以宣帝后父的名节任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执掌北周的国家最高权力，被封为隋王。大定元年（公元581年），在平定了相州、郧州和益州总管发动的叛乱之后，杨坚废静帝自立。由于杨坚在北周时被封为隋王，故而将他所建立的王朝定国号为“隋”，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灭后梁，九年灭南朝陈，从此结束了南北朝分治的局面，使中华民族再次进入了统一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杨坚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崇尚节俭，倡导清廉治国，一生力体力行，为人称道。有一次，文帝要配止痢药，需要胡粉一两，但在偌大的皇宫内，一时竟找不到胡粉。他奖励良吏，严惩不法污吏，官员一旦受贿，立即处以死刑。他对官者极严，但对百姓却宽厚待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隋文帝在全国各地设置义仓，让农民在收获季节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放在义仓内，待发生灾荒时便开仓放赈。他留意民间疾苦，594年关中发生饥荒，他即派员察看百姓所食食品，看到人们所食之物系豆粉拌糠后，遂拿食品给群臣看，流泪责备自己无德，命撤消常膳，不食酒肉。他的伟大之处，不仅仅表现在崇尚节俭等生活细节方面，最为重要的，是他在建立隋朝后，在政治与社会关系方面，进行了若干开创性的变革，不但对当世，而且对隋以后的历代王朝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之效法。

改革官制，是隋文帝的一大贡献。他下令废除了北周的六官制度，建立了三省六部制。三省即尚书省（管理全国政务）、内史省（起草诏令）、门下省（审查政令及封驳），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职责各有侧重并且互相牵制，这一制度不使宰相一人专权，而利于皇帝决策与集中。六部即在尚书省下分置吏、礼、兵、都官（即刑部）、度支（即户部）、工六部。以后，从唐朝至清朝，均沿袭了隋文帝创立的这一中央权力结构制度。在地方官制方面，实行州、县两级制，同时并省了不少州县，淘汰了一批冗官，既节省了开支，又提高了行政效率。

律法的厘定，是隋文帝的又一重大贡献。开皇三年，文帝以“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每年断狱，犹至万数”，命苏威、牛弘等本着删繁就简的原则，修改《新律》（即开皇元年所制定的刑律），完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开皇律》。该律上承汉律之源流，下开唐律之先河，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开皇律》与北魏律相比，减轻了刑罚，取消了一些沿袭已久的酷刑。隋律规定，如有人因冤枉上告，如若

隋文帝杨坚

县官不理，允许越级向州官上诉，直至朝廷。所有死刑犯人，均不准在本地处决，必须送大理寺复审，最后送尚书省奏请皇帝裁定。隋律所体现的“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律意，较之秦、汉刑律，确为一大进步。

科举制度的创立，是隋文帝的又一历史性贡献与建树。隋代以前，官员选拔实行九品中正制度，重视门弟出身，名门望族子弟可凭高贵的出身被选为上品出任高官，而庶族寒门出身者则只能被选为下品小官，以至长时期存在着“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不公正状况。隋文帝为改变这一弊制，废除了为世族所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设志行修谨（有德行）、清平干济（有才干）二科选拔京官五品以上和地方官总管刺史，考生不论出身，地位一律平等，使德才兼备的人士不论出身均可成为国家栋梁。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又始置进士科，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善。隋朝所创立的科举制度，相对公平、公正，是封建社会最不坏的选拔人才制度，使以考入仕的人成为整个官员队伍的主体，因而为日后的历代王朝所承袭使用。此外，隋文帝还在其他领域实施了诸多制度变革与战略举措。如在兵制方面，革除原行的府兵制，将军人编入民籍，既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又调动了人们的参军积极性；在农业方面，实行均田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保境安宁方面，利用突厥内部存在的弱点，以谋略为主，军事为辅，避免发生大的战争。由于其革新弊制，励精图治，使全国经济繁荣，人口大增，文化、医术和科技均有了明显的进步与发展，所以历史上根据其年号，将杨坚统治的20年誉为“开皇之治”。现代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所著《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一书，将两位中国皇帝列入其中，一位是秦始皇，另一位就是隋文帝杨坚。

杨广是隋文帝次子，于公元604年继位，翌年改元大业，是为隋炀帝。说起杨广，人们普遍地认为这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坏皇帝。生活奢侈、统治暴虐，是浪子与暴君的代名词。以至于后来李密在统领瓦岗军后，在发表讨隋炀帝的檄文中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就是成语罄竹难书的典故。然而细检历史，导致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的荒淫无道，历史上像杨广那样生活奢侈糜烂的帝王人数颇多。和那些只知玩乐淫逸而不理朝政的浪子帝王所不同的是，隋炀帝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帝王。为了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他不顾国力与民心的承受程度，自登基之始，便开启了一系列“政绩工程”与开疆拓土的战略举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修建东都洛阳；大业三年修长城；大业元年至六年修大运河；大业八年第一次开始东征高丽。八年间，共调用人力3000余万人次，平均每年征用劳力达400万人左右，接近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是全国男丁的总数。他接连三次发动讨伐高丽的战争（自汉至唐，历代王朝均认为高丽地区系中国的传统疆域，它闹独立骚扰东北边境则必须受到征讨，这便是隋、唐两代数次征讨高丽的客观原因），然而战事三战皆未获胜，隋军战死者近百万人。繁重的徭役和兵役，使人民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得不到休养生息的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加之朝臣与军队众叛亲离，杨广和他的王朝终于在公元618年人亡政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客观评价隋炀帝，他也有重大建树的一面。如他继续奉行文帝对西部民族政权以怀柔为主、军事为辅的策略，大力加强与西部少数民族的联系，分别于公元607年和609年两次西巡，实现了西部边疆的安定，使其成为第一位亦是唯一一位亲巡西域的中原王朝帝王。他下令修通的大运河，全长1747公里，把长江、黄河、淮河、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联系起来，形成了遍及全国的水运网，是中国古代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

隋炀帝当年下诏开凿大运河，一则是为了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统治；二则亦是为自己游玩享乐提供方便；三则是便利南北交通，使北方城市和边防所需的粮食，通过运河从渔米之乡的江南往北调运。运河通航后，不仅极大地便利了南北交通运输和商贸活动的开展与文化的交流，而且促进了沿岸一大批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繁荣，如扬州、楚州、魏州、润州等城市就是靠运河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扬州，从隋至清，已发展成为世界闻名的工商业繁荣昌盛和人文荟萃的大都市。鉴于此，唐代大诗人皮日休在其《汴河怀古》诗中写到：“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独具慧眼的皮日休既指出了隋炀帝杨广修运河以玩乐为主要目的，而使百万人民出徭役苦力深受其害的罪过，同时又客观肯定了运河通航后造福国家、人民，而泽被千秋的历史功勋，并且将其修运河之举与大禹治水的贡献相提并论，论其过而不掩其功，泾渭分明，可谓确评。1400余年后，大运河北段经淤塞已不能通航，但从山东台儿庄以南河段，至今仍是运输繁忙的黄金水道。今日再读皮日休的《汴河怀古》诗，我们对隋炀帝修运河的功过评价，或许比唐代人看得愈加明晰与中肯。

唐代，杨氏族中先后走出了11位宰相。他们中，除杨贵妃堂兄杨国忠在为相期间，因结党营私、贿赂公行而广受诟病外，绝大多数人在治国主政方面均有不同建树，其中尤以杨炎业绩最显。杨炎初以文采雄丽著名而被荐辟入仕，任中书舍人时，与常衮共掌诏敕撰拟，文笔广受朝士赞许，被称为“常、杨”。李适为太子时，即慕其文才，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李适即位，即唐德宗，便擢升杨炎为宰相。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帝国，在政治上藩镇割据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由于战乱对生产力的破坏，导致民生凋敝，物资匮乏。为改变这一危困局面，唐德宗决意进行改革。新任宰相的杨炎遂向德宗详述了原来赋税制度的缺陷，并提出以新的财税政策取代原行的租庸调法。此建议得到了德宗的首肯与支持，很快付诸实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两税法改革。原来实行的租庸调法，其核心内容是以人丁作为收税赋的根本依据，但在安史之乱后，全国户口削减，人口流亡，册簿散失，土地荒芜，乡里再按人丁征税已不可能。杨炎设计的两税法，取消了原租庸调法按人丁收税的不合理规定及各项杂税的征收，只保留户税和地税。户税是按户等高低征钱，户等高者多出钱，户等低者则少出钱。地税是按亩征收谷物。其地亩数按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无论户税和地税，都分夏秋两季征收，故被称为两税法。两税法实施初期，成效显著，官民皆受其益。但当时的唐帝国藩镇坐大，朝廷势弱，政治腐败已蔓延成风，故在此法实行三年后，不少地方官员便私自加税，致使农民负担越来越重。白居易在《无名税》中写道：“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妨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宽，敛索无冬春。”制度虽好，但由于执行者枉法，致使好的制度变形走样。待唐宪宗李纯即位后，即命裴垍对两税法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完善。因为两税法是以钱计税，而百姓纳税时，需将所交的粮和绢折合成钱。为了适当减轻纳税者的负担，尚书省便制定出一个低于市场实际价格的折价标准，谓之“省估”；同时，还调整了两税上贡、送使、留州的比例，此举不但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亦限制了节度使的财源。经过调整完善的两税法实施后，唐朝的经济状况一时大为改观，史称“和元中兴”。杨炎所创立的两税法，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财税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为以后数朝所沿用，直至明代中叶实行“一条鞭法”后方中止，历时长达800余年，杨炎本人亦作为著名的经济

杨　炯

改革家而名载青史。

在文学领域，杨氏族人中成就最显者当属杨炯。杨炯系弘农华阴杨氏后裔，少聪慧，12岁即举神童，授校书郎，官终盈川令，世称杨盈川。在诗坛，他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被合称为“初唐四杰”。杨炯善五言，以边塞征战题材的诗著称。所作《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气势轩昂，风格豪放，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清越刚健之风。如《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该诗情调高昂，状景如画，音韵铿锵，首尾呼应，不失为一首读之令人心情激越的军旅之歌。和《从军行》一样，《战城南》亦是杨炯以汉乐府旧题的形式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塞北途辽远，城南战苦辛。幡旗如鸟翼，甲胄似鱼鳞。冻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诗中作者以征战者的口吻叙述了边塞征战的艰苦军旅生活，但格调雄浑，情绪乐观，毫无汉乐府《战城南》之类诗作原有的悲伤基调。杨炯今存诗33首，以五律居多。另存序、表、铭、状等文章50篇。论及自己的文学成就，曾有“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之谓（因时人以王、杨、卢、骆排序初唐四杰）。

杨凝式是五代时期书法大家，亦属弘农华阴杨氏后裔，系唐末宰相杨涉之子。先后任唐和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六朝，官至太子少师，后为避朱温祸害，遂佯狂终生。其书法笔势雄浑，变化多姿。突破尚法束缚，开尚意书风之先河。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大家皆受其影响。苏轼称其书法二王、颜、柳之雄杰，米芾赞其书如横风斜雨，落纸云烟，淋漓快目。亦有评家称其用笔有破方为圆、削繁为简之妙。所作《韭花帖》笔法精致，风神古淡简远。

公元938年，后晋石敬瑭为称帝甘当契丹的儿皇帝，竟无耻卖国，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使中原汉民族蒙受奇耻大辱。宋朝建立后，收复十六州失地便成为当时朝野的强烈心愿。公元979年，北宋在灭掉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后，宋太宗赵光义即率军北征，以图收复幽云十六州失地。但幽州一仗，宋军败绩，宋太宗遂转攻为守，然而辽国则不断袭侵宋朝边境，以致民不聊生。

982年，辽景宗去世，年方12岁的辽圣宗耶律隆绪即位，因辽主年幼，其国政便由萧绰（即萧太后）主摄。宋太宗认为可趁辽国政局变动之际，出兵北伐，收复失地，以雪国耻。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即遣三路大军伐辽，史称“雍熙北伐”。宋朝名将杨业便是在此次北伐中为国死节的。杨业幼年倜傥任侠，武艺过人，先为后汉节度使刘崇部将，后刘崇割据太原建立北汉政权，他被赐名为刘继业，因作战骁勇异常，战功显赫，时人以“刘无敌”称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围太原，他随刘崇归宋，遂恢复本姓氏，名杨业，任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曾在雁门关大破辽军。此次雍熙北伐，潘美为西路军主将，杨业为副将，王侁（太宗耳目）任监军。西路军在潘、杨指挥下，出雁门关后旗开得胜，连克寰、朔、应、云四州。后因曹彬率领的东路军失败，太宗遂命各路宋军回撤，杨业即奉命护送四州民众向内地撤离。恰遇契丹大军奔袭而至，军情顿时危急。久战沙场的杨业审时度势，认为此时辽军士气正炽，西路宋军势孤力单，不可与之硬拼，应避其锋芒，寻机破敌。杨业的合理建议，却遭到主将潘美及王侁的诬蔑。无奈之下，杨业只能冒险迎敌。临行前，杨业对潘美泣道：“此仗必败。吾本欲择机御敌，既然汝等责我避敌，故吾不得不以死报国。”同时，泣求潘美在陈家峪口（今山西朔

县南）设伏接应，待我军退至此谷口时两面夹击敌人，或许能转败为胜。潘美应诺，遂指挥将士于峪口设伏。杨业出兵后，果遇契丹大军，辽兵势若虎狼，直扑宋军。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杨业率部与敌且战且退，待将敌引至陈家峪口时，却不见设伏的宋军人马。原来潘美与王侁在此布设伏兵后，从寅至巳，未得到杨业的任何消息，王侁以为定是辽兵退了，怕杨业抢了头功，即领兵离开峪口，潘美也未制止。待得到杨业兵败的消息后，二人非但不领兵前去救援，反而沿另一小道遁逃。此时，经一天苦战，杨业手下只有百余将士，杨业便对他们道：“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杨业平时与将士同甘共苦，深受部下拥戴，众人闻此言后，皆感泣不肯去，随杨业与敌血战，直至全部战死，杨业之子杨延玉亦在此役中壮烈殉国。杨业本人受创数十处，最后因战马受重伤不能行走而被俘。身负重伤的杨业决心以死报国，遂绝食三日而殁。杨业死后，辽萧太后命将其头颅装入匣中，传送边关各地，以振辽兵士气。在宣扬契丹国威之后，她又感叹杨业精忠报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与高尚气节，遂下令为杨业修建祠堂，四时予以祭祀。杨业死节的悲壮行为令大宋朝野震叹，宋太宗随即下诏追赠杨业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并对其诸子进行封升。同时下令削潘美三任、王侁等除名编管，以平臣民之愤。

杨　业

杨业之子杨延昭（原名延朗），亦系抗辽名将。与辽军战于朔州城下时，臂膀被流矢洞穿，仍挥戈杀敌，不挫豪气。咸平二年（999年），辽兵侵边，延昭时守遂城，辽军围城数日，攻城甚烈。因城小无备，一时众心危惧。延昭见天气寒冷，遂命城中丁壮与军士一起，趁夜黑时汲水灌泼于城上，天明结冰，使城墙坚滑异常，辽兵攀爬既倒，无法攻城，只好撤退。延昭趁机追杀，获其铠仗甚多，以功擢升为英州刺史，后徙宁边军部署。景德元年（1004年），延昭率军万余人直入辽境，破古城，后任知保州防御使、高阳关副都部署等职。延昭智勇双全，治兵有方，有其父之风。所得朝廷赏赐均犒劳军士。每战获捷后，必推功于部下，军士敬其人品，皆乐为其用。守边30余载，使辽军畏惮，呼其为“杨六郎”。据史载，杨延昭在诸兄弟中并非行六，有史家考，古人称天狼星为六郎星，此星在天空群星中最为明亮，属于将星，因延昭战功卓著，被认为系六郎星转世，所以称其为杨六郎。

杨文广系杨延昭第三子（民间及戏剧传说延昭子为宗保，文广为宗保子，与史实不符）。仁宗时文广为范仲淹擢用，后随大将狄青至广西平定侬智高反叛朝廷之乱，以功任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在西北为秦凤路副都总管。时值西夏军图谋秦州（今甘肃天水），文广见情势危急，遂带兵急至筚篥城（今甘肃西北的甘谷县），修筑工事，使西夏军攻城不下，只好撤退。不料杨文广忽开城门，出其不备，率勇士追杀敌人，西夏军猝不及防，被杀千余人，大败而逃。宋神宗闻捷大喜，赏文广玉带宝马。后官至步军都虞侯。辽人争议代州（今山西代县）地界，杨文广遂献阵图与取幽燕之策，不久病逝，享年75岁。从杨业起至杨文广，杨家将历北宋六帝，经百余年不衰，如加上杨业弟杨重勋之重孙杨畋那一代，可谓一门忠烈，四世驰名。另外，民间传说杨业之妻佘赛花（佘太君）和杨宗保（史无此人）之妻穆桂英，系精通兵法指挥有方的巾帼英雄，另有十二寡妇征西的传说等。这些感人的故事，实则来源于明代人撰著的小说《杨家府演义》一书。此书中的故事后被编成评书、戏剧，在民间广为传颂。这类故事虽与史实多有出入，但人们出于对杨家将报国情怀的崇敬与怀念，不但乐于接受，而且还口口相传。杨家将

的故事，至今仍是我们利用艺术形式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

如果说北宋时期的杨家将以武功报国而名垂青史的话，而生活于南宋这一多事之秋的杨万里，则以众多优秀的诗词作品抒发了自己主张抗金的爱国精神，以及对祖国自然风光的由衷赞美。杨万里系高宗绍兴进士，曾任秘书监。南宋抗金名将张浚谪居永州时，勉杨万里以“正心诚意”之学。他遂名其书室为“诚斋”，故时人称之为诚斋先生。其诗初学江西诗派，继学王安石与晚唐诗，后风格转变，自辟蹊径，师法自然，自创而成清新活泼、通俗易懂的“诚斋体”。杨万里属高产作家，一生写诗2万余首，今存4200余首。他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并称“南宋四大家”。在感事伤时、抒发爱国忠愤的诗作中，《初入淮河四绝句》颇具代表性。现录其二和其四两首绝句如下：

（其二）

刘岳张韩宣国威，赵张二相筑皇基。

长淮咫尺分南北，泪湿秋风欲怨谁？

（其四）

中原父老莫空谈，逢着王人诉不堪。

却是归鸿不能语，一年一度到江南。

此组诗歌系作者于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奉朝廷派遣自临安赴淮河迎接金国使者途中所作，对抗金将相的敬佩和对沦陷区父老痛苦处境的同情之心跃然纸上，读之令人动容。描写自然景物，借景抒情是杨万里诗作的又一鲜明特点。在《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中，他吟出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句，将六月西湖的独特景色写得十分鲜活别致；在《小池》中，他以不同于常人的敏锐眼光，捕捉到转瞬即逝的自然景物，从而酿出了“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千古佳句；在《过扬子江》中，他的“天开云雾东南碧，日射波涛上下红。千载英雄鸿去外，六朝形胜雪晴中”数句诗行，不仅极为形象地描述了冬日扬子江早晨的壮丽景色，而且抒发了作者吊古抚今的沧桑之慨，立意新奇，为人称道。

熟悉明代历史的人都知道，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成祖朱棣在北征途中驾崩，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他即位后，一改其父追求事功的国策，转而实行了稳健务实的治国方略。继仁宗之后，宣宗朱瞻基承袭父亲的治国思路，强调以文治国，从而使大明王朝迎来了一个法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家安定的黄金时期，史称“仁宣之治”。说起“仁宣之治”，三位杨姓重臣功不可没，这就是被朝野并称为“三杨”的杨士奇、杨荣、杨溥。杨士奇，名寓，字士奇，后以字行。他出身寒家，未曾中举，但具真才实学，曾在湖广各地做塾师多年，名誉甚佳，后经翰林院王叔英引荐进入翰林院。杨荣、杨溥二人均系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同年一起入翰林院。靖难之役后，“三杨”与众大臣一起出道迎降朱棣，朱棣即皇位，是为明成祖。三人因才华出众，很快得到成祖的信任与擢升。永乐元年（1403年）杨荣被委任为“侍皇太子讲读”，且同时负有“为诸皇孙讲学”之责。同年，杨士奇被擢任东宫侍讲，负责对太子的教育，并破格进入内阁。永乐二年，杨溥被委为太子洗马。太子朱高炽仁义敦厚，主张以德治国，与三位杨姓老师相处甚洽，视为心腹知己。永乐十二年，成祖北征回朝，在京监国的太子朱高炽因遣使迎驾稍缓，加之给父皇的奏疏用语欠妥，遂招成祖恼怒。为给太子开脱罪责，“三杨”等人主动揽罪于己，结果

杨士奇

杨　荣

杨　溥

造成包括“三杨”在内的所有东宫僚属身陷囹圄，其中杨溥坐狱竟达十年之久。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成祖在北征途中驾崩，随军的杨荣一面对成祖的死讯密而不宣，一面连夜派人骑马通报太子，在京的杨士奇继而妥善处理了迎丧、新皇即位等重大事宜，帮助朱高炽顺利即位。仁宗即位后，立即下旨释放了杨溥，并官复原职。由于“三杨”与仁、宣二帝有师生之谊，更属患难之交，因此成为仁、宣二帝的股肱之臣，相继同值文渊阁。因文渊阁建于皇宫之内，故称内阁，以别于外庭。初置阁臣七人，后因其他人或年老致仕，或调作他职，阁臣只余“三杨”。太祖朱元璋在胡惟庸案后废除宰相制，由皇帝亲掌六部。但自成祖以来，此制已在默默演变，至仁、宣时，内阁大臣已成为辅佑皇帝的决策核心，此时的阁臣已是事实上的宰相。以“三杨”辅政的内阁在皇帝的支持下，实行了诸多有利于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重要举措。作为“三杨”之首的杨士奇体恤民情，他多次上疏，提出与民休息的施政主张，从而迅速改变了“流徙尚未归，疮痍尚未复，民尚艰食”的状况，使经济得到了明显地恢复与发展。杨士奇注意为朝廷选拔人才，周忱、况钟、于谦等名臣，皆系由他举荐得以擢升的。当时南方文化发达，故科举时南方人科中的机率要大大高于北方，为解决这一科举名额存在地区不平等的状况，作为南方人（籍系江西泰和）的杨士奇认为，南方文化发达，虽人才济济，但不少人却偏于轻浮；而长才大器者，不少人则出自北方。为此，他便向仁宗建言：科考试卷依旧密封誊录，但要在外面标明“南”、“北”字样。如要取进士百名，可取南卷六十名，北卷四十名。这种既坚持以文才择优，又兼顾地区文化差距的做法，保证了各省尤其是北方生员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为国效力的机率。杨荣机敏通达，谋而能断，尤擅谋划边防事务。曾随成祖五次北征，参决军机。宣宗即位不久，汉王朱高熙（宣宗叔父）发动叛乱，杨荣便力建宣宗御驾亲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攻乐安，迫使朱高熙投降，稳定了局势。杨溥入阁后，与上述二杨共掌机务，其特点是为人低调，擅长处理臣僚间的关系，客观上增强了内阁的凝聚力，提高了为政效率。“三杨”同心协力，长短互补，尽心辅政，为“仁宣之治”的出现做出了无可替代的杰出贡献。“三杨”博学，皆有文章著述传世：杨士奇著有《历代名臣奏议》、《文渊阁书目》和《东里文集》等；杨荣著有《北征记》和《杨文敏集》等；杨溥参修了永乐、洪熙朝《实录》，后又主修《宣宗实录》，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珍贵史料。

亲历者忆临沂之战（下）

大荒堂主

进攻鲁南的日本装甲部队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临沂战场压力稍有缓解，第五战区长官部便迫不及待抽调张自忠部主力（其一一四旅留守临沂）西进，拦截津浦路正面之敌南下，劳师袭远，乃兵家大忌。李宗仁、白崇禧久历行阵，老谋深算，不是战事艰险，不会出此下策。张自忠部尚在路途，坂垣师团得到加强卷土重来。兵临城下，庞炳勋苦战不支，遂向第五战区发出电文：

（一）敌自攻击以来陆续增加，现至4000余人，炮火昼夜不停，往复突击，肉搏多次，我师、旅长躬在阵地督饬指挥，战斗之烈空前，毙敌无算，我伤亡甚重，现剩有战斗兵计一一五旅全旅500—600人；一一七旅800余人；补充团亦仅700人，其余尚在调查中。

本日已将军属特务营（加入瞬时即牺牲一全连）、学生队等均加入阵线，现军、师部，即一连之预备队亦无。

再，所有轻重火器被敌炮毁即自行损坏者已逾半数，现正激战中。

（二）职军前摧破板垣部队，已苦战月余，今当敌新锐之众，纵伤亡十之七八，然为国家、为主义而奋斗，全体官兵抗战精神始终关注，死而无怨，益自北伐十余年以来革命素质如愿以偿。为当此紧要关头，遭此摧残，杀敌有心恨乏实力，揆之现势，临沂城危急万分。

临沂被突破，台儿庄战役企图将功亏一篑。关键时刻，第五十九军接到李宗仁急电：飞兵回援。

第五十九军于转进途中，复奉命回援临沂。至3月25日，前头部队抵临沂西郊，展开兵力，同敌野战于城西之南道、北道、大岭、小岭一带。时我第三十八师伤亡很大，当时该师已无预备兵力，师长黄维纲在电话里向张自忠请援，张说：“你们要坚决顶住！我们困难时，敌人更困难。要坚持最后五分钟！我已命令刘师长派一个团从诸葛城向敌人左侧猛攻，支援一一二

旅方面作战，不久即可到达。”黄说：“问题是正面队伍有顶不住的样子。眼下这里实在没有人可调了！”张说：“没有人吗？为什么还有人说话！”让黄维纲碰了一个钉子。但他很知道黄维纲作战一向很沉着，情况不紧是不肯轻易求援的。张自忠放下电话后，立即传令手枪营及第六七六团第二营马上随他出发。他亲自率领这支队伍向第三十八师师部跑去。到南道、北道小高地后，张军长正用望远镜观察敌我情况，不料被敌人发现目标，许多炮弹纷纷落在他的周围。他依然很镇静地仔细观察，经过与黄维纲师长及杨干三团长商量后，他立即作出决定，以进为守，用全力向敌人反攻。（陈芳芝《跟随张自忠将军临沂抗敌记》）

南道、北道小高地，原名红石岭，位置在大岭西南，南道东北，属赤铁矿石堆积形成，小涑河流经这里将其从中截开，分为南北两段，中间河宽不足100米，石底，枯水季节，最深处不足0.2米，其南岸岭顶大约有6000平方米，生长着稀疏的灌木和许多鬼针草，没有遮蔽物，鬼子沿小涑河从西向东进犯临沂，此岭正好卡住必经之路，当时鬼子进攻，侦察骑兵曾登上岭顶，没有发现异常。待大部队临近岭前时，突遭埋伏在此的第五十九军伏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伤亡惨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成功的战例。鬼子恼羞成怒，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发动了多次进攻，始终未能得手。由于岭顶的地质条件，难以构筑野战工事和展开兵力，五十九军也损失颇大。夜幕降临，交战双方同时撤离了战场，附近大胆的村民曾前去捡取战利品，发现鬼子遗弃尸体上百具。张自忠的指挥所应该在河北岸。

第五十九军用生命延迟着敌人的进攻，由于双方人员素质，武器装备，后勤供应等战争要素悬殊太大，我方首先感觉到耗不起了，26日下午徐祖诒向战区告急：“此方兵力，庞军已失战斗力，张军实力虽剩半数而士气较前甚差。非有生力援军，临沂难守，祈早决定。”

第五战区当天即决定调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一师第三三三旅（旅长王肇治）与第十三军骑兵团增援临沂。

3月29日，张自忠亦向李宗仁表达了最后的决心：“（一）当面之敌自27日上午开始向我古城、南沙埠、小岭、北道攻击后，复于28日增加约千余人，炮十二三门，附以飞机往复轰炸，密集炮火射击，村中房屋多着火焚烧，烟焰迷漫。我军喋血抗战，前赴后继，毙敌甚重，遗尸遍野，战事激烈，前所未有，我守军血战两昼夜全部壮烈牺牲。现为节省兵力计，在七得、前后七里屯、韦家村、前后岗头一带占领阵地。……。（三）汤部骑兵团及缪军之一旅均未到达。（四）职军两日以来伤亡两千余人，连前此伤亡达万余人。职一息尚存，决与敌奋战到底。

临沂城危在旦夕之际，日军右翼矶谷师团濑谷支队也在台儿庄附近陷入重围，日军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29日急令第5师团抛开临沂速救援濑谷支队。

日军第5师团坂本支队在临沂附近留下了约2个大队（2000余人）的步兵，牵制张、庞两军，其主力（步兵4个大队，野炮兵2个大队）则于29日晚悄然脱离战斗，沿仲村、向城一线南下，向兰陵镇急袭。

临沂战场正面压力减缓，恰于此时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一师第三三三旅与第十三军骑兵团等援军到达。守军于当夜22时发动了全线反击。

庞炳勋的第四十军在沂河以东地；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在十里铺、韦家屯、后岗头一带与敌对峙。三三三旅的战斗任务，是从四十军和五十九军阵地中间，出敌不意，向盘踞在大小岭一带久战疲惫之敌发起突然袭击。是役，三三三旅六六六团、六六五团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整个战役，三三三旅歼灭坂垣师团近千人；该旅亦伤亡很大，六六六团二营全营覆没，一营伤亡过半。五十七军通令嘉奖三三三旅“解临沂之围，壮本军之誉”！（吕正操、万毅、宋黎《血溅失地功献中华——记抗日战争中的东北军》）

敌因战线过宽，兵力匮乏，力不能支，遂向东北方向溃逃。第二次临沂之战以我军完

视死如归

胜划上句号。

4月1日下午二时许，正当我军以全力向台儿庄东北和台枣支线附近之敌包围攻击时，第五十二军军部在向城附近的便衣侦察队，派员骑着自行车仓促来到军部指挥所报告紧急情况。据称：有步、骑、炮联合之敌约四千余人由临沂开来，向通兰陵镇之大道南进，其先头部队快要到达向城附近。（姚国俊《台儿庄一带作战记》）

原来这些日军系坂垣第五师团的主力坂本支队，久攻临沂不下，受命撤兵南下，增援獭谷支队，结果，在向城附近与汤军团不期而遇。坂本支队3000多日军的突然出现，汤军团右侧背构成严重威胁；同时，台儿庄、枣庄支线上的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又从左侧背对汤军团构成威胁。汤恩伯权衡利弊，当机立断，下令该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律由内线转向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变包围为反包围……4月1日零点，五十二军在八十五军的掩护下，乘夜色与敌脱离，急急向右回旋20余公里，于拂晓前到达指定地点，八十五军的八十九师乘夜色迂回到日军的侧背……2日，汤军团实现了对日军濑谷支队、坂本大队的反包围，并发起了致命性的攻击。全军上下一鼓作气，奋勇杀敌，一举将包围圈内的四五千日军，于两昼夜中歼其大半！（牛逸尘《“抗日铁汉”汤恩伯》）

第八十五军与第五十二军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各伤亡1300余人。

4月3日，第二十军团突破坂本支队所据之小王庄、刘庄等阵地，并与敌发生肉搏战，“第八十五军第四师两日来伤亡约千人”。（《台儿庄战役中日兵力及伤亡考—兼与张宏志商榷》）

3月31日，坂垣征四郎亲率第五师团一部到达临沂一线，接应逃出重围的坂本支队后，加强了对临沂的攻势，希冀毕其功于一役。

4月5日下午，由艾山方面开来的三四百名日军突然窜入朱陈，旋即全部占领。朱陈为临沂西南之重镇，朱陈若失便直接威胁临沂安全，所以一时颇为紧张。张自忠急忙调兵遣将，开赴朱陈；据守临沂城的庞炳勋也派出工兵营和学兵营前往迎击。至晚八九时，朱陈

已被张、庞两军包围。6日清晨，双方枪炮之声络绎不绝，朱陈之敌尚欲突破我军包围，向距临沂城更近的湖南崖、湖西崖、王庄进击。激战竟日，上述各地均被我收复，敌无奈又退回朱陈寨内。（韩信夫《鏖兵台儿庄》）

此时，由晋南开来的姚景川骑兵第十三旅到达临沂，张自忠除派一部向敌后方搜索，破坏交通、扰敌运输外，将其主力用于对付朱陈之敌。8日，第九十二军第十三师吴良琛部也开到临沂战场归张自忠指挥。张自忠也将该部用于解决朱陈之敌。但日军也于同日派来增援部队，双方力量均得到加强，因而仍处于对峙状态。（韩信夫《鏖兵台儿庄》）

先后投入临沂战场的国民革命军，已有西北军、东北军、中央军、海军陆战队等等，番号众多，穿着不一，但对外保密，所以老百姓均认为是庞炳勋的部队。

4月初，我学兵队奉命赴徐州接新兵2000人，均系监狱在押犯人，提前释放，叫他们战场立功赎罪。这批犯人多是亡命之徒……，到达临沂后充实到前沿阵地，据说作战还算很勇敢。（田玉峰《四十军临沂抗战》）

1938年4月7日，台儿庄战役以歼灭日寇12000余人胜利结束。临沂阻击战至此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参战将士用鲜血在反法西斯史上涂抹了浓重的一笔。

台儿庄捷报传出之后，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新曙光。（《李宗仁回忆录》）

同日，痛心疾首的日军统帅部下达了攻击徐州的作战命令，力图将徐州地区的我军主力围而歼之。徐州会战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临沂守军演绎着荡气回肠的最后乐章。

第五十九军在临沂外围野战中，损失极重，战区长官部命撤出战斗。因第三十八师损失过大，全师三旅合成一旅，由李九思旅长带领，归军部直接指挥。其余官长、老兵由黄维纲师长带领，到徐州西黄口、商丘一带接受新兵。第一八零师虽保持两旅四团建制，单缺员极多，实际每团只有七八百人。（顾相贞《临沂抗战纪略》）

四十军苦战两月余伤亡殆尽，弹药也完了，庞军长说：“死也死在临沂！”但到4月中旬，阵地逐渐不支，东桥附近敌人虽未到达，板垣却从城西绕道南下，以一部包围临沂城，从西门攻入城内。我四十军三十九师三三四团率张里元的一部分保安队从城内撤出，临沂陷入敌手。敌在城中大肆烧杀，未走的群众均遭毒手，死数千人，仅西门里就被机枪射死数百人，四十军伤员未撤下的均遭杀害。庞军长泪流满面地离开了临沂。时在1938年4月23日。（田玉峰《四十军临沂抗战》）

四月中旬敌对临沂采取攻势，我庞（炳勋）、张（自忠）虽奋勇抵抗，因所部每次激战之后牺牲太多而无法补充，所以战斗力远不如日军，且奉命自晋南调至临沂增援之李仙洲部路经向城时被敌切断，一时不能到达临沂，因此庞、张二部被迫放弃临沂退守郯城、马头镇、陇海一线与九十二军相呼应牵制敌人……（《白崇禧口述自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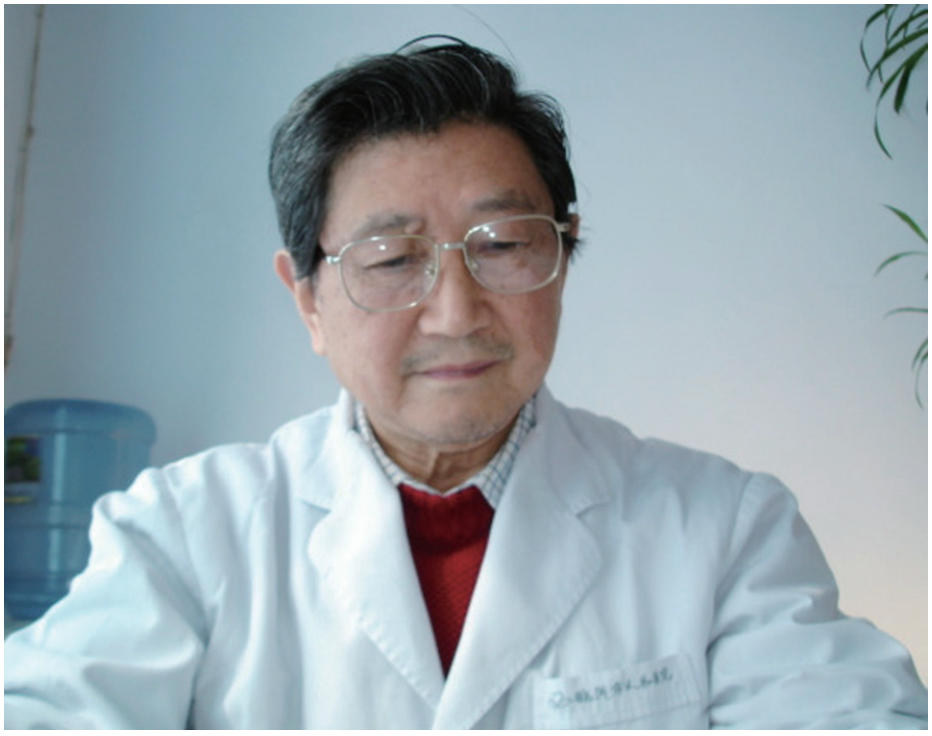
“在临沂保卫战中受了重伤的赫会清最终自己挣扎着回了营地，在营部临时换药后，他被民工扶着赶往商丘北关的美军医院，在这里住了4天，他的伤情就奇迹般地好转了！

伤情好转后，赫会清牵挂着自己的战友，他又回到了部队，这时部队刚从临沂撤下来，到了商丘地区的毛谷堆。回连队后，他才知道全连的146人已经牺牲得只剩下8个人，连长还活着。”（赫会清《我在抗战期间四次劫后余生》）

一片赤心五十春

——感悟欧致新

刘凤才



公元1956年，欧致新初到临沂专区人民医院时，风华正茂，意气风发。

公元2006年，欧致新离开市院儿科临床一线时，童颜鹤发，壮心不已。

光阴如梭，流年似水，欧致新在儿科临床一线整整50个春秋。作为临沂儿科专业的创始人和学术带头人，他德艺双馨，德高望重。今天，已近杖朝之年的老先生，仍然精神矍烁，思维敏捷。他像一棵医坛常青树，在一匝匝清晰而深刻的年轮中，始终包涵着一颗赤子之心。

年轻立志——一生学做白求恩

欧致新是临沂市人民医院儿科原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1934年，他出生于江苏徐州市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家中地无一垄，粮无隔夜，父亲是个普通店员，母亲在家做点小手工，生活十分艰辛。而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不但浸泡着贫苦生活的滋味，更铭刻着遭受战争动乱与日本鬼子铁蹄蹂躏的悲怆。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徐州，长达8年之久。鬼子进攻时，朝着手无寸铁的逃难百姓狂轰乱射。父母带着幼小的孩子们向乡下“跑反”，路上逃

难的百姓汇集成人流，小的哭老的喊，一片凄惨景象。一谈起日本鬼子当年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横行无忌、烧杀抢掠的罪行，欧致新至今恨得咬牙切齿，义愤填膺。他说，这也从小激发了他的爱国之心：将来一定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让祖国强大起来，不再受外敌欺负。

欧致新姊妹4人，他最小，又是唯一的男孩。本来三姐姐都上学，然而家境贫穷，生活十分拮据，供养4个孩子上学实在不堪重负。无奈，父母只得让3个姐姐先后辍学，千方百计、集中绵薄家资，供应欧致新上学。欧致新十分懂事，知道父母的不易、姐姐们为他作出的舍弃，从小就懂得了感恩与回报。他刻苦读书，品学兼优。

随着年龄渐渐长大，他也开始不断寻找自己的学习志向，探求人生道路。还是在上中学时，他读到了著名作家周尔复写的《白求恩大夫》，立刻被白求恩的故事深深吸引和打动，他爱不释手，反复阅读。白求恩那颗普济天下的仁慈心，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心，那种对工作极端认真、对技术精益求精的责任心，让他充满了由衷的敬佩与羡慕，一个人生目标如同一把燃烧得越来越亮的火炬，在心中日益明确而坚定：将来一定要做一个像白求恩那样的医生，救死扶伤，为遭受疾病与创伤折磨的百姓特别是穷苦人们看病祛痛！于是，欧致新开始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书店、图书馆的医学书架前，时常伫立着他潜心阅读医书的身影……

1952年，欧致新参加全国解放后第二届高考，这是他实现“白求恩理想”的重要机遇与阶梯，他不假思索地把报考医学院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并如愿以偿地被山东医学院录取。

半个多世纪过去。今天，那位曾经被伟大领袖毛主席誉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的白求恩的形象，似乎已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人民极端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白求恩精神，似乎也不再被一些人当作主流价值观念而尊敬与崇尚。然而，欧致新心中的“白求恩情结”却矢志不移，日笃年深。每当人们问起欧致新当初为什么选择医生作职业时，他每每明确地回答：“是《白求恩大夫》这本书。它对我立志学医和做一个白求恩那样的医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我终生受益。”时至今日，欧老还时常说：“建议大家都好好地重读或者新读一下这本书，白求恩是人们尤其是一名医生永远的学习榜样。”

对白求恩精神经年不变的拳拳之心与精神膜拜，正是欧老德艺双馨，人生常青的根本之所在。

事业大成——呕心沥血为患儿

1956年，欧致新以优异成绩毕业。拿着组织的一张“派遣证”，欧致新毫不犹豫地来到了沂蒙山区，来到当时的临沂专区人民医院。

其时，相较于济南、上海、徐州等城市，临沂城只能算是一个农村大集镇。然而，欧致新并未产生思想落差，相比冒着生死危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最艰苦的地方救死扶伤、直至献出宝贵生命的白求恩，他心安理得。来到临沂，他铺下身子，在医院安排的一间被烟熏得乌黑的小屋里安了家，从此一头扎进了工作之中。

当时的专区医院医疗条件与水平也可想而知，只有内、外、妇3个科，共百十名医护人员，百十张床位，唯一的一台陈旧的X光机，只能透视不能拍片。欧致新学的是儿科专业，他的到来，使临沂专区医院从此有了儿科大夫，但因医院没有小儿科，他只能被安排在内科。他一个人负责10余张病床，患者从门诊到治疗，从进门

到出院，他全程负责，一次夜班有时长达半个月。他始终不知疲倦，任劳任怨，总是说：“比起白求恩，这点苦累算什么？”然而，他心中却始终有一件让他最难以忍受的苦楚与纠结，就是不忍看到无奈的孩子生病，不忍听到患儿那凄惨的哭声，也不忍经受父母那撕心裂肺的痛苦。儿科疾病有其独自的特点、规律与治疗方法，非专业儿科医生，常常看不透，治不好。临沂是一个人口大区，每天有这么多患儿，作为全区的最高医院，没有儿科专业，怎么能适应患者需要？

1956年仲夏，只参加工作几个月的欧致新径直找到领导，恳切建议成立独立的儿科。让他喜出望外的是，他的想法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与大力支持，并迅速付诸实施——成立儿科，由欧致新担任负责人，把“八角楼”数间半地下室辟为儿科所用。

这不仅是临沂儿科专业的起点，也是全区医疗事业的一个新起点，创始人就是欧致新。而当时全省医院中，设有儿科专业的还极少。

所有的创始者必定是拓荒牛。儿科成立伊始，只有欧致新一名医生，三四名护士，十几张床位，而所有的患儿，一下拥挤到儿科门诊。用他自己的话讲：“那时候什么都来不及想，只想早日解除患儿的病痛与家长的心痛，每天连星期几都不知道，就知道没黑没白地工作。”后来增加了一名大夫，两个人仍然是天天上班，昼夜轮换，整整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再后来，科里医护人员慢慢增多，他才得以喘口气。1966年，临沂乙型脑炎流行，患儿人满为患，多时达1200多人，欧致新建议把医院礼堂腾出来作为临时病房。他白天看门诊查病房，晚上根据治疗情况研究修定医疗方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的觉。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与中医密切配合，把一个个危重患儿的小生命从死亡线上夺了回来。

欧致新更以其专业优势与精湛医术，创造了许多让人刮目相看，省内首例的奇迹。

1963年的一天，他接诊了一个患儿，临床检查发现患儿肝脏肿大并发生硬变。欧致新很诧异：小小顽童，怎么可能出现肝硬变？他向其家长仔细询问了生活习惯，深入分析了各种诱病原因，又给患儿作了相关化验，最后确诊孩子得的是“小儿中华分枝睾吸虫病”。此病多发于习惯吃生鱼的南方，北方极为罕见。是南方一些患者到北方后，其排泄物污染了当地水源，感染了鱼类，而当地孩子们吃了从河

沟汪塘中捕获又没有烤熟的鱼而被感染。欧致新对病因洞若观烛，使患儿得到了及时有效治疗，并首例报告了省内小儿中华分枝睾吸虫病，引起了全省防治工作者的重视，使更多的儿童免遭了吸虫荼毒。

1967年，欧致新在临沂县册山乡巡诊。一对青年夫妇抱着只有3个月的孩子找到欧致新求医。孩子面色苍白，明显贫血。做完检查后，欧致新说："孩子肚子里可能有虫子。"在百姓的眼中，郎中年纪越大本事越大，对欧致新这位年轻医生的话，孩子母亲显然有点不太相信："孩子还在吃奶，怎么会有虫子？"然而欧致新已基本断明患儿感染了钩虫病，随即为其开了药。不出所料，一个月后，这家人高高兴兴地抱着康复的孩子，终于找到正在巡诊的欧致新说："您真是神医，孩子全好了，您看现在，有红似白的！"她还把本村得了此类病的孩子带到欧致新这里治疗。

1972年某天，临沭县一对万姓夫妇，失魂落魄地抱着出生刚刚两天的孩子，火急火燎地来到小儿科，恳求欧致新救救孩子的命。病儿全身发黄，生命奄奄一息。更悲惨的是，他们的前5个孩子都是一出生就有严重黄疸，一两天内就莫名死亡。当地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欧致新立即为孩子作了检查，诊断为因母子血型不合而导致的"新生儿溶血症"，而要挽救患儿的生命，就得用当时比较复杂的"换血"疗法，但当时在全省内还没有成功的先例。他顶着压力，凭借精湛技术，成功地为孩子实施了换血手术，终于让孩子摆脱了厄运，家长解脱了噩梦。孩子父母感激得涕零俱下，村民也敲锣打鼓给欧致新送来了锦旗。此次手术，在当时山东省是首例，填补了省内专业空白，荣获地区科研成果奖。

上世纪90年代初，"格林－巴利综合症"散发。一天，一个7岁的男孩因此病住院，其时已经发展到全身肌无力，呼吸肌麻痹，如不及时抢救，最后会被活活憋死。治疗此病的传统办法，疗程长见效慢，孩子的严重病情已经不允许。为了从死神手中夺回患儿的生命，他决定对患儿实行"部分交换输血"治疗，一举获得成功。以后多例治疗均获良好效果，获得地区科研成果二等奖。

中西医结合治疗儿科疾病，更是欧致新的一大特长。多年以前，他就专门参加了西学中学习班，掌握了比较系统的中医药知识。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他就运用中药乌梅汤加减配合西药治疗小儿胆道蛔虫，取得良好疗效，免除了患者的手术之苦。他与中医结合摸索出了一套治疗"乙脑"的科学完整的方案，使该病的死亡率大幅下降。他用纯中药治疗小儿感冒、病毒性肠炎、秋季腹泻等，有一套完整的治疗经验；对用中药治疗小儿肺炎、肾炎、血液病等，也有独到之处。为患者服药方便，他还研究开发了多种中成药，如"感康颗粒"、"肺安颗粒"、"秋泻煎剂"等，有的还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最近，有位患儿童肺炎的孩子，花了数百元，病情未见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于是求治于欧致新。他只给孩子开了3副中药，数天后孩子就神奇地痊愈，家长感激得无以言表："欧主任，俺祝你活到130岁！"总结几十年中西医结合的实践，欧老说："祖国医学虽然是一门实践医学，但是也正是因为数千年来行之有效的实践，证明了它是科学。对一些疾病象病毒感染等，中西医结合甚至单用中医治疗往往比单纯西医治疗更有效，而且更经济、更适合给老百姓治病，因此，西医决不能轻视中医；而西医是现代科学而且发展日新月异，中医也决不能拒绝西医。中、西医都必须学会两条腿走路，才能更加健康大步地向前进。"

临床50多年，经欧致新诊治的患儿，按平均每天四五十人的保守估计，总计也得六七十万。他不仅是全市儿科专业的创始人，而且一直是学科带头人，是我市乃至省内知名度很高的儿科专家。社会上流传着他的一个称号："儿童的福音"，而他有一句格言："儿科医生，必须要有一颗父母心。"医生对患儿的"父母之

心”，不仅要体现在舐犊之情的疼爱心上，同时要“精心、细心、用心”，对医术精益求精，不断探索进取。

他是社会与行内公认的德艺双馨的老专家，对医术与医德的关系，也有自己深刻的见解。他说：“医术与医德，如人之两足，飞机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否则就摔跟头。有仁心而无妙手，即便你面对病人感动身受心急如焚，但也无力回天于事无补，达不到治病救人的目的。有妙手而无仁心，虽然能治好患者的身病，但更可能给医生这一崇高职业抹黑，给人们的心理健康与道德观念上造成阴影与疾患。而无论好的医术与医德，都不是短时间就可以达到的，必须长期修养砺炼，这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基本功与必修课。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作为一个医生，每个人还是要牢牢记住《圣经—路加福音》上的那句话衷告：‘医生，先治好自己吧！’”

扎根沂蒙——无私奉献五十春

从1956年大学毕业至今50多年，欧致新就像一棵蒙山之松，把根深深扎在沂蒙大地上，把心牢牢地系在沂蒙人民身上。

1967年和1976年，欧致新先后两年到临沂县册山、莒南县历家寨下乡巡诊。他想，沂蒙老百姓还很贫困，农村缺医少药看病太难，一个医生为百姓服务，就是尽心尽力地给他们看病治病。他挑起装着红十字包的担子，挨村挨户、上门送医送药。群众有什么急病难症找到他们，更是不分黑白昼夜、刮风下雪、路途远近，随叫随到。

一天半夜，册山乡的一个怀双胞胎农妇难产，家人急匆匆来到医疗组求助。欧致新虽然不是妇产科医生，但是在群众眼中他是什么病都能治的。欧致新一路奔跑着赶到产妇家中，终于保住了母子平安。一位老太太背部患蜂窝组织炎，已经感染中毒，危及生命，急需抗生素治疗。但当时抗生素相当紧缺，普通百姓很难买到。为了救老人性命，欧致新利用医疗组的影响力，专程跑到相邻李庄公社托了关系，才拿了仅用一天的青霉素，为老人注射后很快控制了病情。为了给老人治愈，他又托关系弄到了两天的药。

“老百姓不易，得了病更难，必须处处为患者着想，点点滴滴为病人节省”，这是欧致新的一贯思想与做法，因为百姓的疾苦，在他的心中份量最重。1990年，他积劳成疾，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反复动员下，才休息治疗。就是作为患者，他也闲不住，一边治疗，一边为慕名而来的患儿看病，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返回了工作岗位。他始终坚持“诊断要准，治疗要精”，只要不影响效果，能用普通的不用高档的，能用便宜的不用贵的，能用国产的不用进口的，能用一种药的不用两种药。他说：“除了一些物理与运动疗法，医生治病离不开药，用什么药、怎么用药，是一个合格称职、认真负责的医生必须掌握具备的能力与条件，决不能用黑心药、昧心药，也不能一知半解，盲目用药。目前，一方面药物发展让人眼花缭乱，另一方面在利益驱动下假冒伪劣药品充斥市场。这种情况下，在加大打假治乱、让药物市场正本清源的前提下，医生用药时务必首先考虑病人病情，熟知所治疾病的各种药物品种，切实掌握每种药的药理药性，坚持‘保证疗效、兼顾经济的原则，做至药中选效，效中选优，优中选廉。”不少患者说：“治这个病，根本不用费那么事花那么钱，找欧致新主任开几副中药就可以了。”每年的医德医风调查，凡是被欧致新治疗过的患者亲属，都众口一词，纷纷要求表扬他。

退休之后，欧致新仍然发挥余热，坚持坐诊。今天的临沂人，有不少是一家三

代都曾找欧致新看过病的，当年被欧致新救治过的儿童，今天都已经是花甲之人，或许当了爷爷奶奶。每每同时遇到享受着天伦之乐的一家几代人向他问好，欧致新心中总有一种无比的满足与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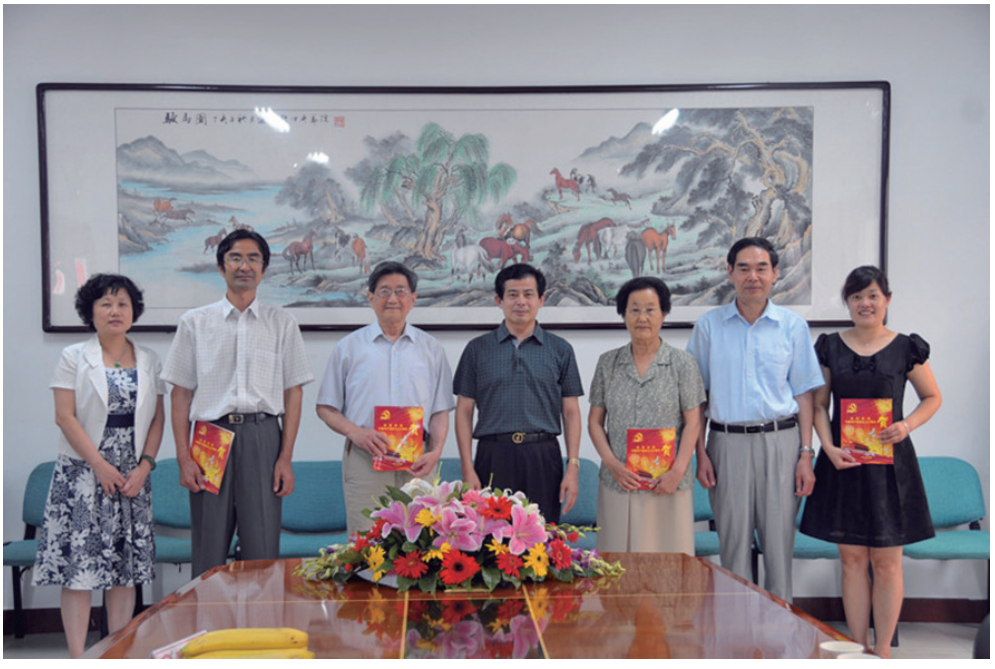
然而欧致新自己心中却又有一种遗憾与歉疚。欧致新是家里姊妹中唯一的儿子。父亲去世较早，母亲十分希望他能留在自己身边，这也是欧致新多年的一个愿望。上世纪80年代，徐州市医院和医学院等几家医疗单位多次向他发出邀请，以各种优惠条件力请他回家乡任职。消息传出后，领导和同事们都极力挽留。为了沂蒙人民，他婉言谢绝了家乡的诚聘，托付在老家的亲戚照顾好老母亲。一直到老娘亲去世，他也没有能够集中些时日在母亲的身旁伺奉。每每谈到此处，他总是十分难过地说：“说实话，我很内疚，心里有愧”。

数十年来，欧致新不仅致力于临床与科研，而且为临沂医疗学科建设与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的力倡与指导下，各县区医院普遍建立起了儿科专业。他曾多年任教于临沂医专；从临沂卫校建立起，他就担任临床教师。他的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为儿科专业的骨干，可谓桃李遍沂蒙。

荣誉属于一片赤心为百姓，满腔真情作奉献的人。欧致新获得过“国家教师园丁奖”，两次被山东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山东省儿童先进工作者”，1994年被山东省委命名为“山东省优秀共产党”等。而欧致新在患者中的口碑，更是沂蒙人民的心声。一位有文化的患者向欧致新赠诗曰：“医德仁术第一流，誉满沂蒙鲜与俦。心系赤子功无量，当代扁鹊应称欧。”而更让欧致新感动并珍藏的，是一位不很识字的农民亲笔写给他的一封感谢信：“您救了我的孙子命，我不知怎样感谢您才好，想和您说几句话也不知用什么词好，只有全家人不忘您的大恩情。我们临沂地区有您这样的神医，年轻人的生命有了保障，也是我们地区人民的骄傲。”

欧老是一位名医，谈起人生感悟来，他用十分普通的语言说：“我这一辈子是党培养了我，我把我的医学回报了社会，最幸福的事是家长告诉我孩子的病好了，最知足的事是孩子有病时，还会想起有个欧爷爷。”

听了欧老的话，我备受感动：最普通的语言，往往表达了最深刻的感情与感受！



2011年，市卫生局党委代表省市党委慰问院省级模范党员（左三为欧致新）。

大器晚成丁勇岱

高雪萍

丁勇岱，中国著名电影、电视剧演员。毕业于内蒙古艺术学院戏剧表演系，毕业后从事话剧表演，打牢了扎实的艺术功底，也磨练了纯熟的演技。初次接触电视剧，便获得了1989年国庆电视剧展播奖。

丁勇岱1958年出生于临沂市，成长于内蒙古。他从小喜欢运动，除了上课，他几乎长在足球场上，也考过专业队。教练总是一边喜欢这个机灵的孩子，一边感慨他的出身。因为政治的原因丁勇岱不能进专业队。17岁高中毕业他后进了一家工厂做临时工。不久，在一次比赛中，丁勇岱腿部受伤，医生说他从此不能再踢足球。这对于当时本身苦闷对前途感到茫然的丁勇岱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喜欢电影爱好文艺的妈妈问丁勇岱是否愿意从事演艺工作。于是，懵懂的丁勇岱便在母亲的辅导下开始了他第一个稚嫩的小品表演。那是一个关于“打酱油”的小品。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小品，丁勇岱却仔仔细细地学了两遍，而且还真的为此去打了趟酱油。

1979年，丁勇岱报考了内蒙古戏剧学院表演系。初试中，丁勇岱便被学院的高宾老师看中。高宾认为丁勇岱这个小伙子本人条件好，人又朴实，属于可造之才。于是，在课下就让同是戏剧学院老师的夫人奥登对丁勇岱单独辅导。这一年，丁勇岱结束了他的临时工生涯，开始了他学习正规表演的道路。毕业后丁勇岱分到了内蒙古话剧团，不久他便成为了团里的台柱子。丁勇岱很幸运，他从接了第一个话剧开始，就一直担任男主角。在《拳王》、《锡林喇嘛》、《高山下的花环》、《天地人》等话剧中，丁勇岱塑造了很多身份、性格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既展现了丁勇岱扎实的艺术功底，也进一步磨练了他纯熟的演技。在排演话剧《天地人》时，丁勇岱结识了导演王贵，开始有机会“触电”并首战告捷——第一部电视剧《泰山挑夫》就获得了1989年国庆电视剧展播奖。那一年，丁勇岱30岁，而立之年，他走上了自己的影视艺术之路。

丁勇岱最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还是电视剧《末路》中饰演的白宝山。在这部戏中，丁勇岱是导演陈国军挑选的第三任“白宝山”扮演者，用丁勇岱自己的话说，“我其实是来顶坑的”。由于

导演强调纪实风格，开始时觉得他的身高不如白宝山高，但后来还是启用了他。由于全剧的基调是采用纪实的方式记录1997年中国刑侦第一大案—抢劫杀人犯白宝山的真实案件，所以剧中的警察都是真实生活中的刑侦警察。按照常规的逻辑，电视剧中演员之间的对手戏是不可或缺的，但与一干业余演员合作，丁勇岱称自己非但没有不和谐的感觉，反而因此改变了自己一贯的表演理念。“作为业余演员，他们的杂念很少，从不刻意去表现人物，在与他们的磨合中，我的固有观念改变了不少。此外，为了追求更加逼真的纪实效果，导演要求每个演员都不化妆，对灯光更是不太强调，大多数时间都是自然光。一开始我很不适应，后来逐渐在剧组同仁的帮助下扭转了过来。去年底再次与陈导合作拍《威胁》的时候，我已很适应了。”

丁勇岱带着山东人的朴实，用心演每一部戏。丁勇岱曾说过：“我是个很笨的演员，对于一些技巧和手法掌握不好，我必须用心去体验角色，才能真的演好。”在拍摄白宝山被抓一场戏时，公安人员在家堵住了回来探望母亲的白宝山，一开门看见警察立刻就明白了的白宝山在偷偷穿衣服时拿到了自己的手枪，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母亲说话了，问来人是谁。白宝山为了在母亲面前留下一个完整的孝子印象，放弃了最后反抗的机会。当时白宝山的心情很复杂，是逃生还是为母亲而放弃反抗，这对于一个老到冷静同时孝顺的杀人犯来说，是很痛苦的选择。那场戏白宝山的眼神很复杂，有冷静、狠毒、温和、乖顺、绝望，演完之后，丁勇岱难受了好几天，总也出不来。然而就是这样一场戏，他竟一次就完成了，他把这归功于对角色心灵的体验。“我曾经听公安人员讲了很多有关白宝山的细节，到监狱中与犯人交谈，后来又看了牛伯成的《中国刑侦一号案》的原著，令我对白宝山的犯罪心理和性格扭曲有了更深层面的认识。一开始，剧组的人都说我太面善，与白宝山相距较远，但是后来，大家都说这小子的眼神越来越狠，你必须感激这样一个过程。”

《末路》在一些地区播出后，有些观众甚至以为白宝山是找了个犯人来演的，也有观众来信说：“白宝山是我见过的最真实的凶犯。”丁勇岱也因此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包括四川全兴足球队的魏群等运动员，“他们不是叫我白哥，就是叫我老白或宝山，甚至忘记了我的原名。现在我的家里还挂着四川的一位书法家赠送的一幅作品，上书“第一魔”。还有一次，丁勇岱偶然见到剧中曾扮演警察的刑侦队员，那个警察看见丁勇岱的第一反应是去掏枪。碰到这样的场面，丁勇岱不禁又对自己的表演增添了几分自信。

40多岁对于一个演员来说的确已过了黄金年龄，但丁勇岱却实实在在地在这个年龄迎来了自己演艺事业的春天。除这部《末路》外，由他主演的电影《高原如梦》在大学生电影节上也广受好评，他在其中再次扮演一个压抑的角色——个犯过错误的高原老兵，在内心挣扎中终于跨越困境，牺牲在高原上。

2000年，丁勇岱凭借出演《末路》里的白宝山而被观众所熟知，他也从内蒙古话剧院调到青岛。丁勇岱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在内蒙古长大，祖籍却是山东临沂，到青岛也算是“落叶归根”。前段时间，在山东卫视热播的电视剧《冷风暴》，是由导演张东东执导、朱雨辰、焦俊艳领衔主演的抗日谍战大戏，主要讲述的是老地下党员邵一夫（张先衡饰）为革命策划了“冷风暴”计划，爱国志士沈木风（朱雨辰饰）在地下党人邵一夫、杨云轩（丁勇岱饰）等人的引领下，使其顺利打入敌特工总部，与狡猾凶残的大汉奸易安之（李子雄饰）斗智斗勇，斩奸除恶的战斗故事。丁勇岱饰演的杨云轩，冷静沉着，颇具胆识。

4月20日、21日，由黄宏编剧并执导、丁勇岱、黄觉联袂主演的抗震救灾电影《倾城》在京举行了连续两天的大学生电影节展映活动。正在北京近郊拍戏的紫微星空演员丁勇岱，特地向剧组请假赶往剧场观看。电影《倾城》讲述了在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中，

电影《倾城》剧照

警察（丁勇岱饰）、银行盗窃犯（黄觉饰）、叛逆女孩三个不同命运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另类警匪故事。丁勇岱介绍：“片中灾难当前，警察与犯人都放弃了追逐和逃脱迸发出内心的真善美携手救援，每个人都完成了内心的救赎，是小人物的英雄故事。”丁勇岱称，这部电影不是靠视觉冲击的灾难片，而是在大灾面前，小人物们放弃恩怨，携手救援，同时也完成了自我救赎，冲击心灵的电影，片中的幽默也很真实。《倾城》是一部抗震救灾的电影，但影片中除了让人感动落泪的悲伤，还时常能够听到影院中观众发出的阵阵笑声。丁勇岱说：“这些幽默让大家笑出声，但这的的确确是灾难面前普通百姓的真实反映，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传递出的乐观精神正能量。”在谈到自己扮演的角色时丁勇岱说，五年前的拍摄经历让他至今难以忘怀。虽然演过很多的警察，但是如何把握一个在大灾中救人又要在内心中自救的警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另外，丁勇岱也呼吁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们关注雅安灾情，以实际行动尽到自己的责任。

影片放映的当天，四川雅安地区突发7级地震。丁勇岱早上看到新闻后立即在第一时间与身处震区的朋友们一一取得联系才稍有安心，他说：“电话里听起来朋友们都好像比较镇定，但是看了在真实震后废墟上拍摄的《倾城》，又想起拍摄时看到废墟上有很多祭祀的鲜花和蜡烛以及今天雅安的地震，心里特别难受不是滋味。”丁勇岱对遇难同胞表示深切哀悼，也为雅安祈福。

电影《倾城》曾经获得中国夏衍电影文学奖优秀剧本一等奖，并在去年的法国红水晶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导演奖”。

对于一个男演员来说，年过40才成名，未免有点晚，但是，大器晚成。丁勇岱是沂蒙山走出的汉子，他的演艺风格，朴实纯真，亲切感人。人们期待着丁勇岱更加细腻真实感人至深的表演。

全市史志办主任座谈会召开。5月16日，临沂市史志办召开全市史志办主任座谈会，市史志办全体人员和各县区史志办主任参加会议。会上，全体人员重新学习了《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地方史志工作的意见》和《临沂市地方史志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各县区主任汇报了前期工作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传达了全省史志工作会议精神，并就下一阶段全市史志工作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加快二轮修志工作进度，按时完成二轮修志工作任务；二是全面铺开年鉴工作，各县区年鉴力争自2013年起实行“一年一鉴”；三是加强方志馆和信息化建设，争取2015年前达到省和国家的各项要求；四是各县区要禾充分利用本地地情资源，搞好开发利用；五是搞好旧志整理工作。

苍山县史志办、费县史志办传达贯彻全市史志办主任座谈会会议精神。全市史志办主任座谈会5月16日召开后，苍山县史志办、费县史志办分别于17日和20日召开全体人员会传达贯彻全市史志办主任座谈会会议精神，并就下一步史志工作作出了安排部署。

市史志办到苍山县调研县志编修工作。3月29日，市史志办总编辑王瑞柱等一行4人，到苍山县调研《苍山县志》重修工作，听取了苍山县史志办主任陈永亮关于县志编修情况的介绍，解答了县志编修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并对下一阶段的志书编修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市史志办开展革命传统教育。4月12日，市史志办干部职工一行13人，在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朱海涛带领下到孟良崮纪念馆参观学习，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全体人员瞻仰了孟良崮战役纪念馆，通过听取讲解、观看历史图片和战役遗留文物，详细了解了孟良崮战役的全过程。全体干部职工被战士们奋勇杀敌的革命精神和千千万万沂蒙人民踊跃支前、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深深感动，表示一定要铭记历史，牢固树立新时期的革命精神，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努力工作，无私奉献，为临沂史志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苍山年鉴》（2007～2012）编纂工作正式启动。3月28日，中共苍山县委办公室、苍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印发了《〈苍山年鉴（2007～2012）〉组稿方案》，苍山县年鉴编纂工作正式启动。《苍山年鉴》是苍山县县委、县政府主办，记录全县各级各部门具体工作和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情况的大型综合性、地方性的信息载体。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权威性强，在为全县各级党政领导提供科学决策和为社会各界提供地情资料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宣传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弘扬苍山历史文化、促进经济文化强县建设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沂南年鉴（2006～2010）》出版发行。近日，由中共沂南县委、沂南县人民政府主办，沂南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纂的《沂南年鉴（2006～2010）》由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共98万字，设大事记、概况、政党政务、人物、文献等21个栏目，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述了2006～2010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和各级各部门的工作。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权威性强，既是全县各级党政领导决策服务的资政工具书，也为续修第三部《沂南县志》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临沭县启动《临沭年鉴（2013）》编纂工作。5月6日，中共临沭县委办公室、临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印发《临沭年鉴（2013）》组稿方案，要求各有关单位尽快落实撰稿人员，广泛收集资料，按编纂体例要求，认真撰写稿件，确保《临沭年鉴（2013）》顺利出版发行。

每年度的《临沭年鉴》是临沭县县委、县政府主办，临沭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纂，记录全县上一年度各级各部门具体工作和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情况的大型综合性、地方性年刊，在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自2006年开始编辑，《临沭年鉴》已经连续出版6卷。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权威性强，是为全县各级党政领导决策服务、存史、资政的工具书，也是宣传临沭改革开放业绩、展示临沭形象的重要窗口。

稿费领取启事

请尚未领取4至12期《沂蒙史志》稿费的作者速与临沂市史志办联系。

联系地址：临沂市北城新区天元商务大厦655室

联系电话：0539-8727559

联系人：张广卫